

Jiang Shuai Quan Zhuan

将帅全传

清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中国将帅全传

清

郑福田 可永雪 杨效春 主编

目 录

清

李定国	(1)
施琅	(9)
郎坦	(15)
费扬古	(17)
萨布素	(21)
年羹尧	(38)
岳钟琪	(48)
邓廷桢	(59)
陈化成	(62)
关天培	(67)
林则徐	(74)
姚莹	(86)
葛云飞	(91)
裕谦	(95)
海龄	(100)
骆秉章	(104)
左宗棠	(106)
冯子才	(120)
李秀成	(127)

张树声	(132)
石达开	(136)
丁汝昌	(141)
刘铭传	(150)
左宝贵	(155)
陈玉成	(157)
刘永福	(162)
刘锦棠	(167)
刘步蟾	(170)
邓世昌	(174)
徐骧	(181)
寿山	(189)
聂士成	(195)

清之卷

有清一代，从为入主中原而战到大清灭亡，主要战争在三个方面，一是与明王朝争天下，为统一全国而战；二是为维护祖国统一和主权抗击列强而战；三是为维护封建政权清军与起义军之间的战争。在清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中，除“乾嘉盛世”战争较少外，其它时候均战事频繁，涌现出的大批优秀将帅，或可歌可泣、或名垂青史，各有特色。

本书收录清代将帅三十三人。

李定国

李定国（1620～1662年），字宁宇，陕西榆林人。是明末清初知名的农民起义将领。

一、戎马倥偬 转战四方

李定国出生于贫苦农家。由于明朝末年的政治腐败、田赋日重，灾害连年，民无生计，李定国的父母均早亡于贫病之中，幼时的李定国只好流浪乞讨，苦度时日。崇祯三年，张献忠起义军占领陕西米脂，李定国长途跋涉，投到了起义部队，张献忠见他父母双亡，聪明伶俐、性格倔强，便将他收为养子，跟随张献忠

左右，习学武艺，转战四方。

经过十来年的战斗生活，李定国已成长为一个具有较高军事素养和智勇双全的年轻将领。到了他二十岁时，已经长得身材魁梧，仪表非凡，因其长得很像《水浒传》中的小旋风柴进，故人称他为“小柴王”。在战阵中，他经常一马当先，骁勇超逸，被誉为“万人敌”、“小尉迟”。在戎马生活中，他勤奋好学，深明大义，通读了史书，还常与文人交往。对人和藹可亲，严于责己、宽以待人，颇得军心，深受人爱戴。

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张献忠把明兵部尚书杨嗣昌所率的主力屯在四川，突然兵出湖北，围攻襄阳。襄阳地控江汉，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张献忠连攻数日，一直不能得手。李定国献计说：“襄阳城固，不可强攻，只宜智取。”并自告奋勇，要求化装打入城内，实行里应外合。张献忠同意，于是李定国率二十名健卒，化装成官军模样，带着截获的杨嗣昌发往襄阳的檄文、符验，进入襄阳，被襄阳城内守将安置在承天寺中。时至半夜，李定国等在城内四处放火、往来冲杀，并乘守军慌乱之际，杀上城楼，大开城门。埋伏于城外的义军，涌入城内，只费了几个时辰，张献忠就全部占领了襄阳城，杀了襄王朱翊铭，粉碎了杨嗣昌的“圆盘围剿”。

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定国随张献忠夺取了武昌，拥立张献忠为大西王。崇祯十七年，李定国随张献忠挥军入川，破夔门（今四川奉节），陷涪陵，占重庆，犹如风卷残云，八月占成

都，张献忠登基，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自为大西王，亦称秦王。分全军为一百二十营，命孙可望为平东将军，统十九营；命李定国为安西将军，统十六营，命刘文秀为抚南将军，统十五营，命艾能奇为定北将军，统十二营。他们四人皆为献忠养子，合称“四将军”，专事征战，构成大西军作战的主力。

清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清军占领北京，然后在吴三桂、洪承畴、尚可喜、耿精忠的引导下，继续追击大顺。李自成寡不敌众，退守关中。顺治三年秋，张献忠出师川北，部将刘进忠叛变，引清军乘迷雾偷袭张献忠大营。在突围时，张献忠被箭射中，壮烈牺牲。张献忠死后，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率领大西军，继续抗清。但根据当时情况，为保存实力，避开清军锋芒，遂率军撤离四川，向贵州转移。当时贵州和西南各地控制在南明桂王手中，与大西军处于敌对状态，闻大西军南下，派军阻击。大西军且战且进，于顺治四年（1647年）正月，进抵遵义。稍事休整，然后挥师南下，渡过乌江，克定贵阳。二月中旬占领定番（今贵州省惠水）以后，他们商讨今后出路和作战方略。孙可望主张进军广西，继续与南明周旋，如战事不利，可转入南海。李定国反对此议，主张西进云南，联明抗清，他说：“当今之际，清军大举南攻，国破家亡，生灵涂炭，我们与清军誓不两立。大敌当前，如果还与明军厮杀，我们将腹背受敌，而清军势必坐收渔人之利。只有联明抗清，深入云、贵，站稳脚跟，养精蓄锐，然后东出湖广，北取中原，才能打出天下。”将士们都拥护李定国的主张，孙可望也只好同意，而且孙被推为主帅。顺治八年，明永历帝封孙可望为秦王，大西军联明抗清正式开始。

二、巧用象队 智胜清军

孙可望受封秦王，住在贵阳。让李定国回昆明去镇守云南。李定国回到云南，努力加强军事建设。为了充实军队的供应，他规定把昆明附近的田地和盐井统一归政府管理，老百姓只要把产品的十分之四交给政府就行了。“官四民六”的赋税，比明朝的赋税少了很多，深受百姓拥护。这样既解决了军队的供应，又减轻了百姓的负担。李定国还下令把各地对军事上有用的工匠都召集来编在军队里。工匠参加了军队，不但可以修造武器，还能逢山开路，遇河搭桥，挖地道，架云梯，修筑防御工事等等，使部队的战斗力得到明显加强。

李定国在设法解决军队供应，武器装备和工兵建设的同时，还天天操练兵马，一年功夫练出三万精兵。他又特地从缅甸等地买来许多大象，组成一支特种兵——大象队，请专人进行训练。在他进行桂林之役时，这支大象队起了很大作用。

清顺治九年，明永历六年（1652年）三月，李定国在军事上已经做好准备，便写信给孙可望，建议向清兵发动一次大反攻。孙可望命征虏将军冯双礼领兵伴随李定国，组成东路军，以八万兵马攻湖南。命刘文秀和讨虏将军王复臣、万军都督白文选组成北路军，以六万兵马攻四川。北路军于七月收复叙州（今四川宜宾市）和重庆，活捉了清军督统白含贞、白广生，把清军攻四川的主将、平西王吴三桂围困在保宁（今四川阆中县）。十月，吴三桂突围回到汉中（今陕西南郑县），王复臣战死，但四川大部分地区已收复。王复臣死后，白文选另带一支部队从重庆出发，配合东路军攻入湖南。

北路军进展顺利，东路军也获得了很大胜利。这年五月，东路军攻克了沅州（今湖南黔阳）、靖州（今湖南邵阳），杀了清军总兵杨国勋，清军主将沈永忠退守湘潭。此时，李定国驻扎在靖州以东的武岗。当他了解到桂林的防务空虚，便于六月带兵南下，并分兵三路：右路夺取桂林以北的重要据点严关，左路攻全州，他自己率中路直取桂林。

左路军出师先捷，李定国要求他们暂时不要急攻全州，防止全州之敌突围窜向桂林，加强桂林的守军力量。命令还没有传到左路军那里，全州已被拿下。李定国当机立断，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一鼓而下桂林。三路大军在严关会合后，即对清军展开了猛攻。双方正杀得难解难分的时候，李定国命令大象队参战。当时正遇上雷雨天，这些庞然大物在雷鸣闪电中一冲而上，搅得敌阵大乱。清军横尸遍野，狼狈溃逃。李定国趁热打铁，昼夜围攻桂林，清军主将、定南王孔有德自杀，七月初四攻克了桂林。接着，李定国又攻克了柳州、梧州、永州（今湖南零陵）、衡州（今湖南衡阳），直抵长沙。

李定国的节节胜利，使清朝统治者大为震惊，十月，清廷派皇族敬谨亲王尼堪率领十万大军扑向长沙。李定国在胜利面前冷静地估量了一下形势，觉得自己的部队虽然士气很高，但经过半年多的连续作战，没有得到很好休整；清军来势凶猛，又是精锐的主力，便决定撤出长沙，退守衡州。在衡州城下，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四天四夜不分胜负。李定国此时使出大西军惯用的以假隐真的战术，在11月23日的一场激战中，命令队伍假装打了败仗，边战边退，直把清军诱进预设的埋伏圈里，然后层层包围，四面围歼。清军东冲西突，溃不成军，尼堪被斩杀，尼堪的

部队全军覆灭。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李定国歼灭和击溃数十万敌兵，杀死了两名位于王爵的主将。桂林、衡阳的两次胜利，是明朝抗清以来空前大胜利。

三、反对分裂 宁死不降

桂林、衡阳的胜利带来的大好形势，不久即被孙可望所破坏。

李定国的战功，使孙可望大为嫉妒。孙可望在他的部将怂恿下，决定亲兵到前线，想打个漂亮仗来提高自己的声望。在去前线时，孙可望把明永历帝赐给李定国军队的赏银八万两减到一万两，还把永历帝封李定国为西宁王的诏书扣下不发。孙可望到了湖南，又派人让李定国到沅州去见他。当时有消息说，孙可望想在沅州把李定国扣留起来。李定国为了避免和孙可望发生冲突，便把大部兵力留在湖南，防守已经克复的地方，自己率领部分兵马到两广一带去和敌人作战。

顺治十年（1653年），李定国进攻肇庆和桂林没有得手，就采取逐步发展的打法。他先攻打两广交界地区的一些小州县，当攻下广西的贺县、平乐和广东的化州、石城（今廉江）、高州（今茂名）、罗定、电白、阳江和阳春等州县之后，接着就围攻广州。清军镇守广州的主将是明朝降将、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继茂。后来，清军统制朱玛喇又从南京调兵支援，清军兵力占了优势。这年十二月，李定国与清军在新会附近的珊洲打了一仗，遭到敌军夹击。为了保存实力，李定国兵退南宁。

李定国围攻广州时，曾经写信给郑成功，要求他派兵支援。

郑成功派部将林察、周瑞等率水师参加广州战役，但行动迟了一步，四月才到达虎门，这时的李定国已退南宁。顺治十二年五月，刘文秀率六万军队，战舰千艘，从四川出三峡，先进军湖南常德，再兵分两路攻打岳阳和武昌，都没成功，只得退守贵阳。

由于几次战事失利，西南地区抗清的形势不断恶化。而这时的孙可望，篡夺皇位的野心却愈来愈大。清顺治十一年三月，孙可望知道明永历帝曾两次秘密派人去请李定国保驾，立即捕杀了参与这一事件的大学士吴贞毓等十八人。从此，孙可望要除掉李定国更为心切，顺治十三年正月，孙可望再次派部队去南宁攻打李定国。这时，李定国的部队总共还不到一万人，他一面主动撤出南宁，一面寻机在田州（今广西田阳）打了一次突袭，获胜。孙可望兵败田州，估计李定国会领兵去保护明永历帝，即派白文选劫持永历帝去贵阳。白文选原是李定国部下，也是一个力主联明抗清的将领，他推说车马一时准备不齐，故意推迟回贵阳的日期。三月，李定国赶到永历帝住所，护卫永历帝来到由刘文秀镇守的昆明。因这次护驾有功，李定国被封为晋王。

为了争取孙可望停止搞分裂，李定国、刘文秀派白文选到贵阳去进行劝说工作，并于顺治十四年四月，将孙可望留在昆明的家小送到贵阳。孙可望不仅不听劝说，反而以十四万大军杀向云南，八月，双方在交水（今云南霁益）决战，孙可望各营将士倒戈，高呼欢迎晋王，孙可望一败涂地，逃回贵阳，贵阳守将不纳，乃率十几人投降了清军，向清军提供了大西军的全部机密和云、贵山川的形势。

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军从四川、云南、广西派出三路大军，一起压向贵州和云南。重庆、贵阳、遵义相继失守。尔后，

清军以信郡王铎尼为统帅，兵分三路进攻云南。北路的吴三桂从四川南下；南路的卓布泰从广西西进，中路的洛托、洪承畴从湖南攻入贵州后由铎尼亲自统领。吴三桂军进入云南后，永历帝在李定国的保护下，从昆明向西撤退。

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军占领昆明后继续西追。李定国集结溃散的将士，选出六千精兵，在怒江以西二十里的磨盘山（高黎贡山的一支）的狭路上设置三道伏兵，准备敌军进入“口袋”后，进行首尾夹击。本来吴三桂军已中计，先头部队已进入埋伏圈，正当进入第二道伏兵线时，李定国军的大理寺卿卢桂生叛变，设伏失败。打伏击的计划虽然遭到破坏，它却给清军沉重一击，清军死了十余名都统以下的将领和几千精兵。

磨盘山之役后，永历帝慌忙逃入缅甸，和李定国失去了联系。李定国一面在滇缅边境继续坚持抗清，一面派人到缅甸境内寻找永历帝。当他得知永历帝在缅甸都城阿瓦的者梗时，曾先后三十余次派人去接永历帝，由于当地政府和永历帝随身臣僚的阻扰，皆未成功。这时，边境条件非常艰苦，白文选在部属的胁迫下降清，但李定国的抗清意志始终没有动摇。

顺治十八年（1661年），吴三桂统率十万大军开进缅甸，康熙元年（1662年），二月，缅王将永历帝及其亲属交给了吴三桂，四月，永历帝在昆明被吴三桂所杀，南明王朝至此灭亡。

李定国得知永历帝被杀的消息时，正转战于勐腊，但由于积劳成疾，病情日益恶化。这一年六月，因忧愤而病逝。临死前，他对部下说，宁可死在荒凉的边地，决不可投降！剩下来的几千名大西军士卒，因为失去了统帅，也逐渐散去。

李定国出身贫家，但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成长为一个有远

见、有胆略、有抱负、有才干、英勇善战、百折不挠的名将。他死以后，勐腊地区的各族人民，为他建起了一座“汉王庙”，奉祀不绝。

施 琅

施琅(1621~1696年)，字琢公，福建晋江（今泉州）人。早年为郑芝龙部将。顺治初年随郑芝龙降清，隶汉军镶黄旗。历任副将、总兵、水师提督，一度转为内大臣，康熙年间再起为水师提督，攻灭台湾郑氏政权后，封为靖海侯。施琅是清初著名的战将。

一、积极练兵 全力备战

施琅最初是明总兵郑芝龙部下的左冲锋。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平定福建，施琅随郑芝龙投降。随从大军去征讨广东，平定顺德、东莞、三水、新宁各县。郑芝龙被挟持到了京师，其子郑成功逃回海上，占据了海岛。郑成功招施琅回岛，施琅不肯听从。郑成功派人拘捕了施琅，同时囚禁了他的家属。施琅用计逃脱了，但他的父亲施大宣、弟弟施显及子侄都被成功杀了。顺治十三年（1656年），施琅跟随定远大将世子济度在福州打败了郑成功，清廷授他为同安副将。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攻占台湾后，清廷提升施琅为同安总

兵。

康熙元年（1662年），施琅被提升为水师提督。这时郑成功已经过世，他的儿子郑锦企图入犯海澄，施琅派遣宁备汪明等率领水军到海门抵御，斩杀了郑军将领林维，缴获了战船、军械。不久，靖南王耿继茂、总督李率泰等攻克厦门，敌方震惊溃败，施琅招募荷兰国水兵，用夹板船前去拦腰攻击，斩首一千多，又乘胜追击攻取了浯屿、金門两个岛。叙录战功，施琅被加授右都督。康熙三年，被提加为靖海将军。

康熙七年（1668年），施琅秘密向清廷奏述郑锦在海上负隅顽抗，应该迅速去进攻他们。康熙召施琅到京师，亲自向他询问计谋策略，施琅说：“盘踞在台湾的贼兵不过几万，战船不过几百艘，郑锦这人又智勇全无。如果我们先攻取澎湖来掐住他们的咽喉，贼势立即会减损；如果他们再凭借地势的险固顽抗，那么就派重兵停泊在台湾港口，然后另以奇兵分路袭击南路打狗港及北路文港海翁堀。敌兵分散力量就薄弱了，聚合则势态就穷蹙，台湾的平定则可计日而待。”但此事下六部讨论，没有按施琅的奏章去实行。因裁减水师提督，清廷授施琅为内大臣，隶属镶黄旗汉军。

康熙二十年（1681年），郑锦死，他的儿子郑克塽年幼，将领中由刘国轩、冯锡范管事。清内阁学士李光地奏报台湾可以攻取的情况，因此向上推荐施琅，说他熟悉海上事务，康熙再次授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嘱咐他伺机发兵前去攻取。施琅来到军中，上疏说：“敌船在澎湖长久地停留，全力地固守，冬春之际，飓风时有发生，我方战船难以迅速过洋。我现在训练教习水师，又派间谍去交通我以前的部属，使他们作为内应。待

到天气气候适宜时再进攻，必能大获全胜。”康熙二十一年，给事中孙蕙上疏说应该缓征台湾。七月，有彗星出现，户部尚书梁清标再次对此事发表意见，朝廷于是下诏暂缓进剿。施琅上疏说：“我已挑选水师精兵二万人、战船三百艘，足以攻破消灭海贼。请求催促督抚办理粮饷事，只要遇到对我们有利的风候，就可以发兵启行，同时请调陆路官兵协助进剿。”皇帝下诏，表示同意他的意见。

二、攻占澎湖 收复台湾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施琅从桐山攻克花屿、猫屿、草屿，乘南风行驶并停泊到八罩。郑将刘国轩盘踞在澎湖，沿岸筑起短墙，购置了腰铳，环围有二十多里作为壁垒。施琅派遣游击蓝理用乌船进攻，敌舰乘涨潮从四面涌合。施琅乘着楼船突入贼阵，被流箭射伤了眼睛，血从帕巾中溢出，但他督战毫不退却。总兵吴英接替了他，斩首了敌人三千多人，攻克了虎井、桶盘二岛屿。紧接着施琅将一百艘战船分列东西二路，派总兵陈蟒、魏明、董义、康玉率兵往东指向鸡笼峪、四角山，往西指向牛心湾，以分散敌人兵力。施琅亲自督领五十六艘船分成八队，以八十艘船紧跟其后，扬帆直驰进去。敌方倾巢出来拒战，总兵林贤、朱天贵先入战阵，朱天贵战死。将士们从正中奋勇出击，从辰时战到申时，焚烧敌舰一百多艘，溺死的敌兵不计其数，终于攻下了澎湖。

在攻战中，施琅显示出了他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他治军严肃整齐，通晓阵法。尤其善于水战，熟悉海上风向气候。在攻打澎湖时，一次施琅要出师，正好李光地想赶紧回去，就问施琅：

“大家都说刮南风不利出战，如今就限在六月出师，为什么呢？”施琅说：“北风刮起来日夜都很猛烈。现在进攻澎湖，不可能一战就攻克下来。风起船只被吹散，将领如何指挥作战？夏至前后二十多天里，风小，夜里尤为安静，战船可集中停泊在汪洋上。见机行动，不过七天，举事必定取胜。假使偶然遇有飓风，那么这是天意，不是人事先所能考虑到的。郑氏的将领中刘国轩最为勇猛，用其他将守卫澎湖，虽然战败，他们必定要再战。如今以刘国轩驻守，战败了就会胆怯，台湾就可以不战而下。”到作战时，东南方向起了云，刘国轩望见，说是将起大风，极为欢喜。可过了一会，雷声隆隆，刘国轩推开案桌，突然站起来说：“这是天命啊！我今日要打败仗了。”澎湖被施琅占领后，刘国轩逃回到台湾。

郑克塽得知澎湖失守，大为惊恐，遣派使者到施琅军前乞降。施琅上疏奏陈，康熙允许接纳郑氏。八月，施琅统帅水军进入鹿耳门，到达台湾。郑克塽率领属下剃了头发，跪迎于水岸，缴出延平王金印。人们以为施琅一定会报父仇，对郑氏下毒手。施琅说：“孤岛新附，一有诛杀，恐怕人心反复无常。我之所以要含忧饮痛，是以国事为重，不敢顾及私仇啊！”

台湾平定后，施琅从海道向朝廷报捷。奏疏传到京师，正值中秋佳节，康熙赋诗表彰施琅的功勋，再次授他为靖海将军，封靖海侯，世袭永不废弃，还赐予御用袍服及其他衣服物品。施琅上疏推辞所封侯爵，请求按内大臣的样子赐予花翎，部里讨论说没有这样的先例，康熙命令不要推辞，并遵照他的请求赐予花翎。

三、建立府县 建守台湾

清廷派遣侍郎苏拜到福建，与督抚及施琅商讨攻下台湾后如何妥善处理有关遗留问题。有人提出应该迁移那里的人民，放弃那里的土地，施琅上疏说：“明末在金门设澎湖水标，从军队戍防地直到澎湖为止。台湾原来就属于中央教化不到的地方，土番杂处，没有划入版图。然而当时中国的老百姓偷偷去那里生活聚集，已不下一万多人。郑芝龙为海盗时，占据台湾作为巢穴，到崇祯元年，郑芝龙接受明朝安抚，将台湾借与荷兰红毛鬼，作为互市的地方。红毛联结土番，招纳内地百姓，渐渐形成了边患。到顺治十八年，郑成功盘踞了这块土地，纠集亡命之徒，毒害海疆。郑成功传到其孙郑克塽，总共已有几十年了。一旦收复土地归回朝廷，妥善处理遗留问题，尤其应当周全详尽。如果放弃那里的土地，搬迁那里的人民，用有限的舟船，渡无限的百姓，不经历数十年，是难以完成的。如果渡载不尽，有人逃窜隐匿到山谷中，就是所谓的凭借寇兵而供给强盗粮饷。况且此地原来为红毛鬼所掌握，如果他们钻空子再来占据，必定暗中窥测内地，蛊惑人心。借重夹板船的精坚，在海外所向无敌，沿海各省，断然难以安然无虞了。到时可千辛万苦派兵远征，恐怕还不容易见成效。如果仅仅驻守澎湖，那么必定是孤悬在汪洋之中，土地单薄，远离金门、厦门，难道不受他们的制约，而能为我一朝独立统治吗？我想海上战事平息之后，应淘汰内地设的官兵，分别去防守二个地方：台湾设总兵一人、水师副将一人，陆军参将二人，兵八千；澎湖设水师副将一人、兵二千。开始时虽然没有添兵增饷的经费，但足能牢固地防守了。那里的总兵、副将、参将、游击

等官，规定二、三年转升到内地。那里土地的正赋杂粮，暂时实行蠲免。驻军现在先给发全饷，三年后征粮接济日用，即可不必完全从内地转运。大凡筹划天下形势，一定要考虑周全，台湾虽然是大陆以外的岛屿，但关联到四省要害，绝对不可放弃。同时我要绘地图进献。”奏疏上报朝廷，下到议政五大臣等人中讨论，仍然没有定论。康熙召来廷臣询问，大学士李蔚上奏说：应该如施琅的请求去做。接着，苏拜等人奏疏也表示可用施琅建议，同时在台湾设三县、一府、一巡道，康熙下令允许照此实行。

施琅又上疏请郑克塽交纳土地归顺效忠于清朝，应带同族亲属与刘国轩、冯锡范及明后裔朱桓等都到京师，皇帝诏令授郑克塽公衔，授刘国轩、冯锡范伯衔，都隶属于上三旗，其余职官及朱桓等，将他们安插到近省去垦荒。再上疏请求重申严行海禁，考核贸易的商船。朝廷命令照他的意见办。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施琅去朝见康熙，康熙见了他十分高兴，下旨用十分温美的语言慰劳他，同时给他的赏赐也十分优厚。康熙勉励施琅说：“以前你任内大臣有十三年，当时还有轻视你的人。唯独我深深地了解你，对待你很优厚。后来三处的逆藩平定了，只有海寇占据着台湾，成为福建的祸害，想要消灭这些海寇，唯你莫属。于是我特别对你加以提升进用，你果然不负重托，一举攻克了六十年来难以扫平的贼寇，并将他们消灭干净。可能有时有人说你恃功骄傲，我就命令你来京城。也有人说应当把你留在京城不要往外派，我想在贼寇兴乱之际，我尚且用你不疑，现在天下已经太平了，怎么反而会怀疑你而不派你出任呢？现在我命令你再次赴任，当然你也要更加谨慎小心，以保功名啊！”施琅奏谢，说：“臣已年老力衰，恐怕不能胜任这封疆大

吏的重任。”皇上说：“将军崇尚的是才智而不是力气。我用你是用你的才智，那里是看你的手足之力呢？”命令施琅依旧还任。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施琅在任上去世，终年七十六岁。他死后，康熙下诏赠他为太子少傅，赐祭葬，谥号襄壮。

施琅为清廷攻克台湾，并在台湾制定一系列措施，揭开了台湾历史上新的一页。

郎 坦

郎坦（1634～1695年），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是内大臣吴拜的儿子。历任护军参领、副都统，后升迁为领侍卫内大臣，兼火器营总官，列议政大臣。清代将领。

康熙二年（1663年），郎坦以一等待卫代吴拜管佐领，升护军参领。康熙十三年（1674年），升任正白旗蒙古副都统，调本旗满洲。

顺治九年（1652年），驻防宁古塔的章京海塞派捕牲翼长希福前去抵御入侵的俄罗斯人，结果打了败仗。顺治帝下令诛杀了海塞，把希福抽了一百鞭子。顺治十一年（1654年），固山额真明安达理率师讨伐，在黑龙江打败了俄国人，但是却并未使沙俄军受到多大损失，他们不久又再次侵入精奇里江等处。顺治帝命大理寺卿明爱令其撤退，敌人拖延着不肯走，占据雅克萨城，并越过牛满、恒滚侵扰索伦、赫哲、飞牙喀及奇勒尔各部。

康熙二十一年秋（1682年），康熙帝命郎坦及副都统朋春等率兵前往索伦，临出发时，嘱咐他们说：“罗刹（对俄国人的称呼）侵犯我国的边境，依恃雅克萨城为巢穴，历时已久，不停杀

掠我国人民。你们到了达呼尔和索伦以后，要详细勘察陆上路径，沿黑龙江一带围猎，逐渐接近雅克萨，了解该城的情况和地形。估计罗刹不会敢于出战，如果出战，也不要同他们交锋，率众撤退就行了，我自另有安排。”当年冬天，郎坦返京师，报告康熙说：“罗刹人盘距的雅克萨，是一座木城，只要发兵三千，给二十门红衣炮，就可拿下来。陆路从兴安岭前往，冬天有冰雪，夏天多雨泥泞，只能轻装前进。自雅克萨至受濬城，黑龙江下行船须半月，上行船要三个月，比陆路慢一半，年来水路只能用来运粮饷、军器和辎重。现在我们共有大船四十艘，小船二十六只，必须增造五十只小船方才够用。”康熙听后说：“郎坦等认为要击退罗刹并不困难，我很同意他们的看法。不过，行军作战必须有充分准备才行，不可仓促行事，可以先调乌拉和宁古塔兵一千五百人，一面制造船舰，一面练习红衣炮和鸟枪。在爱琿和呼玛尔修建木城，与敌军相对抗，然后再选择适当时机将他们驱逐出我国边境。所需军粮，从科尔沁十旗及锡伯、乌拉等处共取一万二千石，可支用三年。从爱琿到索伦，中途可设置一处驿站。待我军已到达精奇里乌拉，命索伦供应牛羊。这样，将迫使罗刹无法站住脚，非撤走不可。”不久，郎坦被升为前锋统领。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都统朋春奉命率军征讨俄罗斯人，郎坦以副都统头銜随行。进军至雅克萨城，俄军头目额里克舍请求投降。郎坦向他们宣布了皇帝的诏令，赦免其罪过，命令他们撤走，将木城拆毁。但俄军反复无常，撤走以后于冬天又返回了回来。再次盘距在雅克萨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皇帝又命郎坦和副都统班达尔沙携带红衣炮，率藤牌军百人，与将军萨布素共同进军。六月，围雅克萨，敌军出战，当即予以迎头

痛击，斩额里克舍于阵。俄罗斯察罕上书请求朝廷解雅克萨之围，康熙帝答应了他的请求。郎坦撤军还驻守古塔，升任正白旗蒙古都统。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内大臣索额图等与俄国使臣会晤于尼布楚，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了边界。俄军拆毁所筑木城从雅克萨撤走。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噶尔丹叛乱，郎坦任安北将军，率领军队驻屯大同。后来升迁为领侍卫内大臣，兼任火器营总官，列议政大臣。康熙三十二年，以昭武将军头衔率军驻屯甘肃。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五月，郎坦奉命往盛京察看边隘，至杀虎口，突然病倒。六月病逝。时年六十二岁。

费扬古

费扬古（1645～1701年），清满洲正白旗人，栋鄂氏。出身贵族。他曾参与平定吴三桂的战争和讨伐噶尔丹叛乱。被封为一等公。

一、平吴三桂 讨噶尔丹

费扬古是三等伯鄂硕之子，人长得十分英武，身材高大。十四岁时，他就世袭了他父亲的爵位。

康熙十三年（1674年），费扬古从安亲王岳乐率军从江西征讨吴三桂。吴三桂的将领黄乃忠率领了一万多人进攻清军所占的长沙和袁州。费扬古和副都统沃赫、总兵赵应奎率军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后多次在征战中立功，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升领侍卫内大臣，列议政大臣。

准噶尔是厄鲁蒙古的一部，游牧于伊犁河流域。清顺治十年（1653年），该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死，其子僧格继位。沙俄多次诱骗其归顺，都被严辞拒绝。于是沙俄便极力挑拨准噶尔部的内部矛盾，收买内奸，于康熙九年（1670年）底杀害了僧格。不久，僧格之弟噶尔丹闻讯后从西藏返回，夺取了该部的统治权。他一上台，便开始与沙俄拉拢关系。到了康熙十七年（1678年），沙俄说噶尔丹是俄国最忠实的盟友。噶尔丹一面投靠沙俄，同时又与西藏的分裂势力相勾结，大肆向周围各部进行扩张。这一年他进兵南疆，兼并回部。他又在第二年攻袭了青海的和硕特部，自称要“圣上（康熙）君南方，我长北方”。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夏，噶尔丹率兵三万，越杭爱山，大举进攻喀尔喀蒙古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廷授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参赞军事。这年秋天，清军在乌兰布通与噶尔丹所率二万叛军展开激战。在清军猛烈的炮火下，叛军的“驼城”被摧毁，死伤惨重。噶尔丹率残部渡过西拉木伦河，越大磧山逃遁。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费扬古被任命为安北将军，驻兵于归化（今呼和浩特）。第二年，噶尔丹派使者求见费扬古，要入贡天朝。费扬古恐其有诈，乃发兵去声言护送入贡，见入贡的男男女女有一千五百人之多，于是就把他们留在了归化城。向皇上奏疏，说明了这些情况，在奏疏中，他指出了噶尔丹表面要修好，暗地里派这么多人入贡是想探窥中原的虚实。皇上命侍郎满丕传谕，命令噶尔丹的使者返回，不用入京。七月，听说噶尔丹又想窥探图拉。上诏命费扬古和右卫将军希福率大军前往防御。过了一段时间，见噶尔丹没有发兵，就又率军返回了归化城。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清廷获悉噶尔丹“蠢动声息”，一

面命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整兵预备，于要冲之地设防，相机进剿；一面命费扬古兼右卫将军，将西二千里防线防卫好，同时命其准备粮草，以备来年进剿之用。

二、深入不毛 剿灭叛军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秋，噶尔丹果然率兵三万，沿克鲁伦河而下，进距巴颜乌兰，并且扬言：“借俄罗斯鸟枪兵六万，将大举内犯。”

第二年春，康熙帝决意亲征。清军兵分三路：康熙帝亲率禁旅为中路，出独石口，渡沙漠，直趋克鲁伦河，进击噶尔丹叛军主力；费扬古被封为抚远大将军，率陕西、甘肃、宁夏之军为西路，从宁夏渡沙漠，挺进土拉河，遏叛军之退路，萨布素指挥的黑龙、吉林、盛京兵及科尔沁蒙古兵为东路，出索岳尔济山一线，遏叛军东窜之路。皇上谕费扬古，期四月于图拉会师。

二月十八日，费扬古率西路军从归化城出发，三十日，康熙帝亲率禁旅自京师起程。费扬古率军从翁金口走，经乌兰厄尔几，到察罕河，与孙克思师会于此。这时皇上已顺克鲁伦河深入。见西路军尚未跟上，将原来命东路萨布素向西挺进的计划做了调整，命萨布素率所部于喀尔喀河一带待命。四月中旬，西路和中路军齐向克鲁伦河进逼，五月八日，中路军进抵克鲁伦河后，噶尔丹望风先遁。费扬古上奏说：“我们所经之草地，草尽为贼所焚，不得已只能绕道而行来秣马，因遇雨，运粮又未跟上，结果行军迟缓，已经走了七十多天了，希望皇上能缓行军，否则我军人困马乏，难以追上。”康熙进军到西巴尔台，又进至额尔德尼拖洛海。噶尔丹听说皇上亲自督师来剿，就登上升孟纳尔山，遥

望御营，见御营旌旗招展，军威大盛，大惊失色，丢弃了帐篷、器械等辎重逃走。康熙命马思喀为平北大将军，追剿噶尔丹。同时密令费扬古，绕道于噶尔丹背后，前后夹击之。费扬古侦知噶尔丹到了特勒尔济，就命前锋统领硕岱等人率兵前往挑战，且战且退，将敌引至昭莫多。

昭莫多（蒙古语大树林的意思），在肯特山之南，汗山之东，土拉河之北，地势平旷，自古以来就是漠北的战场。费扬古分兵三路，东面是京城和西安的诸军和察哈尔蒙古兵，屯于山上。西面是右卫大同诸军和喀尔喀蒙古兵，他们埋伏在河边。孙思克率领绿旗兵居中，同时遵上所嘱，战时皆步战，追时始乘马。前面的清军把敌人引入包围圈后，清军开始对叛军围攻。叛军为了争夺高地，多次发起冲锋，都被击退，士气大挫，阵势动乱。这时，费扬古指挥伏骑冲入敌阵，叛军招架不住，开始溃败，清军乘胜掩杀追击。但噶尔丹尚有一万多军冒死鏖战，从未时到酉时，战斗打得十分激烈。费扬古遥望噶尔丹的后阵不动，估计到这是噶部妇女和驼畜所在之处，就率领精锐之师袭击噶尔丹的辎重，叛军大乱。费扬古连夜追敌三十多里，到特勒尔济口，斩敌三千余人，俘虏数百人，缴获驼马、牛羊、帐篷、器械等物品无数。噶尔丹之妻在战斗中也被打死。噶尔丹仅引数骑逃去。这一仗，噶尔丹叛军的主力几乎被全歼。

昭莫多之战，费扬古所率西路军获得大捷。

皇上下令班师还朝。命费扬古驻守科图，但不久又命他移师驻守喀尔喀郡王善巴的游牧地。在那里，又率军击败了噶尔丹的残部。噶尔丹命台吉丹济拉率一千五百人劫掠喀尔喀部的牲畜和粮食，费扬古命副都统祖良璧去抵御，追敌至翁金河，丹济拉败

而逃走。

康熙三十六年（1697 年），在清军的进剿下，噶尔丹众叛亲离，走投无路，遂于五月在阿尔阿塔台服毒自杀。至此，噶尔丹叛乱全部平定。皇上于是命令费扬古班师。是年六月，上命费扬古驻察罕诺尔，但因其有病，乃命昭武将军马思喀代领其军。费扬古还京师，仍任侍卫内大臣，进一等公。康熙皇帝下诏褒他说：“过去朕要亲征噶尔丹，许多人都不同意，只有费扬古和朕的意见相合。费扬古随朕西征进剿，一路克艰难险阻，不顾敌人的狡猾奸诈，大败敌军，壮我军威。这些年来，没有一个将军在统兵打仗上能超过费扬古。”又说：“多次出征才知道为将的艰难，费扬古相机调度，缓急得宜，真是个得力的将才！”

康熙四十年（1701 年），费扬古在去索约勒的途中病倒，皇上为此亲自去探视，赐给他御帐蟒袍、鞍马、银币五千，遣大臣护送他返回京师，不久就去世了。康熙闻知，赐祭葬，谥号襄壮，其子辰泰袭一等侯。

萨布素

萨布素（？～约 1710 或 1701 年），满族，姓富察氏，镶黄旗人。生于宁古塔（今宁安县西南），为清代著名的抗俄将领。

一、白山黑水 胸怀壮志

萨布素出生于清朝一个低级官员的家庭。他的父亲叫随哈纳。萨布素兄弟二人，他的弟弟叫党丹。萨布素幼时聪敏伶俐，天真活泼，深为长辈喜爱。从八、九岁开始，他就练习弯弓射箭。

十二、三岁开始，就能帮助父亲牧放马群了。到了他十八、九岁时，已经是臂膀有力，骑射娴熟，既机智灵敏，又老成持重，还粗通文墨。按当时的制度，“八旗子弟，人尽为兵”，凡男丁年在十六岁以上就可以“披甲当差”，但不是同时人人入伍，而是按照兵丁类别，定名额，在各佐领下“挑补”，分别立营训练，称为额兵。额兵以外有随甲，是武官的随从，此外均称余丁。因此，男丁披甲，必经挑选。萨布素就顺利地挑补披甲，而且引起新任班章京沙尔虎达的注意。不久，萨布素被提拔为笔贴式，留在沙尔虎达左右。笔帖式，译为书手，即主管文墨之事。在与沙俄的战斗中，多次显出他的英勇机智。传说他首次参加松花江战斗，就和瓦礼祐两人轻骑追击一股落荒而逃的敌人。在追击中，他俩到了一个虎尔哈人的村落，团结了当地的居民，消灭了这股窜逃的沙俄强盗；又一次，萨布素等追击一股俄兵，眼看敌人驾船逃窜，他毫不犹豫，打马入水泅去。俄兵向他射击，他便潜在马肚下，敌人以为他受伤淹死了。没料到，此时萨布素已潜到他们的船底，用刀把船底捅开了一个大洞。船沉了，敌人淹死了，而萨布素拽着马尾，泅回岸来。萨布素机智英勇，深受沙尔虎达等的器重，不久，他被提升为骁骑校，从此，他开始领兵作战。

顺治十六年（1659年）正月，沙尔虎达将军因病去世，他的儿子巴海被任命为宁古塔昂班章京（康熙元年改称宁古塔将军）。萨布素继续在巴海麾下任职。

顺治十七年（1660年），巴海率所部将士于松花江口一带巡逻，听说沙俄残匪窜到黑龙江下游“费牙喀部落西界”骚扰，立即挥军兼程前往。在当地各族人民的密切配合下，于古法坛村附近设下伏兵。当沙俄残匪乘船进入埋伏圈后，号角响起，埋伏在

两岸的清军船舰，迅速把俄军船只围困，并发起猛烈的攻击。在来如迅雷的打击下，俄军如惊弓之鸟，恐慌万状，有的被击毙，有的落水淹死，剩下的弃舟登岸逃命，又被清军和当地居民一阵追杀。这一仗，敌人被斩首六十余级，淹死得甚众，缴获颇多。

康熙三年（1664年），又有一股沙俄强盗沿石勒喀河入侵，进扰黑龙江下游。巴海将军闻讯即征调丁壮，治师东伐，乘雪夜袭破敌人于黑龙江，萨布素在这一战初露锋芒，因有功，被提升为防御。

二、屡建战功 巩固边防

从顺治十年到康熙二十二年（1653～1683年）这三十年中，萨布素一直在宁古塔将军属下任职。他不仅在抗击沙俄侵略者的战斗中屡立战功，而且在巩固边疆上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此期间，萨布素历任笔帖式、骁骑校、防御、佐领、协领、副都统等职。

1676年后，宁古塔将军移治吉林。萨布素以协领留守宁古塔，他主持招抚新满洲，先迁王钦部二百余户至宁古塔，编入满洲八旗，接着又从诺罗河，西喇沁招抚新满州三百余户，安置于宁古塔。因此，萨布素的主要政绩，也就是招抚新满洲。

巴海、萨布素等人十分注重农业生产，主要从这样几方面着手：

一、督促八旗官兵及其他旗人从事农业。二、建立官庄。三、任流人耕垦。这样，宁古塔的农业兴盛起来，土地开垦，农产品种类繁多。

萨布素、巴海等人还致力于加强东北边疆地区与内地的经

济联系，发展商业。同时，他们优礼流人。在流人中，吴兆骞、杨越等，为建设边疆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在抗俄斗争中，流人也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且在一些兵种或军事技能上，还可弥补驻防八旗的不足。这样，边疆的建设发展了。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春，康熙针对沙俄屡扰我边境，而决定反击沙俄，对进军黑龙江、反击沙俄侵略者，作为初步的部署。当尚书伊桑阿受命赴宁古塔监督造船时，康熙又命他传谕巴海等，让他们就清军进抵黑龙江后应驻扎何地等问题，详细地进行讨论，提出看法和建议。不久，巴海上奏，提出了一个“速行征剿”的方案。康熙看了巴海的奏疏，心中很不满意，批评他们“所议进征罗刹军务，殊为疏略”，决定变动黑龙江边防清军将领的人事安排，让将军巴海留守乌喇吉林，改命副都统萨布素率军挺进黑龙江。

1683年夏，遵照清廷的命令，乌喇和宁古塔官兵一千五百人，各分水陆两路行进，顺流而下，于三姓地方会合。萨布素即率领这支清军向黑龙江挺进。船舰从松花江驶入黑龙江，溯流而上。七月十三日，清军进抵特尔德尼城附近，忽然发现一股俄军乘船多艘，顺流而来。俄军见清军势盛，一片惊慌，妄图靠岸逃奔。萨布素立刻命令清军迅速包抄过去，把俄军围困。然后，他决定暂缓攻击。他派了二名军官去俄军船上，找到俄军头目，当面指出利害，要他们缴械投降。俄军首领梅利克尼见大势已去，只得乖乖投降。清军首战告捷，鼓舞了士气。

随后，清军进抵瑗珲、额苏里后，日夜建立基地。萨布素首次向清廷奏报：“冬季即将来临，届时炮具、军需运输困难，如果天降大雪，就更不使用兵，今冬可暂驻额苏里，俟来年四月冰

解，即往攻雅克萨城。”康熙同意，并指出，应在瑗琿建城永戍，预备炮具、船舰，设斥堠于呼玛尔，自瑗琿至乌拉设置驿站，由水路陆续运粮积贮瑗琿。

此时，萨布素理解了康熙要建城永戍的决心，立即表示了自己的决心。十月二十六日，清廷正式设黑龙江将军，任命萨布素为首任将军。当时，在选拔黑龙江将军时，兵部提名副都统席忒库等人，但康熙皆不以为然，只认为：萨布素“为人甚优”，堪当此任。黑龙江将军的建置，对于抗击沙俄侵略者、加强边防、开发边疆，具有现实和深远的意义。它和盛京将军、宁古塔将军（后改称吉林将军），奠定了后来东北三省建制的基础。

三、镇守远疆 两攻敌城

萨布素作为首任黑龙江将军，面临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主要是：一要建立基地，搞好战备；二要攻下俄军盘踞的老巢雅克萨，歼灭俄军主力，同时还要拔掉俄军在黑龙江中、下游的据点，彻底扫荡沙俄侵略军。

在建立基地上，萨布素主要是筑城屯田、运输粮秣和迁徙家口等事项。

起初，经过勘查，确定在瑗琿（旧瑗琿）筑城。由于兵力不足，萨布素请求增派筑城兵丁，清廷命副都统穆泰率盛京兵六百人，于来年（1684年）三月前往支援，很快建成一个方形城。不久，萨布素等考虑到旧瑗琿僻处江东，水陆交通及公文往来存在诸多不便，一旦有事，缓不济急，因而决定在黑龙江右岸托尔加城旧址建新瑗琿城。1684年秋，新瑗琿城建成，它“左枕龙江，右环兴岭”，成为边疆重镇。

萨布素率军挺进黑龙江时，携带的军粮只够到来年（1684年）六月，因此，造船运粮是急待解决的问题。1684年春，萨布素派军前水手一百五十人去吉林乌喇，再调打牲乌喇八家猎户六百九十人，宁古塔兵三百六十人，共同组成一支运输队，等到江冰开化，即把锡伯、伊屯河口等处贮存的粮秣运往瑗珲。同时，萨布素又调达斡尔官兵五百人赴额苏里耕种，扼守要地。与此同时，开始迁徙达斡尔官兵的家口。

在精奇里江和黑龙江中，下游的沙俄据点，处处遭到当地人民的袭击，形势有利于清军扫荡这些地方的沙俄侵略军。于是，萨布素作出如下部署：一方面大力进行“永戍黑龙江诸务”；一方面派遣清军，与当地各族人民配合，先拔除俄军在黑龙江中、下游的据点，然后再集中力量进取雅克萨，彻底歼灭沙俄侵略军。

1683年冬，萨布素即与朱尔铿格等联络，并派遣夸兰大鄂罗舜率兵扫荡精奇里江一带的俄军。在当地人民的配合下，这支精悍的部队不顾严寒，顶风冒雪，沿精奇里江上行。他们先抵多隆斯克，这里的俄军已闻风逃遁；再抵西林穆迪河畔的西林宾斯克，此地的俄军也溜了。随后，清军继续沿精奇里江而上，奇袭结雅斯克的俄军。这里的俄军还在睡梦中，就被包围了。鄂罗舜派人进敌寨去，勒令俄军投降。俄军束手无策，被迫投降，缴出火枪二十支；被关押的人质获得了解救。

1684年二月初，萨布素向清廷提出一个在黑龙江下游作战的计划。很快清廷批准了这个计划。这年四月黑龙江开江后，萨布素派出的官兵三百余人，由费雅喀人噶克当阿等作向导，前往黑龙江下游。这支部队进抵恒滚河，当地俄军先此逃遁。清军不

畏艰难，翻山越岭，直追到图库儿河，把这里的俄军据点包围，俘敌四十七名。

在用兵扫荡黑龙江中、下游俄军据点的同时，萨布素奉命释放俄俘宜番和米海罗莫罗对二人，让他俩带去清廷给雅克萨沙俄当局的一封信。劝俄军投降。

1684年初，宜番和米海罗莫罗对二人携此书信回到了雅克萨。当时，沙俄雅克萨总管是一个叫伊凡·沃伊洛奇尼科夫的哥萨克，他不顾清政府收复失地的严正立场及和平意愿，一方面要求俄军坚守雅克萨，准备顽抗；一方面派人去尼布楚、叶尼塞斯克和托博尔斯克等地，请求援助。沙俄政府得知清军挺进黑龙江，则进一步扩军备战，急忙在托博尔斯克召募了一支六百人的部队，由普鲁士军官拜顿率领，欲往雅克萨增援。随而把雅克萨从尼布楚督军区划分出来，成立雅克萨督军区，以加强和抬高其地位。当时麇集在雅克萨的沙俄侵略者约九百人。

1684年七月初，正当萨布素积极进行战备，并用兵于黑龙江下游的时候，康熙下达了一道谕旨，命令他进军雅克萨。萨布素并没有执行康熙的指令，即没有草率地出兵雅克萨，而上书建议于1685年四月进取雅克萨城。康熙听取了他的意见。第二年二月初，经过多方谋划，萨布素和瓦山等向清政府提出了一个进取雅克萨的作战方案。清廷批准了这个方案。为了加强黑龙江前线清军的领导，随即指派都统公彭春赴黑龙江任清军主帅，增派副都统班达尔善、护军统领佟宝、副都统马喇及奎仪使建议侯林兴珠等参赞军务。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四月二十八日，晴空万里。瑗珲城下，旌旗拓展，战鼓咚咚，号角齐鸣，船舰排列江中，战马伫

立江岸。一声令下，反击沙俄侵略者的水陆大军，威武雄壮，浩浩荡荡，齐向雅克萨进发。

五月，萨布素指挥的前锋骑兵进抵雅克萨城郊，扫荡了雅克萨外围。接着，清军兵临城下，水陆列阵，包围了雅克萨城。萨布素等布置了攻城方案：副都统雅钦、营门校尉胡布诺等从城南进兵，他们设立盾牌、土垄、施放强弩，佯攻迷惑俄军；副都统温岱、护军参领瓦哈纳、汉军提督刘兆奇等率兵把大炮安在城北，向城里轰击；护军参领博里秋、营门校尉乌沙、左都督何佑等率军用神威将军炮从东西两侧夹攻；副都统雅齐纳、镇守达斡尔提督白克等率水师封锁江面，以防敌人从水上逃走。

各路清军互相配合，猛烈攻城。炮弹呼啸着飞向雅克萨城，爆炸声震天动地，城里浓烟滚滚。在炮火的掩护下，清军手持刀矛、弓箭，呐喊冲杀。世世代代居住在这个地区的达斡尔人，索伦人和鄂伦春人，纷纷赶来助战。

在抗俄军民的猛烈攻击下，被困的俄军士气沮丧，混乱已极。被击毙的俄军横七竖八，受伤的躺在地上呻吟，有的匪徒吓得肝胆俱裂、抱头鼠窜。神父赫尔莫根手持十字架，不断祈祷，给俄兵打气助威。经过几天的激战，俄军伤亡很大。城里的商铺、粮仓、教堂、钟楼等，统统被轰塌或烧毁，塔楼与城堡则破坏无遗，而俄军寄望的拜顿援兵仍毫无音讯。这时，清军又在城墙下堆积木柴，准备火攻。陷于重围的沙俄侵略者彻底绝望了。他们为了保全性命，就由神父赫尔莫根领头去见托尔布津，请求他放弃抵抗，向清军投降。被打得焦头烂额的托尔布津，已感到山穷水尽，众叛亲离，不得不向清军乞降。

彭春、萨布素等当即接受俄军投降，并召见托尔布津，阐明

清政府的严正立场和宽大政策，令其全部撤离雅克萨，保证不再重来，就可以释放全部俄军，他们的武器、财产全部准许带走。托尔布津感激涕零，说：“我等十分感激阁下的宽大待遇，今后决不敢再侵犯中国。”随后，在清军宽大政策的感召下，俄军巴什里等四十五人不愿回俄国，要求留居中国，清军予以接纳。后来清政府都给予妥善安置。

托尔布津及其同伙灰溜溜地撤走了。清军焚毁了俄军修筑的城堡，然后凯旋回师，驻防于瑗珲等地。清廷决定再在黑尔根地方筑城驻兵。于是，萨布素率领部分官兵到墨尔根筑城。

托尔布津带领残兵败将狼狈地到达尼布楚。这时由拜顿率领的援军也到了尼布楚。沙俄侵略军的力量加强了，又激起他们重占雅克萨，进一步向黑龙江扩张的狂妄野心。七月，俄军五十人潜入雅克萨侦察，八月，他们回到尼布楚，他们向符拉索夫报告说：雅克萨城堡已被焚毁，但田地里的庄稼却没有遭损，而清军全部撤离。符拉索夫（尼布楚沙俄督军）认为这是重占雅克萨的好机会，立即派遣拜顿率领俄二百人前往。随后，败将托尔布津带领大批后续部队也返回雅克萨，他再次被任命为雅克萨督军。

俄军重占雅克萨后，立刻收割田间庄稼，同时着手在原城堡的旧址上重新筑城。他们建筑起一座更加坚固的城堡。城堡内修建了粮食仓库、火药库和军需仓库，贮备了大量的粮食、弹药和其它物资。

清廷忽视了俄军会卷土重来，而当地的中国居民却注视着俄军的动向，眼见沙俄侵略军重占雅克萨的强盗行径，他们探兵到俄军情况，在1686年初，报告了巡逻的骁骑校硕格色。硕格

色急驰加墨尔根，报告了将军。萨布素马上把这一情况奏报清廷，并且请求在黑龙江开江后，相机进剿。

为了进一步掌握俄军动向，清廷又指派索伦副总管乌木布尔代等前往雅克萨侦察。乌木布尔代等驰抵雅克萨，机智地俘虏俄兵鄂克索木果，摸清了俄军重占雅克萨的情况。康熙决定再次进取雅克萨，狠狠打击沙俄侵略军。

1686年三月，康熙下令进攻雅克萨，派遣郎坦、班达尔沙、马喇赴黑龙江军前，参赞军务，命令从博鼎率领的筑城种地的官兵内挑选二百人，驻扎在墨尔根，听候调遣；下令免去索伦和达斡尔人的当年贡赋。

1686年六月，萨布素等率领清军从瑗琿出发，向雅克萨进军。七月十八日，水陆会师于查克丹地方，进逼雅克萨城。萨布素等一如既往，释放俄俘鄂克索木果，让他给托尔布津送信，勒令俄军撤离雅克萨，不然，则消灭他们。托尔布津对清军的警告不予理会，反而指挥俄军潜出城来，鸣枪放炮，遥击清军。萨布素令护军参领马世基等以龙炮还击，把敌人打退。清军进至古城岛，在此安营扎寨。萨布素当即派出一支水师，扼据上游，防止沙俄增援；派出一支轻骑扫荡外围。

七月二十三日，清军列阵，开始攻城。郎坦等率兵在城北安设炮位，向城内轰击；副都统班达尔沙和雅钦等率军由城南冲击。托尔布津力图阻止清军逼近，派拜顿领兵出城迎战。班达尔沙指挥清军先以炮铳击之，毙伤俄军多人，又乘俄军惊魂未定之时，亲率清军挥刀杀入敌群，一阵砍杀，俄军势不能敌，大败回城。

雅克萨城南有个高土堆，为俄军据守。这股敌人跟城内的俄

军相呼应，居高临下，威胁和牵制清军。为了拔除这个据点，萨布素派副都统温岱率藤牌兵袭取此处。二十七日晚，清军在夜幕的掩护下，摸上土堆，待俄军发现，清军已至跟前，他们的炮火已无法施展。藤牌兵与俄军短兵相接，人人奋战，很快就消灭了这股俄军，夺取了此土堆。

清军夺取土堆，俄军若断手臂。萨布素预料敌人会来争夺，一面令据守的清军严阵以等，一面在两边设下伏兵。二十九日晨，浓雾弥漫，俄军果然来袭。待他们挨进土堆，一声炮响，土堆上的清军冲杀下来，两边的伏兵闻声而起，左右夹击，断敌归路。一阵掩杀，这股俄军终被歼灭。

经过几天来的战斗，俄军被击毙一百一十余人，士气大挫，再也不敢出战搦战了。但他们依恃坚固的城堡和强大的火力，负隅顽抗。当时，清军只有二千多人，大部分人使用弓箭刀矛作战，杀伤力较小，影响到战斗力的发挥，在敌人的坚城、火器之下，是不宜于攻坚作战的。萨布素等考虑到这种情况，决定进逼雅克萨城下，掘长堑，立土垒，围困敌人。俄军面临绝境，狗急跳墙，疯狂反扑。激战持续了四个昼夜，俄军屡败，连其头目托尔布津也身负重伤。没过几天，这个背信弃义、穷凶极恶的侵略强盗，就一命呜呼了。

托尔布津死后，俄军改由拜顿率领。他们龟缩城里，欲进不能，欲退不得，完全成了瓮中之鳖。这时，沙俄尼布楚督军符拉索夫也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忙从尼布楚派出俄军七十多人，由格里戈里·隆沙科夫率领，前来救援雅克萨被围困的俄军。隆沙科夫带领援军乘船下行，到达鄂尔多昆河口，他们就不敢再走水路了，改由山路潜入雅克萨附近。他们看到清军阵地坚固，防

守严密，难以偷袭，则不得不偷偷地溜回尼布楚。符拉索夫虽要救援雅克萨被困的俄军，也束手无策，无能为力。

严冬来临，清军不再强攻，而进一步加强了对俄军的围困。清军在雅克萨的东南北三面掘壕筑垒，壕外置木桩、鹿角，分兵把守；在城西对岸的岛上（右城岛）筑起清军的指挥部和过冬营寨，炮口正对雅克萨，控制江面；东西两岸驻扎水师，严防敌人由江上逃走；在离城六、七里的黑龙江上游的河湾内存放船只，另派一支部队守护，并防止沙俄从尼布楚方面增援。清军采用长期围困的战术，又调整了兵力，把疲疲的马匹发回瑗琿和墨尔根饲养，把博鼎率领的筑城兵二百人调到前线增援。在萨布素等人的布置下，被困俄军真是插翅难飞。

经过五个多月的围困，俄军面临覆灭的危险。他们不是被清军击毙，就是死于蔓延的坏血病。到1686年十一月，侥幸活命的俄军只剩下一百五十来人，而其中大部分人丧失了战斗力。俄军头目拜顿在给符拉索夫的报告无可奈何地说：“目前，我和哥萨克们生活在恶臭的横尸之中，大人，没有你的思维，没有你的命令，我决不敢下葬，免得陷于罪孽。大人，现在即使你允许安葬，也无人筹划此事，毫无办法做到。”这时，清军又在城南、北筑起高台，架起大炮，准备轰击。俄军完全陷于弹尽粮绝、束手待毙的困境。雅克萨旦夕可下。

1686年十二月，萨布素接到清廷下达的停止攻城并撤围的命令。原来，沙俄政府意识到武力侵占中国黑龙江地区的计划已不能得逞，为解脱雅克萨被困俄军的厄运，不得不接受清政府曾多次提出的和谈建议，同意举行中俄谈判。它急忙派遣使臣文纽科夫和法沃罗夫来到北京，通告清政府，沙俄政府已指派费耀多

尔·阿列克塞耶维奇·戈洛文为大使，前来同中方举行边界谈判，并请求清政府停战，乞撤雅克萨之围。清政府接受沙俄政府的请求，派御前侍卫马武等驰抵雅克萨，下达康熙谕旨：“令萨布素等撤回雅克萨之后，收集一所，近战舰立营，并晓谕城内罗刹，听其出入，毋得妄行攘夺，俟鄂罗斯后使至定义。”

萨布素奉命解除对雅克萨的俄军的包围，撤下了围城的大炮、防盾及各种攻城设施，并向俄军宣布，允许他们到黑龙江取水，由雅克萨至尼布楚的道路也允许通行。1687年五月，萨布素又奉命将清军后撤到查克丹驻扎。他对俄军仍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在军营周围筑有十分坚固的土墙，土墙外挖掘了战壕，设置拒马，壕旁竖立了木栅栏，沿土墙架设大炮，并增设岗哨，以防俄军的袭击。

四、有理有节 签订条约

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沙俄入侵的问题，是清政府的一贯方针。为此，它曾多次致书沙俄政府，要求俄军撤出中国领土，通过谈判解决中俄边界争端。

1686年十一月十日，沙俄的先遣信使文纽科夫和法沃罗到达北京。次日，他们向清政府递交国书，表示沙俄政府响应清政府的和谈倡议，即将派遣大使前来谈判，请求清政府撤雅克萨之围。清政府接受沙俄的请求，即派御前侍卫马武等驰往雅克萨，命令萨布素停止攻城。随后，又主动撤围，并指令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探听俄国使团到来的消息。

四月二十八日，中国谈判使团组成。首席代表是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使团成员都是重要亲信大臣。在使团出发之前，康熙

接见索额图等，回顾了中俄争端的原委，严正指出这是沙俄侵我边境造成的。强调了收复国土对于巩固东北边防、保障各族人民安宁的重大意义；确定了中国使团前往谈判的原则和方针。

萨布素做为黑龙江将军，奉命参加了中俄尼布楚谈判。这主要因为三个方面原因：一是萨布素带兵一千五百人，护卫使团，以防不虞；二是由他为使团提供后勤保障；三是他身黑龙江将军，熟悉这里的情况，了解敌情，便于在谈判中发挥作用。

八月二十二日，中俄两国使臣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在谈判之前，萨布素一再提醒索额图等，对俄方要提高警惕，一定要坚持让卫队上岸戒备，以防万一。

在谈判中，中俄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斗争。由于俄方顽固地坚持侵略立场，中俄谈判会议暂时中断，双方关系紧张起来。二十四日，俄方首席代表戈洛文一面指令雅克萨的俄军要特别小心谨慎，一面命令尼布楚俄军加强战备，在城的四周增派了三百名火枪兵。对于俄方的武力威胁，中国使臣，特别是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中方的护卫部队也加强了戒备，防止俄军袭击，使得戈洛文不敢轻举妄动。沙俄使团原打算用军事实力在谈判中镇住中国使团，胁迫清王朝就范。由于清使团早有准备，中俄双方军事实力旗鼓相当，沙俄的企图成了泡影。

在谈判中，中国使团本着和平谈判划定边界的诚意，有理有节，在作了一定让步的同时，对俄方提出的一切无理要求，坚定地予以驳斥。经过半个月的反复辩论和斗争，中俄双方终于达成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以及外兴安岭至海为中俄两国东段边界的协议，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

在谈判期间，萨布素等保证了中国使团及其护从部队的粮草供应，率军保卫了中国使团的安全，挫败了武力要挟的阴谋，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康熙帝以萨布素“累战功多”，下诏褒美：“目为将军第一”。

五、平定叛乱 开发边疆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萨布素率兵返回瑗珲，奉命于黑龙江、墨尔根二处设兵、筑城、浚隍、造庐舍、开屯田，加紧巩固边防，并把注意力投向西线，密切注视着噶尔丹叛军的动向。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七月，噶尔丹率叛军三万，以追击喀尔喀为名，越呼伦贝尔南下。清政府令尚书阿尔尼督蒙古兵迎击于乌尔会河，失利。噶尔丹叛军气焰十分嚣张，深入乌珠穆沁，进入克什克腾旗，距京师仅七百余里。康熙帝亲自组织反击，九月初，清军与叛军激战于乌兰布通。当时，叛军占领乌兰布通，环山布阵，缚驼足使卧于地，加箱垛于其背，上面再蒙以湿毡，环列如栅，形同城壁，称为“驼城”。叛军依山阻水，居高临下，固守顽抗。是月三日午后，清军发起攻击，先用炮火猛烈轰击叛军，摧毁“驼城”，随后步骑相继冲锋陷阵，叛军死伤累累，开始崩溃。次日，在夜幕的掩盖下，噶尔丹率残部渡西拉木伦河，越大磧山逃遁。

噶尔丹逃到科布多，一面纠合残部，以图东山再起；一面派人去俄国乞求援助。沙俄政府也派人到科布多与噶尔丹相约。萨布素在康熙三十四年（1695）初春，前往呼伦贝尔、索岳尔济山等地巡视，拟定了一个沿索岳尔济山一线设防的军事计划，上奏

清廷。清政府批准了他的计划，从此，萨布素成为整个东北地区清军的总指挥。

是年秋，噶尔丹果然率兵三万，沿克鲁伦河而下，进踞巴颜乌兰。第二年春，康熙帝决意亲征。清军兵分三路：康熙帝亲率禁旅为中路，出独石口，渡沙漠，直趋克鲁伦河，进击噶尔丹叛军主力；费扬古率陕西、甘肃、宁夏兵为西路，从宁夏渡沙漠，挺进土拉河，遏叛军之退路；萨布素指挥的黑龙江、吉林、盛京兵及科尔沁蒙古兵为东路，出索岳尔济山一线，遏叛军东窜之路。

五月八日（6月7日），康熙帝中路军进抵克鲁伦河，噶尔丹望风先遁。五月十三日，噶尔丹逃至昭莫多，又为费扬古所率西路清军阻截，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清军首先控制了周围的高地，埋伏起来，然后诱敌深入，把叛军包围。叛军为争夺高地，多次发起冲锋，都被击退，士气大挫，阵势动乱。这时，费扬古指挥伏骑冲入敌阵，叛军抬架不住，开始奔溃，清军乘胜掩杀追击，噶尔丹只引数骑逃去，这一仗，噶尔丹叛军主力被歼。

昭莫多之战，费扬古所率西路清军获得大捷。其实，萨布素率领的东路军屯兵于索岳尔济山一带，未能投入战斗。捷报传来，萨布素及其属下将士莫不欢欣踊跃，要求开赴前线，投入扫荡噶尔丹叛军残部的战斗。九月，康熙于归化城、鄂尔多斯一带，亲自主持对噶尔丹残部的清剿，萨布素率军来会。由于戎马倥偬，又加上上了年纪，萨布素的身体一直不太好，这时又患病，康熙决定让他在归化城调治。他只好一再向康熙请求，希望把率领的黑龙江兵开赴前线。康熙以黑龙江后“效力心切”，答应了

萨布素的请求，黑龙江兵投入清剿战斗，成为清军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清军的进剿下，噶尔丹众叛亲离，走投无路，遂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五月，在阿尔塔台地方服毒自杀。至此，噶尔丹叛乱被彻底平定，沙俄肢解中国的阴谋也随之破产。

萨布素在抗俄斗争中认识到，中俄双方虽已签订“尼布楚条约”，但更重要的是加强边防的军事和经济建设，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边疆的持久和平与安宁。因此，他在担任黑龙江将军期间，先后修建了瑷珲、墨尔根、齐齐哈尔三城，在这三座边防重镇分兵驻守，造船备炮，训练军队，增粮积贮，建立了较完备的军政统一指挥机构。他把黑龙江流域的少数民族青壮年编入八旗兵，就地保卫边疆、建设边疆。这样，既解决了兵源不足的问题，又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和团结。他还对一些主要地段进行重点设防，建立“卡伦”，组织巡逻，为边防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黑龙江地区地广人稀，有些地方千里无人烟，容易使沙俄乘虚而入。针对这一问题，萨布素实行了开边疆、屯田农垦的政策。他把土地、种子、耕畜和农具分给驻防各地的官兵，强调一边戍守边防，一边务农打粮。人口少，缺乏劳力，他就上奏朝廷，鼓励内地军民去东北军垦民屯，并主张将大批流犯发放到黑龙江地区。清王朝采纳了萨布素的意见，组织大批人员迁到黑龙江流域。这些人员带来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和传统的民族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一起，共同开发这块千年沉睡的宝地。萨布素十分重视保护和提拔那些有实际才干的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从而大大促进了边疆经济建设的发展。此外，萨布素还在民

众中兴办教育事业，努力提高边疆地区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水平。

萨布素采取这结进步措施，对于巩固我国东北边防，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大约在一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中俄两国边境基本上是平静的。

康熙三十七年十月（1698年），康熙诏谕萨布素，给一等阿达哈哈番，令其世袭，同时又以其亲御蟒袍、缨帽赐萨布素。

康熙四十年二月（1701年3月），萨布素被革职。因连年灾害，农业歉收，清廷谓其“捏报兵丁数目，浮支仓谷”。被革职后，他又被授予从二品散佚大臣，调他进京任职。过了些年，萨布素病逝于北京。

萨布素战斗在抗俄前线达五十年之久，其功不可没。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抗击沙俄侵略、巩固边防、建设边疆的事业，既有反对外来侵略的武功，又有治理地方的政绩。他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年羹尧

年羹尧（1679～1726年），字亮工，清汉军镶黄旗人，清前期著名的军事将领。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进士。先后任四川巡抚、四川总督、兼理陕西总督。被封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世袭。雍正三年末下狱，迫令自杀。

一、平叛西藏 抚定边疆

年羹尧的父亲叫年遐龄，曾任湖广巡抚。年羹尧在考中进士

后，初选为庶吉士，授检讨职务。随即充当四川、广东的乡试考官，经过多次调迁后升为内阁学士。康熙四十八年，被提为四川巡抚。第二年，幹伟生番罗都等人聚众劫掠宁番卫，杀死了游击将军周玉麟。皇帝命令年羹尧和提督岳升龙前往征剿安抚。岳升龙率兵前去，擒获了罗都，年羹尧带军行至平番卫时，听到罗都已被活捉，就引兵退回。川陕总督音泰为此上章弹劾年羹尧，府部大臣讨论认为当撤职罢官，但皇帝下令留任。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越嶲卫属下的土著和普雄的土千户那交等聚众作乱，年羹尧派遣游击将军张玉前去将他们剿平。

这一年，策妄阿喇布坦派遣他的部将策凌敦多卜侵袭西藏，杀死了拉藏汗。四川提督康泰前去征剿，刚出黄胜关，部队发生哗变，只得引军退回。年羹尧一面派参将杨尽信前往安抚慰恤，一面又向上密奏称康泰已失军心，不能再予以任用，并请求由他亲自到松藩协理军务。皇帝对他办事的忠实尽心很赞赏，于是派遣都统法喇率兵前往四川协助征剿。五十七年，年羹尧命令护军统领温普进驻里塘，增设打箭炉到里塘的驿站，不久又请求在四川增设驻守的边防军，皇帝都同意准办。皇帝很赞许他处治事情的明智迅速，因为巡抚没有督统指挥军队的权力，就特地任命他为四川总督，兼管巡抚的事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年羹尧因敌情叵测，请求带兵进藏作防备。朝廷大臣讨论后认为松潘各路军队都负有重要的军事任务，于是下令年羹尧不要亲自率军

出边，命法喇率部队前往。法喇带领副将岳钟琪安抚平定了里塘、巴塘。年羹尧也派遣知府迟维德招降了乍丫、察木多、察哇等地的土番首领，于此，年羹尧奏请召法喇率军班师还朝，皇帝同意了。

康熙五十九年，皇帝命令平逆将军延信率领军队从青海进入西藏，授予年羹尧定西将军的官印，从拉里出发去和延信会师，并询问年羹尧谁可以代理总督的职务。年羹尧说一时没有合适的人选，他请将军印信授给护军统领噶尔弼，同时将法喇的军队移驻打箭炉，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巴塘和里塘本来是云南丽江土府的属地，平定之后，云贵总督蒋陈锡请求仍然将二地归属丽江土知府木兴管辖，年羹尧说这二地是入藏运粮的要道，应该归属四川，皇帝同意了这么办。木兴率兵前去巴塘、里塘想收归这两地方，行军至喇皮，击杀了土番首领巴桑，年羹尧上疏参劾木兴。皇帝下令逮捕木兴，囚禁云南省城。八月，噶尔弼、延信两支军队先后进入西藏，策凌敦多卜溃败逃走，西藏平定。皇帝诏令年羹尧护卫作战凯旋的各路军队入边境，同时召法喇返回京师。

不久年羹尧又派兵安抚平定了里塘所属的上、下牙色，上、下雅尼；巴塘所属的阿坝、林卡石等地。康熙六十年（1721年），年羹尧到京城去朝见皇帝，皇帝命他兼任四川、陕西总督的职务。皇帝命令噶尔弼率兵驻守西藏，行军停驻在泸定桥时，噶尔弼病倒不能走了。年羹尧将此事报告了朝廷。皇帝命公策旺诺布代理噶尔弼为将军，额附（附马）阿宝都统武格为参赞军务，驻守西藏。青海索罗木之西有郭罗克上、中、下三个部族，是唐古特种人，多次出来肆意劫掠。阿宝将此事报告给朝廷，皇帝命

令年羹尧和岳钟琪估测形势，作出征讨计划。年羹尧上疏说：“郭罗克有三个隘口，都十分险峻，只适宜用步兵而不适宜用骑兵。如果我们多调动部队进去，则隘口上的敌人就会知道，从而使他们得早作防备，因此不如采用以土番攻土番的策略。我早就知道瓦斯、杂谷等地的很多土司都痛恨郭罗克部的肆意恶行，都愿意出兵帮助我征剿。我已移文岳钟琪，命令他从速赶赴松潘，出塞监督指挥士兵进剿郭罗克。”不久，岳钟琪督兵打败了郭罗克，攻下了郭罗克的寨子四十多座，抓获了他们的首领，其余的兵士也全部投降了。

自多西藏兵事起来之后，陕西地方州县无偿承担了军队全部供给的运输，使各地的国库所藏都出现了亏缺。年羹尧多次上疏弹劾陕西各州县的大小官员，严厉督责他们追缴偿还。陕西巡抚噶什图向皇帝密奏说，所亏缺的欠项已不能在短期追缴完纳，他又和年羹尧联名上疏请求向百姓加征火耗作为垫补。皇帝下诏谕说：“各省钱粮都有短缺亏空，而陕西更为严重。这是因为自从对西藏用兵以来，凡部队所经之地，都要资助马匹、盘费、衣服、食物等，时间紧迫，一时来不及向地方措办，就势必要挪用国库所藏，等到撤兵时也这样。就譬如自西藏班师回京，从将军一直到士兵，在途中所得到的各项补给供养，倒反比部队正规的给养粮饷要多。各位将军官员的费用开支，一动就要上万两，都知伸手取用而从不询问这款项是出自何处。年羹尧等人想追得州县亏欠的款项用来充作军饷，追索不得，又出点子要加征火耗。火耗之征只可以商量怎样减少、免除它，怎么可以再增加？我在位六十一年，从来没有向百姓加征过火耗。如今若听凭你们向百姓任意加派，就一定会导致与国家正项赋税一样的催索征

缴，真是肆无忌惮。著令传旨告诫！”同时他又下令发国库银五十万两送至陕西资助部队作粮饷之用。

雍正皇帝即位后，将抚远大将军允禔召回京师，命令年羹尧接管抚远大将军印和所职事务。雍正元年（1723年），授予年羹尧二等阿达哈哈番世代相袭的职务，并加赐其父年遐龄尚书衔。不久又加封年羹尧为太保。下诏撤回在西藏的驻防官兵。年羹尧上疏陈述有关边防的事情，请求在射箭炉边境之外的中渡河口岸上修筑土城，调岚州守备在那里驻守；大扩河南的保县防务，请调移威茂营千总驻守；越雋卫地方荒芜辽阔，土著番人和拉祜族人出没其间，建议改设游击职守，增兵驻守；松潘边境外的众多番族中，以阿树最为重要，宜给予他长官司的职衔；大金川土著头目莎罗奔曾跟从官军征讨羊峒，建有功劳，宜给予安抚司的职衔；乌蒙蛮族头目达木等人凶残暴戾，土著贵族子弟禄鼎坤等曾请求我们同意他们将达木等人擒获献给我大清，等他们如约来到后，可赐给禄鼎坤等人土职，并让他们分辖达木的领地。皇帝将此事下交有关部府讨论议决，同意照办。论平定西藏的功劳，以年羹尧运输军粮、守卫关隘有功，封三等公，并准予世袭。

二、进剿叛军 抚定青海

青海台吉罗卜藏丹津是蒙古顾实汗的孙子。雍正元年，他纠集了另外一些台吉吹拉克诺木齐、阿尔布坦温布、藏巴扎布等，劫持亲王察罕丹津背叛作乱，并劫掠青海的各部落。皇帝命令年羹尧率大军进讨，诏谕抚远大将军延信和主管边防、管理粮饷的所有大臣，以及四川、陕西、云南三省的总督、巡抚、提督，镇守，凡有关军事的事宜，都向年羹尧报告。十月，年羹尧率师从

甘州到达西宁。皇帝诏令改任延信为平逆将军，解除他抚远大将军的印信，改授给年羹尧，所有军队全部由年羹尧统领。年羹尧奏请任命前锋统领索丹、提督岳钟琪为参赞大臣，皇帝同意。论平定郭罗克的功劳，年羹尧又进封二等公爵。

年羹尧刚到西宁时，部队还没有大规模纠集，罗卜藏丹津探知这一情况后率军来进袭西宁，攻破了所有傍临西宁城的城堡，然后率军向西宁城进逼。年羹尧只带了几十名侍从端坐在城楼，仪态自若，毫不动容，罗卜藏丹津见后不知虚实，使引军稍稍后退，包围了南堡。年羹尧命令士兵去捣毁敌人的营垒，敌人知道官兵人数不多，也不多作防备，只是驱逼桌子山的土番当前队；清军发炮，土番被炸死者不计其数，这时岳钟琪的部队赶到，直接攻打敌人大本营，罗卜藏丹津大败而逃，官兵在后紧追不舍，敌军全面崩溃，罗卜藏丹津只带了几百人逃脱。

年羹尧于是向各部队部署任务：命令总兵官周瑛率兵截断敌人向西藏方向逃窜的道路；都统穆森带兵驻守吐鲁蕃；副将军阿喇纳率军队出噶斯边境，暂时驻扎布隆吉尔，另派参将孙继宗带领二千人马与阿喇纳会师。敌人侵袭镇海堡，都统武格率兵去支援，敌人包围了城堡，双方激战了六天六夜，这时参将宋可进又率军来援，敌人被击败逃跑，官兵杀敌六百多人，抓获了多巴囊素阿旺丹津。罗卜藏丹津又攻打西宁南川口，官兵坚守申中堡。敌人包围了申中堡，城堡内的囊素和敌人勾结，想凿穿城墙让敌人进来。守备马有仁等人极力抵抗，这时宋可进率军来援，于是城堡内外夹击，敌人大败逃走。所有暗中通敌、助敌的囊素全部被处死。年羹尧将战况依次奏报皇帝，并请让副都统花色等人统率鄂尔多斯兵士，副都统查克丹等人统率归化土默特兵士，

总兵马觐伯统率大同镇的部队，会师甘州协助作战，皇帝同意照办。

西宁北川、上下北塔的蒙、回土著群众准备起而响应罗卜藏丹津。年羹尧派千总马忠孝慰抚平定了下北塔的三十多个庄寨，上北塔没有顺服，马忠孝便率兵前往征剿，擒获并处死了他们的首领，其余的全部投降。察罕丹津逃至河州，罗卜藏丹津想劫持察罕丹津而去。年羹尧上章奏报，皇帝诏令封索诺木达什为贝子，并命年羹尧前去安抚慰问。敌人劫掠新城堡，年羹尧命令西宁总兵黄喜林等前往征剿，杀死一千五百多人，抓获敌人首领七名，缴获的兵械器具和获得的骆驼、马匹、牛羊等多得不可胜数。因天气寒冷，年羹尧命令黄喜林引军返回西宁。

不久，年羹尧又着手制定第二年的征剿进讨计划，他向皇帝上疏说：“请挑选陕西督标即西安、固原、宁夏、四川、大同、榆林等地的绿旗及蒙古兵共一万九千人，让岳钟琪等将领分而带领，分别从西宁、松潘、甘州、布隆吉尔四地出发进讨，同时分出部分兵力留守西宁、甘州、布隆吉尔，并在永昌、巴塘、里塘、黄胜关、察木多等处的所有关隘处驻兵防守。部队现有马匹数目不够，请求调发太仆寺所属上都打布孙脑儿繁殖的马三千匹，巴尔库尔骆驼一千头，并再在甘州、凉州增加购买一千五百头。所需粮食，我已经在西安预购了六万石。部队的重火器，请调发景山所制的火药一百驼，每驼以一百八十斤计算。”皇帝交朝廷大臣讨论，大家对年羹尧所请全部同意，并且增加调给马匹一千，火药在要求的基础上增加一倍。

察罕丹津下属的部落杀了罗卜藏丹津派去看守他们的将士前来归附，年羹尧向他们宣示了皇帝的旨意，并将他们安置在四

川边境处定居。墨尔根戴青的拉查卜和罗卜藏丹津一起劫持了察罕丹津，拉查卜的儿子察罕喇卜坦等人前来归附，年羹尧命他去招降拉查卜。还有一个叫诺门汗的堪布，是察罕丹津的侄子，在塔儿寺当喇嘛，他背叛朝廷跟从罗卜藏丹津，纠集了不少喇嘛与官兵对抗，这时他也来投诚归顺。年羹尧历数了他的罪行，下令将他处死。罗卜藏丹津进攻布隆吉尔，孙继宗和副将潘之善将其打败。西宁南川边的一些部落，年羹尧收伐并用，拓安了两个，扫平了几个，其余的也就都纷纷乞求投降。

雍正二年（1724年），皇帝以罗卜藏丹津背叛国家，叛逆之罪不容恕为由，特授岳钟琪为奋威将军，催促年羹尧进兵征讨。西宁东北的郭隆寺喇嘛跟随响应罗卜藏丹津反叛作乱，年羹尧命令岳钟琪和素丹等将领统兵前往征剿，敌人屯集在哈拉直沟一带抗拒。官兵奋勇进攻，越过三座高岭，捣毁十个村寨。宋可进、黄喜林和总兵武正安等都小有战绩。接着又继续捣毁敌人七个村寨。来到寺外，见敌人均埋伏于山谷之中，清兵于是利用火攻，歼灭了敌人六千多人，摧毁了郭隆寺，杀死了他们的首领。青海的几个贝勒将他们的母亲、妻子送到了年羹尧处，请求归附。年羹尧命岳钟琪等率军六千进一步深入敌后，留下素丹在西宁协助自己处理事务。

是年二月，年羹尧与岳钟琪屡败叛军。三月，擒获了罗卜藏丹津的母亲和许多亲戚，他只带了二百多人逃走。至此，青海部落全部平定。论功行赏，年羹尧被进封为一等公爵，另外授予精奇尼哈番的称号，并准许让其儿子年斌承袭，赐封年羹尧的父亲和他一样的爵位，并加太傅称号。同时授予素丹、宋可进三等阿达哈哈番称号，黄喜林二等阿达哈哈番称号。其他人也各有分

赐。

紧接着，年羹尧又率大军平定了河州边外的一些地方，并向皇帝建议解散北征的大部队，而分兵驻守，在所守之地设同知管理民事，设卫守管理屯粮等等，皇帝同意。不久，桌子、棋子二山的少数民族叛乱，年羹尧派岳钟琪率军征剿，转战近二个月，把叛军全部歼灭。

之后，年羹尧列条上陈妥善处理青海遗留问题的意见，对抚定青海大有好处。因此，这年十月，年羹尧进京朝见皇帝，雍正帝赐给他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辮、金币等。论功行赏，进加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世职，准许他的儿子年富承袭。

三、骄横放纵 敕令自尽

年羹尧才气旺盛昂扬，仗恃了皇帝对他的器重和恩遇，以及多次出师屡建战功的资本，又加之曾参与帮助雍正谋取帝位，骄横放纵，不可一世。他给各地总督、巡抚直接下达公文，给官员的信函都直呼其姓名。他向皇帝要求调配给他侍卫、随从军士，让他们在前面开导引路，在后面护卫押阵，为他驾双马车，搀扶下马。他进京觐见皇帝，总要叫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跪在道旁送往、迎接。到了京城，他经过的地方都要为他清道，禁止百姓和普通官员行走通过。亲王大臣到郊外去迎接他，他从不礼谢。在边境时，蒙古族的所有亲王、公爵见他都必须下跪，连额驸（驸马）阿宝请见他也如此。年羹尧曾经荐举陕西布政使吴期恒及景灏，说他们可委以重用，随即弹劾揭发四川巡抚蔡珪，并将他们逮捕判罪，皇帝立即将四川巡抚一职授予景灏，又提拔吴期恒为甘肃巡抚。年羹尧的仆从桑成鼎、魏之耀都是跟随年羹尧

从军而多次得到提拔，桑成鼎当上布政使，魏之耀成了副将。年羹尧奏请皇帝调拨几十名将领官吏来他处从军，皇帝同意给他。年羹尧朝觐回去后，马上题奏要求劾罢驿道金南瑛等人，同时奏请任命跟他从军的主事丁松代理掌管粮道事务。皇帝指责年羹尧上章题奏中有错误，命令吴期恒率带所有被年羹尧奏劾的官员前来京城。雍正三年正月，蔡珪被押送到北京，皇帝召他进宫晋见，蔡珪详细诉说了年羹尧暴戾贪婪、诬陷忠良的种种罪状，皇帝特地下令赦免蔡珪的罪行。

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庚午日，太阳和月亮同时升起，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五星联珠。年羹尧为此进疏庆贺，但他在奏章用了“夕惕朝乾”一语，雍正大怒，斥责年羹尧故意将词用颠倒，下谕旨说：“年羹尧不用朝乾夕惕这样的话来期望赞许朕，那么年羹尧的青海之功，我也在同意不同意的考虑之中而未有定论。”这时正逢吴期恒来到京师，进谒皇帝，雍正因为吴期恒在当面回答他的提问时谬误百出、不合事理，便当即罢免了他的官职。皇帝诏命改变原来在打箭炉外各处或增加或减少官兵等诸项计划，不用年羹尧的决策。四月，皇帝下谕旨说：“年羹尧举荐用人、弹劾官员处理不得当。”又指出他许多欺瞒之事，而将其改授为杭州将军。皇帝让岳钟琪代理年羹尧的总督职务，并令年羹尧交回抚远大将军的官印。年羹尧被替代之后又上疏说：“我不敢长期住在陕西，也不敢马上就前往杭州，现在我在水陆交通交汇之处的仪征等您的圣旨。”皇帝见疏后更加生气，下令他立即赴任。这时许多巡抚、总督、都统等官吏纷纷上章揭发年羹尧的种种罪状，并有滥杀无辜的事实。皇帝下旨分案定罪，罢免年羹尧将军的职务，任他为没有实职的闲散章京，将他

的二等公的爵位递降拜他喇布勒哈番，这样就消除了年羹尧全部职务。

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年羹尧被逮捕押送到京师。雍正帝将此案下交给议政大臣、三同法、九卿会审。这月的甲戌日，会审者向皇帝具报了审理这案狱的结果：年羹尧犯有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专擅之罪六，忌刻之罪六，残忍之罪四，贪黷之罪十八，侵蚀之罪十五，总共九十二条，其罪按律应当处以大辟，亲属应当连坐。皇帝下谕说：“年羹尧试图逆叛虽是事实，但是实际行动还不明显，我顾念他平定青海有功，不忍心给他处以极刑。”于是派遣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赛、步军统领阿齐图抱着皇帝诏谕到关押年羹尧的狱中，命他自杀。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和哥哥年希尧被削除官职，免除对他们的处罚；处斩了年羹尧的儿子年富；其余的儿子凡年在十五岁以上的都发配到最远的地方去戍守边境。年羹尧的门客有的被斩，其亲属充奴。雍正五年，皇帝下诏特赦了年羹尧的儿子们，将他们交给年遐龄管束。年遐龄也在不久死去，皇帝下诏还他原来职务。并专门派官员前往致祭。

岳钟琪

岳钟琪（1686～1754年），字东美，号容斋，四川成都人。历任四川提督，兼甘肃提督、巡抚、川陕总督、宁远大将军等职。他是清代著名军事将领。

一、召平西藏 抚定青海

岳钟琪的父亲叫岳升龙，也是武官，刚入伍就授为永泰千总。后屡因战功授予提督，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岳升龙请求退休，原来他家世代居住在甘肃临洮，后迁至四川。康熙五十一年岳升龙去世，雍正四年（1726年）被追谥为敏肃。

岳钟琪开始是以捐资任同知的。他投身军队后，请求改为武职。康熙命他以游击将军身份进发四川，很快被授予松藩镇中军游击。再升为四川永宁协副将。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准噶尔的策妄阿喇布坦派其将领策凌敦多卜袭击西藏，清军都统法喇督兵出打箭炉，抚定里塘、巴塘。传檄书请岳钟琪为先锋，到了里塘，但里塘的第巴不肯接受招抚，于是被诛杀。巴塘第巴闻风丧胆，就献出了他的户籍。乍丫、察木多、察哇等地的土番头目都归顺听命。五十九年，清定西将军噶尔弼军自拉里（今西藏嘉黎）入藏，仍命岳钟琪为前锋。岳钟琪进驻察木多，挑出军中通西藏语的三十人，换上藏服，悄悄地行军到洛隆宗，斩杀了准噶尔的使者，叛军大惊，请求投降。噶尔弼到军中，用岳钟琪的计策，招抚西藏公布部落，该部以二千人出来投降。岳钟琪就统兵渡江，直逼拉萨，大破西藏军，擒获为内应的四百多个喇嘛。策凌敦多卜败逃，西藏叛乱于是被平定。康熙六十年（1721年），清军班师回朝，岳钟琪被授予左都督，晋升为四川提督，赐孔雀翎。朝廷命令征讨郭罗克番部，岳钟琪领兵，同时统帅瓦斯、杂谷等土司兵从松潘出边界。郭罗克土番兵士一千多人出来拒战，钟琪击破了他们。夺取了下郭罗克吉宜卡等二十一个堡寨，歼灭了那里的敌众。又乘夜带兵进到中郭罗克纳务寨，番兵出来抵

抗，岳钟琪奋力击杀，不到一天，连克十九个寨子，斩三百多首级，捕获敌方首领骏他乐喀索布六戈。他再统兵进攻上郭罗克押六寨，藏兵头目旦增捆绑了首恶假磕等二十二人前来附降。这样郭罗克三部全都平定，朝廷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岳钟琪去讨拜山同藏番，在那里设立南坪营。

雍正元年（1723年）清军讨伐青海，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请求用岳钟琪参谋协助军事。岳钟琪率六千人出归德堡，抚定上寺东策卜、下寺东策卜各番部。南川塞外郭密九部屡次抢劫边沿地区，而呈库、活乐贾二部尤其横行霸道。岳钟琪调师深入，直捣他们的巢穴，将他们全部扫平。雍正二年，岳钟琪被授为奋威将军，又一次进兵。郭隆寺喇嘛响应罗卜藏丹津也发起反乱，岳钟琪会同其他各军合力出击，歼灭了这支叛军，摧毁了郭隆寺，擒获并杀了他们的首领达克玛胡土克图。罗卜藏丹津居住在额穆纳布隆吉尔，他的部落长阿尔布坦温布、吹拉克诺木齐分别屯守在各险要之地，岳钟琪与众将分道深入。岳钟琪及侍卫达鼐出南路，总兵武正安出北路，黄喜林、宋可进出中路，副将王嵩、纪成斌搜山。大军进发到哈喇乌苏，天刚黎明，叛军还未起身，清军出其不意地冲杀进去，斩敌一千多人，番军惊慌逃窜，岳钟琪乘胜追击，一昼夜行军到伊克喀尔吉，俘获阿尔布坦温布。又进驻库尔哈罗色，调遣军队攻噶斯；再进兵布尔哈屯，紧逼额穆纳布隆吉尔，罗卜藏丹津向西逃窜，岳钟琪前去追赶，一昼夜飞驰三百多里路。对方部落长彭错等前来投降，岳钟琪令守备刘廷言监督彭错作为先驱，岳钟琪率兵紧随其后。敌部落长吹因前来投降，说罗卜藏丹津所在之地离大军只有一百五六十里路。岳钟琪命令部队暂先休息，傍晚时再进发，黎明到达敌人驻地。罗卜藏

丹津的兵士们刚分散在水边草地放牧，岳钟琪就猛烈袭击，大破敌军，擒获许多台吉，罗卜藏丹津的母亲和妹妹也同时被抓获，罗卜藏丹津本人换了女装才得以逃走。刘廷言等也拘捕了吹拉克诺木齐等。岳钟琪又进发到桑驼海，直到看不见了叛军才返回。他带兵出师十五日，斩了八万多首级。凡帮助罗卜藏丹津反叛的大部落长都被擒获。青海平定，雍正特授岳钟琪三等公，赐黄带。

庄浪边外谢尔苏部土番占据桌子、棋子二山发动叛乱，纳朱公寺、朝天堂、加尔多寺等土番部众也与叛军相纠合。年羹尧派岳钟琪等率兵十一路进剿，总共用了五十多天，全部讨平了这股力量。朝廷命令岳钟琪兼任甘肃提督。

二、雄镇边塞 一心为国

雍正三年（1725年），岳钟琪被任命兼甘肃巡抚。是年四月，年羹尧被解除了兵权，改任杭州将军，岳钟琪也命上交了奋威将军之印，代理川陕总督，作为各支军队的护军。河州、松藩原来是青海和蒙古贸易的市区，年羹尧向皇帝奏请将市区迁移到那喇萨喇。岳钟琪上奏说青海察罕丹津等部落居住在黄河以东，请仍在河州、松潘开设互市地。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等部落居住在黄河以西，请将互市地点移到西宁塞外丹噶尔寺。蒙古人的谋生之业，全部依赖牲畜，请求在六月以后，不限定互市时间。四川杂谷、金川、沃日各土司争地界，年羹尧命令金川割让美同等寨给沃日，致使双方互相仇杀，争纷不已。岳钟琪奏请将美同等寨归还金川，而将龙堡三歌地划给沃日，雍正都准许照此办理。

不久朝廷正式任命岳钟琪为川陕总督。他上疏说：“土司世代沿袭，清文武官吏往往向承袭人索取财物，还勒封他们的印

信，好几年不给，致使土官专断，放肆无忌，相互仇杀。请限定半年时间，仍然命令应袭人先代理职事。土司外支族中有遵理恭谨能办事的人，准许本土官详报督抚，给予职衔，分管他们的土地，多的可管三分之一，少则五分之一，使土官间势力相互平衡，民情保持安定。”岳钟琪入见皇帝，加兵部尚书衔。他上疏说：“察木多外鲁隆宗察哇、坐尔刚、桑噶、吹宗、衮卓各部，距离打箭炉很远，不便于遥控。请朝廷向达赖喇嘛宣布，令他们管理那些地方。中甸、里塘、巴塘及得尔格特、瓦舒霍耳等地，一并归内地土司管理。”又说：“巴塘隶属四川，中甸隶属于云南，而巴塘所属的木咱尔、祁宗、拉普、维西等地逼近中甸，在阿墩子总会，实际上是中甸的门户。请将这些地方改隶于云南，与四川里塘、打箭炉互为犄角。”下到大臣中去讨论，结果是按岳钟琪的请求办事。雍正四年春，岳钟琪请求挑选西安满州兵一千人驻守潼关。冬天，他请将陕、甘两省的丁银摊入地亩征收，从雍正五年开始，成为定例。过了年，岳钟琪再上疏说甘肃所属的河东地区税粮轻丁银多，河西又是税粮多丁银少，请让这二地各自均派：河东的丁银随税粮征办，河西的税粮照丁银摊派。下到部里讨论实行。四川乌蒙土知府禄万钟骚扰云南东川，镇雄土知府陇庆侯及建昌属地冕山、凉山各处苗人帮助禄军反乱。雍正命令岳钟琪与云贵总督鄂尔泰会师前去征讨。雍正五年春天，抓获禄万钟，陇庆侯也降附。乌蒙、镇雄都改土司为中央委派的流官。冕山、凉山也相继平定。

岳钟琪督领三省全国最强兵众，疑心妒忌他的人很多。成都传出岳钟琪要谋反的谣言，岳钟琪获知后立即上疏报告朝廷，雍正劝谕他说：“数年以来，以谗言中伤岳钟琪的谤书已不止一箱，

更厉害的而且有人说岳钟琪是岳飞后裔，意欲报宋、金之仇。岳钟琪功劳卓著，我因此要安置他在西陲要地，付与他重兵。川、陕西省的军民，受圣祖六十多年的广裕恩泽，尊君亲上，这是大家所共闻共知的。如今这造谣的人，不只是诽谤了大臣，同时还以大逆不道来诬陷川陕军民。命令巡抚黄炳、提督黄廷桂会同严审。”不久地方上奏报，寄居四川的湖广人卢宗，因私事编造出这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并没有主使人，将卢宗判处死刑。

雍正六年（1728年），岳钟琪上疏请将建昌所属河西、宁番两土司及阿都、阿史、纽结、歪溪等地改土归流，河东宣慰司将一半属地改隶流官，升建昌为府，下领三个县，同时制定出军队汛地的职制，及处理好善后诸事。奏疏下到部里讨论，最后按他的请求行事。定出新设府为宁远府，县为西昌、冕宁、盐源，又请改岷州两土司归属流官。不久他分别上疏请求升四川达州、陕西秦、阶二县为直隶州。雍正七年（1729年），他又分别上疏请求升甘肃肃州为直隶州。在陕西子午谷隘口增设防守官兵，在里塘、巴塘等地设置宣抚、安抚各司直至千百户，按流官的规定题报补充。都经讨论后实行。雷波的土司发动叛乱，岳钟琪派兵前去讨平。

靖州生员曾静派他的徒弟张熙投书给岳钟琪，想劝他一同谋反。岳钟琪与他假设盟誓，了解到曾静叛逆之事的全部真相，上疏报告朝廷。雍正赞赏岳钟琪的忠心，派侍郎抗奕禄等到湖南去拘捕曾静并会审将其治罪。

三、深入不毛 平定叛乱

罗卜藏丹津失败后，去投奔了准噶尔，准噶尔的部落长策妄

阿喇布坦接纳了他。策妄阿喇布坦死，其子噶尔丹策零继立，几次侵犯劫掠喀尔喀等部。雍正命令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屯守在阿尔泰山，从北路进发；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驻守在巴里坤，从西路出发，前去讨平噶尔丹策零军。这时岳钟琪被加授为少保，以四川提督纪成斌等参谋协助军务。岳钟琪率兵来到巴里坤，筑东西二城作为守卫拒障之备，挑选出部队为深入敌方计议。雍正八年五月，朝廷召岳钟琪及傅尔丹到京师面授计谋，岳钟琪请求让纪成斌护大将军印。科舍图岭这一地方，在巴密、巴里的分界线之间，岳钟琪在那里设有牧场。准噶尔听说岳钟琪正入京拜见皇帝，乘此机会以二万多人入犯科尔图，全部掳掠了那里的驼马而去。纪成斌派副将参领查廪以一万人去保护牧场，但敌寇到来时抵挡不住，去到总兵曹勦营垒呼救；曹勦用轻骑前去救援，但战败后也只能逃离。总兵樊廷及副将冶大雄等率二千人，转战七昼夜。总兵张元佐统领所部前去夹击，选拔出两卡伦官兵，才夺回了大部分掳掠去的驼马。纪成斌想加罪于查廪，不久又释放了他，以战捷传报朝廷。雍正已派遣岳钟琪速回镇守，还对岳钟琪说应当在卡伦外筑城驻兵，派出流动的兵力去袭击敌人，使他们不敢深入，这些都让岳钟琪详尽地计议。不久为樊廷、冶大雄、张元佐的战功颁奖，赐予黄金、世职，派内务府总管鄂善送白银十万两，犒劳军师。在安西建立祠堂，祭祀阵亡将士。雍正亲自以酒三爵浇地遥祭，也派鄂善送酒到前线举行祭祀仪式。

雍正九年（1731年）春天，岳钟琪请求移兵进驻吐鲁番、巴尔库尔，为深入敌巢作打算。雍正告谕他说：“以前你就曾经轻率地讲过要长驱直入，现在又被敌军抢盗去了驼马，因此既感耻

辱又很愤怒，必定想进剿，直捣敌人巢穴，但是能有必胜的把握吗？”九年正月，岳钟琪部有从敌营中逃回的兵士，说噶尔丹策零将移驻哈喇沙尔，以大队人马开赴西路，而命令他的将领小策零敦多卜进犯北路。岳钟琪得到消息，还说敌寇将从吐鲁番入侵哈密，骚扰安西、肃州边界。因此清军寡不敌众，应当采取持重方针，坚壁固守，请求北路派兵前来应援，同时调兵从无克克岭三面夹击。雍正有谕旨说：“先前因钟琪兵少，命令持重坚守，如今他已有了二万九千人的军队。樊廷只有骑、步兵二千人，面对敌人二万，转战七昼夜，还是足以相抵挡。而有二万九千人却说人少不能胜敌，为何懦弱胆怯到这种地步？而且以前想直捣伊犁，难道有敌人到了几百里内的地方却转为坚壁固守而不出战的做法吗？贼兵结果到了巴尔库尔就败逃，也有从科舍图一直到伊尔布尔和邵然后逃跑的。无克克岭要相隔二三百里路，哪里会受到夹击？岳钟琪在地势军机方面，都茫然不知，我实在是为此感到烦忧。”

三月，准噶尔二千多人进犯吐鲁番，纪成斌派樊廷率四千人赴援，敌人引兵败退。四月，敌方又以一千多人进犯吐鲁番，另外以二百多人入犯陶赖卡伦。六月，又以二千多人围攻鲁谷庆城，吐鲁番回人头目额敏和卓等率部下奋勇出击，杀了二百多人。岳钟琪经过考虑命令张元佐、曹勳及张存孝率三千人赴援。提督颜清如带领二千人屯守在塔库，纪成斌率四千人防守陶赖，待到清军进击乌鲁木齐，将回民迁入内地。雍正告谕岳钟琪说：“今年秋天袭击，是第一善策。援兵吐鲁番，是不得已的举措。如果只筹划应援，而不计划袭击，那就是舍本而逐末啊！”

鲁谷庆城被围了四十多天攻克不下，准噶尔移攻哈喇火州

城，用梯子登城，被回民击杀了三百多人。张元佐等的军兵即将到来时，敌人引退。七月，准噶尔大举进犯北路，傅尔丹军在和通脑儿惨遭失败，岳钟琪请求乘虚袭击乌鲁木齐。雍正告谕他说：“贼兵既然已在北路得志，今年冬天仍然会进犯西路，而且会增添兵力，人马是否会比侵犯北路时更多，都不可预知。应当先筹划好作战方案，仗打响后再随机应变，切勿贪功前进，坐失机宜。”同时命令稍稍去袭击一下，就撤兵回营。岳钟琪从巴尔库尔经过伊尔布尔和邵到阿察河，遇到了敌人，岳钟琪指挥大军击败了他们。追赶到厄尔穆河，敌人占据山梁来抗拒。岳钟琪命令张元佐率步兵为右翼，纪成斌率骑兵为左翼，曹勦及总兵王绪级从中路上山，参将黄正信率精锐部队从北山进攻敌人后方，各支军队奋勇前进，夺得敌人所据山梁，敌人溃败逃走。据情报说乌鲁木齐的叛军已全部拔帐远迁，岳钟琪就带兵回营。消息上报，雍正皇帝嘉奖岳钟琪进退迟速都合机宜。

十二月，雍正又追究起科舍图之战的失败，斥责纪成斌懈怠疏忽，降他为沙州副将。十年正月，镜儿泉的巡逻兵遭遇敌军，其中二人被杀，一人被敌抓走。岳钟琪弹劾副将马顺，雍正却下令将钟琪一并交兵部审议。不多久，准噶尔部三千多人进犯哈密，岳钟琪命令曹勦、纪成斌率五千人从回落兔大坂出发，总兵纪豹率二千人从科舍图岭出发，分道赴援。又令副将军石云倬、常贵、镇安将军卓鼐分地设伏，待敌军占领天生圈山口，颜清如屯守在塔尔那沁，他就派参将米彪、副将陈经纶分路御战，敌人引兵逃走，曹勦等将到二堡，遭遇准噶尔五千多人，就发兵奋战一昼夜。敌人登山，曹勦统兵围山，奋力攻战直到中午，敌人才溃逃。曹勦从二堡到柳拊泉，与陈经纶及其副将焦景竑军会合，

乘夜追剿。岳钟琪派人告诉石云倬等，遣兵到无克克岭等待敌人，这方案传到朝廷，雍正勉励慰劳岳钟琪军。岳钟琪提议在穆垒筑城驻军，同时命令乘胜动工。石云倬等来到无克克岭，岳钟琪下令迅速占领梯子泉切断敌军归路，卓鼐紧跟其后。石云倬推迟了一日发兵，敌军已众陶赖大坂西越过纳库山逃去。石云倬带兵到达敌人驻营地时，炉灶里的余火还未熄灭，石云倬又下令不去追袭。岳钟琪弹劾石云倬破坏战事，撤消他的将职，押送京师治罪，以张广泗代为副将军。雍正下谕旨说：“岳钟琪平时熟知军队中的事务，原本不是平庸之才，只为怀有动摇不定的意见，致使战守失宜。前人失败的教训，并非只有一点。以后应当痛自反省，划一号令，显示出威望和信誉，我还是深切地期望着啊！”大学士鄂尔泰等参劾岳钟琪独断独行地控制着边疆，才智不足以预料敌情，勇力不足以全歼敌军。因此岳钟琪被降为三等侯，削去少保衔，仍保留总督衔，护大将军印。六月，他上疏报告要将部队移驻到穆垒。不久，朝廷召岳钟琪回京师，用张广泗护大将军印。张广泗参劾岳钟琪在调兵筹饷、统驭将士等事情上的失宜。又说穆垒形成釜底，不可以驻扎军队。建议军师分驻在科舍图、乌兰乌苏等地。雍正下令还军到巴尔库尔，将岳钟琪的官爵全部削夺，并把他交给兵部拘禁。

四、功勋卓著 武臣巨擘

雍正十一年（1733年），查郎阿代理大将军之职，他弹劾岳钟琪骄横不法，并且参劾纪成斌、张元佐疏于防守，雍正下令斩曹勳。雍正十二年，大学士等大臣奏请对岳钟琪实行斩决，雍正改为监禁候审。乾隆二年（1737年），岳钟琪被释放回原籍。乾

隆十三年（1748年），清军征讨大金川叛乱，久而无功。是年三月，乾隆皇帝命令重新起用岳钟琪，给予总兵衔。岳钟琪到军中，立即被授予四川提督，赐孔雀翎。这时经略大学士讷亲督视军队，而张广泗以四川总督主持军事。大金川部落长莎罗奔盘踞在勒乌围，他的侄子郎卡占据了噶拉依。岳钟琪一到军队，讷亲就命令他攻党坝。乾隆向岳钟琪咨询军事，岳钟琪上疏说：“党坝是大金川的门户，碉堡关卡严密，汉、土官兵却只有七千多人。我曾与张广泗商议，请求增兵三千，张广泗不答应。广泗专门主张从昔岭、卡撒进攻。这二处中隔着噶拉依，距离勒乌围尚有一百多里。党坝到勒乌围仅五六十里，如果攻破康八达，就能直捣敌军巢穴。我与张广泗商量，他不以为然，而且他信用土舍良尔吉及汉奸王秋等人，恐怕会生其他不测。”讷亲也弹劾张广泗烦劳军师、浪费粮饷，乾隆下诏将张广泗逮捕治罪，也罢了讷亲的大学士，命傅恒代为经略。岳钟琪奏请选出精兵三万五千人，一万人出党坝及泸河，水陆并进；一万人从甲索进攻马牙冈，乃当两沟，与党坝军会合，直攻勒乌围，在卡撒留兵八千，待到攻克勒乌围后，前后夹攻噶拉依，党坝留兵二千保护粮站，正地留兵一千防守泸河，其余四千人往来于各地之中，随机接应。期待用一年时间擒获莎罗奔及郎卡。我虽年老，但仍请求担负起这个重任。”乾隆命令傅恒筹划酌行，傅恒采用了岳钟琪的计策。

岳钟琪从党坝攻康八达山梁，大破贼兵。大军进到塔高山梁，又屡败敌军。岳钟琪当初辅助年羹尧平定西藏，莎罗奔曾以土司头目从军；直到岳钟琪为总督，将年羹尧所割金川属寨归还莎罗奔，并上奏请给莎罗奔印信、号纸，莎罗奔因此感激岳钟琪。大军进入，莎罗奔很为恐惧，派使者到钟琪军中请降。岳钟琪向

傅恒请示，亲率十三名骑兵入勒乌围前去开导莎罗奔。莎罗奔表示愿意遵奉约束，并头顶佛经立下誓言。第二天，莎罗奔率郎卡跟从岳钟琪乘皮船到清军军前投降。乾隆吩咐嘉奖岳钟琪，加太子少保衔，再封三等公，赐号为威信。岳钟琪入见皇帝，乾隆命他在紫禁城骑马，取消西征中的追偿银七十万两，给他儿子岳田、岳澂加官侍卫，又赐诗褒扬他。不久命岳钟琪回师。乾隆十五年（1750年），西藏珠尔默特叛乱，岳钟琪派兵前去征讨擒捕。乾隆十九年，重庆以陈琨为首的民众发生暴乱，岳钟琪重病，还亲自前去镇压，还师途中，在资州病故，赐以祭葬，谥号襄勤。乾隆因为他所封的公爵不世袭，再授一等轻车都尉，命令岳钟琪子岳澂承袭。

岳钟琪深沉坚毅多智谋才略，管理士兵严厉，但与他们同甘苦，人们乐于为他所用。雍正帝多次赞赏他的忠诚，于是命他专门从事征讨。整个有清一代，汉大臣拜为大将军，满洲士卒隶于部下受他节制的，只有岳钟琪一人而已。乾隆在《御制怀旧诗》中，将他列在五位功臣之中，称为“三朝武臣巨擘”。

邓廷桢

邓廷桢（1776～1846年），字嶰筠，江苏江宁人（今南京市），嘉庆六年（1801年）进士，由编修历任宁波、延安、榆林、西安等处知府，因多次平反著名冤狱，得到了人民的赞扬。至二十五年至道光初期，先后任过湖北、江西、陕西的按察使和布政使，道光六年（1826年）升迁为安徽巡抚。当发生水灾时，邓廷桢亲自乘船视察灾情，设法赈济，并修复了安丰塘和芍陂水

门，疏浚了凤阳沭河。“治皖十载，政尚安静，境内大和”。

1835 年，邓廷桢被委任为两广总督；其实鸦片烟正极为盛行，已成为国家民族的一大祸害。1836 年，英国商人以趸船载运鸦片要求进口，被邓廷桢严正拒绝，命令他们停泊外洋并“严旨驱逐”。沿海不法分子暗中与英商勾结，从销售鸦片中牟利，虽经明令禁止，鸦片却仍在广泛流通。邓廷桢经与提督关天培共同努力，加强了海上防务，多次于大屿山口及急水洋捕获走私船，将缴获的银两充斥奖赏，并破获了不少囤积私贩。1833 年，英船载运男女五百余人，企图在澳门长期定居，被邓廷桢“驱令回国”。朝廷命群臣讨论禁烟，邓廷桢上疏说：“法行于豪贵，则小民易从；令严于中土，则外货自绌。”意思也就是说，要禁烟首先得禁止上层豪贵，只要内部禁烟法令森严，得到认真贯彻，外国人要想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也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可谓言简而意赅。

1839 年，林则徐以钦差大臣到广东专责查禁鸦片，邓廷桢与他密切配合，同心协力，迫使英国人交出鸦片二万余箱，全部销毁于虎门，并下令严厉惩治私贩。侵略者发动武装挑衅，由于事先已有准备，我方屡战皆捷。查禁鸦片所取得的巨大胜利，本来是好事，只因触及了某些吸食和贩卖鸦片的豪猾之徒的切身利益，竟至流言四起。邓廷桢曾在奏疏中描述当时的情况说：“你如派人查检，便说你是想讨好皇上；你如派人缉捕，便说你是贪

功；派人侦察被认为是阴谋诡计，依法审讯也被说成是残酷刑罚，甚至说某人纳贿，某人营私，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逆流呢？”“无非为烟匪泄愤”。当时的旻宁（道光）多少还有一点禁烟的心意，只好下诏慰勉了他一番。

朝廷本已先后下令调任他为两江及云贵总督，邓廷桢尚未赴任，由于福建方面情况紧急，便又把他调任闽浙总督。邓廷桢到了福建后，立即设法购买了十四门洋炮，改炮台为炮墩，“囊沙堆筑，外护以船”，招募水师出洋巡缉。1840年3月，英国舰船进犯厦门，经邓廷桢派提督程恩高迎战于梅林澳，及时将敌军击退。不法分子通敌偷运鸦片，经责成水陆军严密缉捕，“遇即攻击”，亦“迭有歼擒”。六月，敌船驶入厦门“求通贸易”，遭到拦阻后即开炮射击，直扑炮台。参将陈胜元、守备陈光福奋起应战，发炮击毙敌前队数人后，大批敌军伤亡，迫使敌船不得不后撤逃遁。与此同时，进犯浙江洋面的敌军攻陷定海，邓廷桢闻讯后率领部队赶去征剿，抵达清风岭。旻宁认为福建防务十分重要，命令他不要去浙江，邓廷桢于是驻兵泉州，积极招募士卒，训练军队；建议朝廷抓紧时间“改造坚大大船，多配火炮，间道而进”，以便有把握制胜敌船。

九月，形势急转直下，旻宁态度改变，投降派开始得势，邓廷桢无缘无故便被诏令斥责为“在粤输不善，转滋事端”，与林则徐同时被撤职。1841年，接替林则徐的琦善尽撤沿海防御，结果虎门失守；虽然邓廷桢早已离开广东，却仍被追论为“久任两广，废弛营务”，又与林则徐同时被遣戍伊犁，亦即充军流放；直至1843年方才释放返回。

1843年以后，邓廷桢先后任过甘肃布政使、陕西巡抚署陕

甘总督。经他亲自勘察，由银川东尽洮、陇，西极酒泉，共清查荒田一万九千四百余顷，此外还有“番贡地”一千五百余顷，宁夏马厂地归公一百余顷，荒田荒地经招人开垦，都得到了合理利用。1846年，邓廷桢逝世。邓廷桢精通音韵学，所著笔记、诗、词曾广泛为人所称道，去世后有《双砚斋诗抄》流传于世。

陈化成

陈化成（1776～1842年），字业章，号莲峰，福建省同安县丙洲人。清末爱国将领。

一、廉洁自律 善于治兵

陈化成早年加入行伍。清嘉庆初入水师当兵，因参加围剿海寇有功，累升至金门总兵，后又擢任福建水师提督。驻师厦门期间，曾多次击败英国侵略军，英军对他十分畏惧，素有“陈老虎”之称。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后，陈化成由福建调任江南提督，镇守吴淞口。

“三年一戎幕，飘萧战风雨，但期士心奋，敢惜臣身苦。”这是1841年间，曾任江西巡抚的梁章钜为陈化成写的一首赞美诗。陈化成在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中，始终保持廉洁奉公的品德，并把他看作是自己的立身之本，是军民同心抗敌的力量所在，自觉地与士兵、百姓同甘共苦。

当时，清朝的达官显贵，生活都十分奢侈。身为一品的水师提督陈化成却以俭朴为荣，吃的是粗茶淡饭，住的是普通民房。现在还保存着的厦门草埔垵现编门牌九号，就是当年陈化成居住的地方。这所“府第”，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平房，总面积只有一百三十多平方米，门墙低矮，主房一厅四室，院内仅有厢房一间，水井一口。室内现存一只没有镂花刻画的楠木小柜，这就是统领万军的陈化成生前的办公用具。

陈化成从不居官自傲，处处关心士兵的疾苦，并以自己的行动去影响和激励将士。那时，厦门沿海一带防御海寇的各处营寨汛口，年久失修，士兵生活及其艰苦。陈化成担任水师提督后，立即着手整顿海防，整修防御工事，配齐武器，修缮营盘寨栅和衙署，让官兵在战时能有效地打击敌人，在平时能有个不遭风吹雨淋的安身之所。1840年，陈化成调任江南水师提督，赴任时，他不先入官署，而是直接到了吴淞口防地。在吴淞，他有公馆不住，却与士兵一样住在一顶不遮风雨的旧帐篷里。江苏巡抚见此情景，派人赶做了一顶新帐篷送给陈化成，陈化成婉言谢绝：“士兵都住着破帐，自己不忍独居新帐。”两江总督牛鑑想笼络他，曾下令军需局每十天送白银二百五十两给陈化成，也被他婉言谢绝。一次，海潮受飓风影响大涨，陈化成的帐篷进水一尺多深，许多人劝他移帐，他说：“吾免水患，如众民何？”坚持不移。又一次，夜间下大雪，陈化成看到士兵穿的衣服很单薄，即设法给士兵们增添了棉衣，士兵们非常感动。

陈化成不仅关心部属，善于治军，而且还热心赞助地方公益事业，以密切军民关系。驻师厦门时，兴泉永道周凯曾向陈化成提起修纂《厦门志》一事，陈化成当即表示大力支持。待《厦门

志》编纂出来后，周凯已调台湾道，客死他乡，没有刊行。陈化成便拿出自己的俸银，资助刻印《厦门志》。厦门玉屏书院等处建筑物，年久失修，已破损荒废，陈化成曾先后带头捐款重修。军队受陈化成的影响，皆能严明纪律，爱护百姓，属下官兵都自觉地听从他的指挥；地方百姓都积极地支持军队作战。

由于陈化成严于律己，关心士兵和百姓，军民众口赞誉陈化成对敌人是“陈老虎”，对士兵和百姓是“陈老佛”。

二、气贯长空 名垂千古

吴淞口，系长江咽喉，是敌人进攻长江流域地区必经的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陈化成来到吴淞口，就积极着手备战，建立铸炮局、火药局，制造大炮和炮弹；亲率军民挖战壕、筑碉堡，在短期内修筑土堡二十六座，城墙二十里，东、西炮台两座，使吴淞口海防要塞设施初具规模。

1841年1月，清政府中的投降派，与英国侵略者商拟《穿鼻草约》以割让香港、赔款六百万两银元、开放广州为通商口岸为条件，换取英军停战。英军即声称《穿鼻草约》已签字，抢先占领了香港。广州撤防后，投降派又提出撤除吴淞口防务。陈化成坚决反对，并尖锐地指出：“洋人象犬羊一样，毫无信用，况且用金钱、财物去求和，只能更加助长洋人的贪欲和骄横，一纸和约靠不住的。”“请留本镇兵弗去。”他不仅不撤防，还进一步强化防务，加固东、西炮台，火炮从六十门增加到二百五十门。

为了练兵备战，抗击敌人的进攻，陈化成把个人和家庭置之度外，专心矢志，集中精力于保卫国家的安全。有一首诗赞美陈化成这种忘我精神，诗云：“忘情到妻子，矢志在坚贞，天下皆

公辈，西夷敢弄兵？”这时，陈化成已六十六岁高龄，但每逢风雨天，他总是亲自登上炮台瞭望大海，或是驾着小舟出海巡查。一次，他的长子特地从厦门来看望他，并想多留几天，以便照顾老人。但陈化成只让儿子住了三天，便把他“赶”回去了。随后，陈化成听说妻子也准备来上海，随即写信劝阻说：“即使来了，战事在身，也没有时间相见。”这就是诗中所云“忘情到妻子”的来历。老将军赤胆忠心，深深感动着全体将士。

不出陈化成所料，1841年8月底，英国侵略军第二次北犯，浙江定海于10月失陷。陈化成得知定海三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明和两江总督裕谦壮烈牺牲，非常悲愤。他把全体将士集合在一起，教育大家为反抗外来侵略，保卫国家，誓死守卫吴淞口，并说：“武臣卫国，死于疆场，幸也，尔等勉之。”

1842年6月，英军舰队云集吴淞口外。敌军慑于陈化成的声威和吴淞要塞设防严密，不敢轻举妄动，只是有时派出少数船只，驶进海口，想试探一下陈化成设防的火力。陈化成看穿了敌人的诡计，命令士兵不准开炮，以观动静。英军见陈化成不上圈套，只好把试探船只悄悄撤回。英军在吴淞口外踟躇半月之久，始终不敢向陈化成发动进攻。

英军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采用水牌漂战书的方法来诱降清军。这一招，对于那些软骨头果然产生了作用。驻守在宝山县的两江总督牛鑑得到英军诱降战书后，即赶到陈化成的营前，以英军“船坚炮利”为词，要陈化成向英军讲和。陈化成驳斥道：“吾经海洋四十余年，在炮弹中入死出生，难以数计。今见敌勿击，是畏敌也。奉命讨贼，有进无退。抢险可胜，公勿怖！”牛鑑见“陈化成心如铁石，士卒用命，民情团结”，面红耳赤，无

言以对。陈化成下定了与英军血战到底的决心，身先士卒，和将士们一起整器械、具战船、备干粮，积极做好战前的准备工作。

1842年6月16日清晨，英军舰队疯狂地向吴淞口发动炮击。这时，陈化成正在西炮台，他见敌人已开始进攻，立刻跑出营帐，冒着炮火，手举红旗，站在炮台的高处亲自指挥战斗。但在此紧要关头，东炮台，小沙背的守将却临阵怯战，按兵不动，致使英军集中全部炮火轰击西炮台。面对这种情况，陈化成临危不惧，沉着督师，英勇还击，激战两个多小时，发炮弹一千多发，击毁敌军旗舰和巡洋舰各一艘，击伤其他舰船多艘，英军见势不妙，仓惶而逃。

躲在宝山城的牛鑑，闻前线告捷，便坐着大轿，仪仗簇拥，出城观战，企图分享胜利果实。英军见一轿有仪仗随行，判断必是清军大官，即发炮轰击。牛鑑贪生怕死，吓得丢官弃靴，狼狈逃命。总督牛鑑逃跑，严重动摇了军心，东炮台守将崔吉瑞、小沙背守将王志远也相继率部溃逃，致使西炮台腹背受敌。

陈化成见东炮台、小沙背不战而陷，目睹临阵脱逃的可耻行径，怒火中烧，知道自己已是孤军奋战，但依然镇定自若，命旗手将绣有“陈”字的帅旗，高高地挂在炮台前沿，以激励将士。激战中，他身上七处负伤，仍挥舞战刀，奋勇杀敌，直至壮烈牺牲。由于长时间轰击，大炮炮身烧得发红，灼热烫手，陈化成全然不顾，亲自操炮点火。清朝政府腐朽已极，所制大炮质量低劣，炮身炸裂，射程愈短，弹不及敌，已成灰烬。部将周世荣监制的炮弹中竟然掺进破砖碎瓦，以致炮火没有威力。英军趁机加紧攻击。周世荣劝陈化成下令撤退，陈化成拔出利剑，痛加申斥：“向谓尔诚，荐拔若是，今尔负我，以致负国！”周世荣顾自逃命。

陈化成转身操炮发射，炮身震动，手裂出血，不知疼痛。突然一发炮弹在陈化成身旁爆炸，陈化成身上多处受伤，血流如注，扑倒在地。敌兵蜂涌而至，陈化成身边戍卫挥刀迎敌，皆中弹阵亡，老将军怒吼一声，奋力跃起，挺剑向前，再次中弹，倒地身亡。

在这次战斗中，陈化成指挥吴淞口守军先后击沉敌舰八艘，歼灭英军五百多人，给英军以沉重打击。

陈化成牺牲后，军民十分悲痛，用最隆重的礼仪祭奠这位爱国将领。他的遗体在嘉定县入殓及第二年将其灵柩运回故乡时，当地民众和沿途士民数十万哭奠不已。9月，故乡人民把他的遗骸安葬于厦门梧村金榜山麓。

对陈化成一生的评价，有一对挽联是这样写的“昔时未读五年书，雅量清心，温如玉，冷如冰，是大将，实是大儒，使天下讲道论文人愧死”；“此日竟成千秋业，忠肝义胆，重于山，坚于石，志吾身，不忘吾主，任世间寡廉鲜耻辈偷生”。

关天培

关天培（1780～1841年），字仲因，号滋圃，江苏山阳（今江苏淮安）人。清朝爱国名将。在鸦片战争中，他曾镇守虎门，大挫英国侵略军。

一、少有大志 投身行伍

关天培幼年在家乡读书，天资高，成绩好，一心想参加科举考试，当官为民办事。后因常见国家遭受外来海盗的侵犯，深为国家安危担忧，于是改文习武，刻苦攻读《孙子兵法》，认真研

究军火制造。当关天培准备投笔从戎的前夕，他的母亲将其拉到身边，对他讲述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要关天培一心为国为民，做岳飞那样的民族英雄。1803年（嘉庆八年），关天培考中武生，授曹营右营把总。由于深得上司的信赖，被迅速破格提升，先后任千总、守备、都司、游击、参将及太湖营水师副将。1825年（道光五年），初行海运，他督护一百四十多艘船只安抵天津，受到赞誉，第二年被提升为江南苏松镇总兵。1833年（道光十三年），代理江南提督。1834年（道光十四年），调任广东水师提督。

关天培对祖国忠贞不二，对母亲十分孝敬。在其任苏松总兵时，父亲去世，他就把母亲接到崇明衙署居住。当他受命为广东水师提督时，考虑到老母年迈，就准备把母亲再送回故乡。老母知道儿子的心思后，不但不埋怨他，还嘱咐他：要一心报国，“移忠作孝，不必分心以老母为念”。母亲忧国忧民的胸怀，深深感染了关天培。老母八十寿辰时，关天培因广东海防的军务繁忙，不能返回故里为母祝寿，便请好友画了一张《延龄瑞菊图》，并在信中表示：“公务无分巨细，事事尽心，以遵慈训，极慰母怀”。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他终于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刻，以“精忠报国”的大义大节，尽了自己的大忠大孝。

二、整治武备 躬亲海防

关天培任广东水师提督之前，广东海关和水师腐败不堪，炮台长期失修，武备废弛，贪污贿赂成风。帝国主义见有机可乘，纷纷将手伸向中国，进行可耻的鸦片贸易，企图分得一块肥肉。英国军舰甚至明目张胆地闯入内河，直抵黄埔。据当时清朝官方文件承认：“巡船通同作弊，按股分赃，包庇私行，其弊尤甚。”更有甚者，英国人竟然在大角炮台旁边搭设帐幕，每逢礼拜日，或啸集烟贩会餐，或召集娼船赌艇，或持枪蹂躏场圃，强奸渔女，胡作非为。

关天培根据这种内忧外患的形势，在赴任广州途中，就颁发了《入境告示》，号召下属清除旧习，振奋精神，整顿海防，强化武备。他到任后，断定迟早要发生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便鲜明地主张：“御敌的根本办法是加强战备，以逸代劳，以静制动，严防出入，禁绝内奸。我们显示出威力，敌人就害怕而去；我们表现出怯懦，敌人则骄横而来。”

为了整顿加强海防，关天培亲自到海防前哨虎门察看地形。虎门两岸峰峦对峙，水中岛屿突起，地势十分险要，是珠江的咽喉要隘。从这里顺流而下，过穿鼻湾经伶仃洋可出南海；溯游而上，经狮子洋进黄埔可直入广州，素有“南天门”之称。经过调查，他决定在虎门重点设防。为把虎门要塞建设好，他自己动手，在虎门测量海口宽度和海水深度，试演大炮射程及连发情况，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增建、改造炮台，调整炮位，铸造大炮等新的海防措施。1835年（道光十五年），关天培相继整顿了旧有的大角、沙角、镇远、南山（即威远）、横档、大虎、新涌、

蕉门等八座炮台，增建了永安、巩固两座炮台，并称为“虎门十台”。规定“以沙角、大角两炮台为第一道门户，南山、镇远、横档三处炮台为第二道门户，大虎炮台为第三道门户，”严防主航道；其他炮台分守叉道。这一年，关天培还督铸六千斤和八千斤大炮各二十门，加强了主要炮台的火力。1836年（道光十六年），他又督铸三千斤大炮九门配给永安、蕉门、巩固等炮台，并在横档至南山海面安装一道木排铁链，在横档至巩固水下钉插暗桩，以便战时有效地拦阻和打击闯入内河的敌舰。

与此同时，关天培还对水师进行了整编，如整顿军纪，打击走私贩私，严禁贿赂、吸毒，清除军事防区内的贩毒场所；选拔思想好、技术精、身体壮的士兵坚守炮台；选贤任能，对有特长的将士，尽可能地做到人尽其才，等等。他还编印了《筹海初集》一书，发给属下将士学习，并按照实战要求督率水师经常操练和演习。

在关于培“殚精竭虑，躬亲督造”之下，广东海防的面貌有了很大改变，部队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一扫陈腐贿赂，同流合污之风，使外国侵略者不敢在广东肆无忌惮地横冲乱闯。1835年（道光十五年），八艘英舰驶近广东海面，企图闯入内河，见水师防守森严，无处下手，遂即调转船头离去。1836年（道光十八年），三艘英舰窥探虎门要塞虚实，关天培率军严阵以待，英舰无机可乘，只好又离去。

三、销烟除患 强兵抗敌

鸦片的大量输入，给中国带来无穷的灾难，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清朝统治者被迫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

禁烟。

1839年（道光十九年）3月10日，林则徐到达广州，立即发布禁烟和缉私法令，传谕外国商贩：限三天内将现存鸦片实数呈报缴交；并呈交“以后永远不敢运来鸦片，否则一经查出，货物充公，人即处死，甘愿伏罪”的保证书。关天培作为林则徐的助手，全力协助林则徐查获和销毁鸦片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余斤。这一年的夏天，虎门销烟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统治阶级一片哗然，狂热地准备发动侵华战争。此时，美国为了利益均沾，借口保护侨民，也派遣舰队到中国海面，为英国助威，妄图趁火打劫。

面对这样的形势，林则徐、关天培清醒地看到：害人的鸦片后面是杀人的大炮，开展禁烟运动必须以军事力量作后盾，要积极作好打仗的准备。在林则徐的支持下，关天培对英国海军力量作了认真的分析研究，进一步加强了虎门防务。他在上横档与威远山之间又增设一道木排铁链，在两道排链中间加建一座靖远炮台。购买西洋火炮二百多门，新造兵船六十多艘，火船、小船百余条，还从福建泉州雇请一批民船来充实防卫力量。备战工程是十分艰巨的，关天培发动人民群众，克服重重困难，如期完成了各项工程。

在这期间，广东沿海的渔舟村店，为了保卫家乡，抵御侵略，都自发地组织了“团练”。虎门团练，就是虎门各阶层的抗英武装。林则徐、关天培积极支持群众的爱国行动，把禁烟运动和军事斗争建立在可靠的群众基础之上。他们还从沿海渔民中选拔出六千名壮年，编成二十支“水勇队”，每队配备二十条船，其中有“火船”一条，每条船配两名官兵和多种火器兵械，还特地买来西洋船作靶子，让水勇队演习攻击洋船的要害部位。在关天培

的指挥下，军民齐心练武，武艺越练越精；合力设防，防务越备越固。

海防的巩固，有力地保证了禁烟运动的开展。关天培精忠爱国的精神受到了朝野上下的好评。林则徐写了一首诗赠给关天培来表示他对这位爱国老将的敬佩：

功高靖海长城倚，心切循陔老圃知。

浥露英含堂壮树，傲霜花艳岭南枝。

一首民谣这样赞颂虎门海防：“虎门云台，金锁铜关，入来不易，出去更难。”清政府也嘉奖他“奋勇直前，身先士卒”，并授以“法福灵阿巴图鲁”称号。

1840年6月，英国派大批军舰来犯，挑起了鸦片战争。

四、虎门鏖战 以身殉国

1840年6月下旬，英国集中“远征军”各种舰船四十多艘，载炮五百门，士兵四千多人，封锁珠江，攻打虎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

此时，关天培和林则徐认为，此次战争中国是进行自卫，目的在于戍守海防，粉碎侵略。因此，决定采取“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信森严而镇静，暗则待机而动，期震警其贪顽”的策略。英军见虎门森严壁垒、众志成城，很难啃动，即调动三十一艘舰船驶向北部沿海，其余舰船留下封锁广东沿海海面，并采取各种手段“恐吓那个衰弱和可鄙的政府”——清王朝。

沿海北犯的英军，于1840年7月攻陷定海，8月窜进天津海口，向腐败的清廷投函照会。本无禁烟决心的清道光皇帝旻宁，在洋人的胁迫下婢颜奴膝地放弃禁烟打算，派“弛禁派”头

子、直隶总督琦善去同英国侵略军进行谈判。经过一番不可告人的交易之后，道光皇帝竟连下两旨：林则徐“误国病民，办理不善”，革职查办。9月中旬，英舰调头南下，新任“钦差大臣”的琦善也接踵到广州就职。

琦善一到广州，就竭力讨好英国人，处处为洋人办事说话。他下令拆毁虎门的木排链等所有的海防设施，裁减三分之二兵船，驱散全部水勇、船工，并允许英国人察看地形，探测内河。关天培对琦善的这种投降卖国行动，十分气愤，曾多次向琦善据理力争，反对撤销广州防务要求重建海防、增兵虎门，但琦善根本不加理睬。年逾花甲的关天培，看到苦心经营的虎门海防设施全部被毁，深感国难将至。他除了昼夜坚守虎门外，还将自己的几颗落齿、几件旧衣、一绺头发，用木盒密封交给贴身随从孙长庆送回淮安故乡，以此来向乡亲们，特别是自己那年迈的母亲，表达他准备坚守阵地，以身报国，血战到底的决心。

琦善到广州的第六天，又在英国侵略者的威逼下，擅自口允了包括赔偿烟价、割让香港、开放广州等条件的《穿鼻草约》。英军为了达到更大的欲望，1841年1月7日，调集炮舰二十多艘、陆战队两千多人，突然向虎门发起进攻。由于海防废弛，加之寡不敌众，虎门外沙角、大角两炮台的守军，虽浴血奋战，但最终炮台还是失守了。2月25日，英军继续进攻虎门其余炮台。虎门守军仅有四百余人，形势十分危急。关于培多次请求琦善增派援军，琦善坐视不救。2月26日，英军进攻关天培坐镇的靖远炮台，六十二岁的关天培，来回奔跑在阵地上，激励士卒。“士兵呼声撼山，海水沸扬，杳冥昼晦”。全体将士在关天培的鼓舞下，奋勇歼敌，使敌尸布满滩头。战至下午二时，弹尽援绝，士

兵伤亡大半。关天培带伤指挥，血染衣甲。他使人把调兵的大印送走，决心与阵地共存亡。炮兵牺牲了，他就自己点火打炮。大雨降临，火门透水，炮不能发，他就拔出佩刀，挺立台上，把爬上来的英军一个一个地劈下去。最后，不幸被英舰的一发炮弹击中，他晃了晃身子，依然手执战刀，怒目圆睁，挺立在阵地上。他那浩然正气，凛凛英风，使拥上来的英军胆战心惊。

林则徐得知关天培阵亡的消息，忍不住泪流满面，挥笔为虎门“关忠节公祠”写下“我不如你”四个大字。他还怀着对关天培无限敬佩和对投降卖国者无比愤懑之情，毅然写下一副长达三十八字的挽联：

六载固金汤，问何人忽坏长城？孤注空教躬尽瘁；
双忠同坎坛，闻异类亦钦伟节，归魂相送面如生！

林则徐

林则徐（1785～1850年），福建侯官人（今福州市），字元抚，又字少穆，晚号俟村老人。曾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陕甘总督、云贵总督等要职。是清末杰出的政治家、民族英雄，是鸦片战争时期的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的领导人。

一、克尽职守 力主禁烟

林则徐出身于下层知识分子家庭。年纪很小时就十分聪明。嘉庆十六年（1811年），林则徐考中了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嘉庆十九年，授编修。二十一年，任江西乡试副考官。二十四年三月，任会试同考官，是年闰四月，任云南乡试正考官。嘉庆二十五年二月（1820年），转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当时正赶上河南修河工程未竣，林则徐见一些不法商贩借机囤积居奇，就奏请朝廷命地方大吏严密查封，打击不法商贩，平价收购修河物资。保证了修河

所需。

道光元年（1821年），林则徐因父病称病告假归家。第二年被授为江苏淮海道。还没有去赴任，就迁任浙江盐运使。以后，林则徐历任江苏按察使、布政使、两淮盐政、陕西按察使、布政使、江宁布政使。道光十一年（1831年），因功升任河东河道总督。道光十五年（1835年）十一月，因治河有功，升两江总督，第二年任江苏巡抚。道光十七年，升任湖广总督。正赶上荆襄水患，林则徐到任即修筑河堤，亲自督视，治理水患。

在这些年中，林则徐在官场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由一名小京官逐步升为总督。在京时，他参加了宣南诗社，结识了龚自珍、魏源等人。他常与好友诗酒唱和，切磋学问，尤其留意经世致用之学，关心社会现实。在江苏他忠实执行禁烟法令，认真访查，力拿严惩，江苏禁烟取得初步成效。在任中，他廉洁奉公，不避权贵，平反冤狱，特别是关心民间疾苦，注重兴修水利，疏浚河道，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但由于性情过于急躁，往往疾恶如仇而不能忍耐，得罪了一些达官贵人，所以他写了“制怒”两个大

字悬挂于中堂自警。他升任湖广总督后，开始了大的禁烟运动。

十九世纪上半叶开始，英国资产阶级使用了殖民武库中最阴辣的手段，以鸦片毒品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英印殖民政府在印度生产鸦片烟土，卖给英国鸦片贩子走私运入中国牟取暴利。鸦片象一股黑色的毒流源源不断涌入中国，每年平均走私进口量，从十九世纪初的三、四千箱，激增到三十年代的二、三万箱，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它使清朝统治阶级更加腐化，愈加残酷地剥削压榨劳动人民。同时又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银贵钱贱，加重了劳动人民的实际负担，也加深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打击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鸦片不仅吮吸着中国人民的血汗，而且还直接毒害中国人的身体和精神，摧残中国的社会生产力。

面对着西方殖民者猖狂的鸦片侵略，深受毒害的人民强烈要求禁烟。虽然道光帝从登基不久就厉申禁烟，但由于许多官僚的贪赃枉法，禁烟令实际是一纸空文。由于道光帝严禁与弛禁间动摇不定，而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又是鸦片受贿集团的实际领袖，所以鸦片输入有增无减。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帝上疏，历数鸦片给中国带来的祸害。这时远在武昌的林则徐也立即上奏，遥相呼应，恳请禁烟。未等皇上批示，他就在两湖地区开始禁烟销烟。事实证明，只要有决心，禁烟是完全办得到的。但是，深得道光帝宠信的协办大学士兼直隶总督琦善，却与穆彰阿一起反对禁烟。在严禁派与弛禁派的激烈斗争中，道光帝仍依违两可，犹疑不定。林则徐见状深为忧虑，便不避风险，于九月又上一折，尖锐指出鸦片的危害，无情揭露了鸦片受贿集团和吸食者的关系，使道光帝顿时猛醒，倾向于严禁派，下令宣召林则

徐进京商议禁烟办法。林则徐接令后从武昌火速起程，星夜赶路，于十一月风尘仆仆地到达北京。从第二天起，道光帝便连续召见他八次，并恩准他在紫禁城内骑马，礼遇可谓隆重。林则徐的到来使弛禁派慌作一团，他们对道光帝的指示阳奉阴违。林则徐的一些好友，朝野一些有识之士都认为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是凶多吉少，为他担忧。林则徐自己也明白此行是“身蹈危机”，“乃蹈汤火”，但对民族的热爱，对民间疾苦的关心，以及忠君爱国的传统思想，都使他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决心严厉禁烟，为国为民除一大害。

道光十九年（1839年）初，林则徐在北京接连几天向师友故旧拜别，他表示决心说：“死生命也，成败天也，苟利社稷，不敢竭股肱以为门墙辱。”

1月8日，肩负重任的林则徐离开南下。他仅带几名随行人员，并发出传牌：“不许在各驿站索取丝毫，该州县亦不必另雇轿迎接。”“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便饭，不必备办整桌酒席。”沿途他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3月10日，林则徐到达广州。钦差大臣到达的消息在广州不胫而走，各种人都拭目以待，静观着这位风度庄严、表情严肃，黧面长髯的大臣的所为。根据以往的经验，一些鸦片贩子认为，用不了几天风头就能过去，只要有大量的钱财行贿，就能蒙混过关。

二、虎门销烟 大扬国威

林则徐到广州的第二天，在行辕门口贴出查禁鸦片，不准随员办事人员受贿，不准说情的告示。紧接着，开始了紧张的明查暗访。为了详细了解外国烟贩子的行踪，他特意雇佣了两个长期

在商馆为外商做饭的厨子到行辕备办伙食。3月18日，林则徐突然传见十三行洋商。十三行洋商，是清政府指定垄断对外贸易的行商。其中，怡和行行首伍绍荣是总商。这些行商一贯帮助外商贩卖鸦片，走漏白银，探听消息，进行贿赂，从中牟取暴利。林则徐愤怒地斥责他们的种种罪行，要他们“立即逐一据实供明，以凭按律核办。”伍绍荣仍企图行巨贿过关，提出愿以家资报效。林则徐大怒道：“本大臣不要钱，要你脑袋尔！”要他们回去通知外商将鸦片全部缴出，限三天内答复。林则徐斩钉截铁地宣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三天期限已到，但目中无人的外国烟贩却拒绝交出。林则徐下令传讯英国大烟贩颠地，开始和外国侵略者进行直接斗争。这时，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气极败坏地从澳门赶到广州，把颠地藏到商馆保护起来。林则徐闻讯后立即命令中国军队包围商馆，经过坚决斗争，义律终于屈服，被迫同意交出全部鸦片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共二百三十七万多斤。

1839年6月3日，广州附近的虎门海口人山人海，把两个长宽各十五丈的水池围得水泄不通。池旁堆着石灰、盐包和集中起来的二万多箱鸦片。林则徐兴奋地来到现场，在隆隆的礼炮声中，具有历史意义的虎门销烟开始了。兵勇把盐巴撒入水中，又把鸦片抛入池内，浸泡一段时间后，再投入石灰。盐水沸腾起来，毒害人的鸦片终于化为一池池渣沫，随着退潮的海水流入海洋。人们欢声雷动，这激昂的场面显示了中国人民坚决反帝的英勇气概。销烟工作一直进行到25日。连前来参观的外国人也十分佩服，他们原来“断言中国人不会禁毁一两鸦片”，都会贪污进自己的腰包。但亲眼看到后，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惊叹“不

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一工作更忠实的了。”

正当林则徐在广东全力以赴销烟禁烟的时候，弛禁派却在京城向道光帝大进谗言。道光帝竟偏听偏信，下旨“不准以呈缴烟膏烟具入奏。”这时正在高潮的禁烟运动不啻是当头一棒。除广东以外，各省收缴烟土烟枪几乎停顿。广州城顿时谣言蜂起，鸦片贩子和吸食者的活动更加肆无忌惮。林则徐明知事出有因，但仍激流勇进，严正宣告：“彼造谣言惑众者，名为误会，实则矫诬，一经访获讯明，定当立行正法。”

三、抗击侵略 不屈不挠

英国殖民者不但不肯放弃罪恶的鸦片贸易，而且蓄谋要用武力侵略中国，通过战争获取特权，掠夺中国财富。林则徐也估计到英国侵略者不会甘心失败，可能佯动武装侵略。因此他在虎门销烟池旁，向前来参观的外国人庄严宣告：“我们不怕战争！”林则徐在广东一边禁烟，一边积极进行各种反侵略的准备，他新建了靖远炮台，并添购了二百门大炮装备虎门各炮台，还在武山与横档山之间拉了两道拦江木排铁链。林则徐还十分重视水师的建设和训练，亲自与水师提督关天培一起到狮子洋“校阅水师”。为了适应同侵略者海战的需要，还特地买了一只旧洋船供水师士兵演习攻首尾跃中舱之法”。

林则徐还根据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提出了“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作战原则。尤其可贵的是他认识到民心可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来抵抗外敌。他认为“非但水陆官兵，军威壮盛，即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因此林则徐到广东后，就招募了五千多渔民、船夫、组成水勇，成为

抗英战争中一支重要力量。

由于林则徐积极备战和发动群众，屡次挫败英国侵略者的武装挑衅，取得了鸦片战争中前哨战的胜利。

1839年9月4日，义律率英舰三只到九龙山炮台挑衅，遭到广东水师的勇敢还击，英舰中弹，死伤多人，只得狼狈逃窜。11月3日，义律又派军舰阻挠商船进口，林则徐派水师前往护航，双方在穿鼻洋面展开激战，打得英舰“窝拉疑”号帆斜旗落，仓皇遁去。接着义律又六次指挥英军进攻官涌山，都被守军击退。林则徐还命令沿海兵勇对英舰进行夜袭火攻。1840年2月29日，水师兵勇在长沙湾焚烧英舰数艘。6月8日，又在磨刀洋夜袭英军，焚毁英船二艘。在林则徐指挥广东军民的沉重打击下，英船“每日东飘西泊”，不敢靠岸，得不到淡水供应，陷入“以布帆兜接雨水，几乎不能救渴”的狼狈境地。

1840年6月，英国侵华舰队宣布封锁珠江，鸦片战争正式开始。林则徐命令沿海官兵，森严壁垒，严阵以待；并发表告示，宣布“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还派出水师兵勇乘夜黑潮涨时，出动火船，顺风焚烧英舰。英军见广东沿海防守严密，无隙可乘，只得暂时放弃一举侵占广州的计划，以主力北上，留下一部分军舰继续封锁珠江。8月19日，英舰数艘攻打关闸炮台，悍然登岸骚扰。林则徐闻讯，立即派兵从关闸和青州洋两面夹攻，打伤英舰“路易莎”号的前后桅舱，并击沉舢板数只。为了粉碎英军封锁，林则徐坐镇虎门，并与关天培亲往沙角海口督战，鼓励水师兵勇出洋迎击敌人。8月31日，广东水师两次从沙角出击英军，在矾石洋击伤英舰一艘，一直战斗到天黑，英舰才乘机随潮南窜。

在林则徐任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期间，英国对广东沿海的侵略始终未能得逞。林则徐指挥的初期广东抗英战争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英国殖民者的嚣张气焰，保卫了祖国的神圣海疆。它还说明只要能像林则徐那样认真备战，发动群众，实行正确的战略战术，即使是号称“海上霸王”的英国舰队，也不是不可战胜的。

林则徐为保卫祖国建立了功勋，可是却遭到清政府内投降派的百般打击迫害。早在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出发赴广东禁烟前，投降派头子穆彰阿、琦善就威胁他“毋后边衅”。因此，很多人已为他担忧，但林则徐坚定表示，为了维护民族利益，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

英军在广东遭到林则徐领导的广东军民迎头痛击，便转而北上，占领浙江定海，然后直驱渤海湾大沽口。道光皇帝惊慌失措，急忙派直隶总督琦善到大沽口与英方谈判。卖国贼琦善对侵略者奴颜卑膝，竟向义律表示表政府一定对林则徐“重治其罪”，并乞求英军退到广州谈判，保证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满意解决。在道光皇帝面前，琦善一方面以英国“船坚炮利”来吓唬，另一方面则千方百计诬陷林则徐“措置不当”，使英国蒙受冤抑，以致惹祸；并污蔑广东军民击毁的敌舰“本非兵船”。本来禁烟与抗战都不坚决的道光皇帝在英国军舰大炮威胁和投降派的谰言影响下，转而指责林则徐“办理不善”、“误国病民”，竟下令将他革职，“交部严加议处”，改派民族败类琦善为钦差大臣署理两广总督。林则徐不计个人安危，仍旧毅然上了一份《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驳斥了投降派所谓禁烟引起战祸的谰言，“天下万世之人亦断无以鸦片为不必禁之理”。他还向道光建议“以通夷之

银量为防夷之用”，即从粤海关收入税银中抽出一部分来造船制炮，加强国防，最后还要求到浙江抗英前线“随营效力”。这样一份充满爱国激情奏折，却被道光斥为“一片胡言”，“无理可恶。”

琦善到广东后，一切与林则徐反其道而行之。他下令拆除拦江木排铁链，裁减水师遣散水勇，惩办抗英将领，包庇重用汉奸。他在英国侵略者的威胁利诱下，竟擅自与义律议定割让香港、赔偿烟价六百萬元的《穿鼻草约》。林则徐闻讯极为愤慨，发动爱国士绅联名请愿，集会声讨，并动员广东巡抚怡良向皇帝揭发琦善的卖国罪行。1841年2月，英舰进攻虎门，由于琦善不发援兵，关天培血战捐躯。林则徐义愤填膺，准备出资自雇壮勇去应敌，并痛斥琦善“倒行逆施，懈军心，颓士气，壮贼胆，蔑国威。”道光接到怡良揭发琦善出卖香港的密奏，决定将琦善革职，锁拿来京，改派皇族奕山为钦差大臣来广东指挥抗战。林则徐又向奕山提出了一份长达两千余字、包括六条战守措施的广东防御计划。但是奕山根本不予采纳，却轻举妄动，冒险袭击，结果大败而归。在广州危急之时，道光却命令林则徐速往浙江听候谕旨。林则徐只得怀着悲愤心情离开广州。广东士绅、百姓依依不舍，送了他很多颂牌，其中一面写道：“民沾其惠，夷畏其威”，表达了人民对林则徐的拥护和感激。

林则徐到浙江前线后，积极协助两江总督裕谦筹划镇海防务，并参加研制新式大炮、战船。可是不久，道光又下旨将他流放新疆伊犁。他8月从杭州出发，途中因黄河决口又命他去开封治河。林则徐竭尽全力，亲临堤坝工地督工，终于使大坝在六个月内合拢。正在举行庆功宴会之时，圣旨又到，不仅不予嘉奖，

反而命其继续流放伊犁。林则徐在流放途中时刻关心抗英前线战况，写了很多充满爱国激情的诗歌和书信。“关山万里残宵梦，犹听江东战鼓声”。甚至在梦中，他也听到了抗英前线的战鼓声。到新疆后，林则徐仍念念不忘“亡羊牢必补”，并写信揭发投降派的罪行。

从新疆流放回来，林则徐一度担任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1849年，他因病回到原籍福州，又积极支持福州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入城的斗争。他曾带病乘小船亲赴闽江海口巡视，并联合爱国士绅联名上疏，还鼓励林昌彝编撰《射鹰楼诗话》等爱国著作。

值得注意的是林则徐在大力主张加强东南海防，抵抗英国侵略的同时，还建议要加强西北边防，提防沙皇俄国从北方的袭击。他曾大声疾呼“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他在新疆屯田勘垦，为开发新疆，巩固西北边防，作出了贡献。

林则徐这种不怕打击迫害，百折不挠，反侵略反投降的坚定立场，表现了一个伟大爱国者的本色。

四、面向世界 维新先驱

林则徐的进步性还表现在他能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睁眼看世界，提出向西方学习和保护发展民间工商业的主张，成为中国近代维新思想的先驱。

清朝封建统治者闭目塞听，妄自尊大，对世界形势、外国情况茫然无知，甚至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视为“蛮邦岛夷”，把外国先进科学技术说成“奇技淫巧”。而林则徐敢于正视现实，注意调查研究世界大势。他一到广州，便派人探听西事，以便知己知彼，战胜敌人。他在自己的衙门里组织翻译外国人的报纸和书

籍，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大规模翻译外国书报的创举。他让人把英国人所办《广州周报》翻译过来，称为“澳门新闻纸”，“借以采访夷情”。并将其中有关论述中国、禁烟、茶叶等方面文章的译文编辑成《澳门月报》，还选了四条；附在奏折里呈给道光皇帝阅读。为了了解西方的地理、历史、政治，他又组织人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为《四洲志》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比较译细介绍西方地理的书。为了对外斗争的需要，又选译了瑞士人滑达尔写的《各国律例》，以了解各国的法律制度。另外，还摘译了英国人德庇时著《中国人》一书，辑成《华事夷言》，以了解外国人对中国事情的看法。为了学习外国军事技术，他又搜集并组织翻译了大炮瞄准法、战船图式等资料。林则徐还能放下“天朝大吏”的架子，利用一切机会，亲自向外国人了解情况。如他在发出致英国女王的照会前，先将照会底稿给英国医生喜尔看，征求意见。他在浙江“听候谕旨”时，留心钻研各种火炮制造知识，改进武器装备。当他听说嘉兴县丞龚振麟精通泰西算法，巧于设计后，立即将他调到宁波军营，让他潜心研制新炮。不久，龚振麟就研制成“磨盘架四轮车”炮。这种炮比西方的四轮炮车更为灵便。

由于林则徐能够睁眼认识世界，了解敌情，所以能在对外斗争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策略。他注意对外国人区别对待，提出“奉法者来之，违法者去之”，“苟知悔改，尚许回头”。一方面严禁鸦片，同时又保护正当对外贸易，并利用西方各国之间的矛盾。林则徐还进一步提出了变敌人的长处为自己的长处，即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用来抵制西方的侵略。这个思想由他的好友魏源阐述为“师夷长技以制夷”。尽管林则徐当时对西方的

认识还是比较表面、肤浅的，接触西学的目的主要还是出于外交、军事斗争的需要，但他毕竟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的风气，不愧是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则徐不但积极建议仿制外国新式船炮，兴办近代国防工业，而且一贯主张保护和发展民间工商业。他在任两广总督时，反对“封关禁海”，主张保护中国商民出洋贸易。他认为“内地民人，格于定例，不准赴各国贸易，以致利藪转归外夷”。他在1848年任云贵总督时，曾建议皇帝准许民间自由开发矿藏，“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成则加奖，歇亦不追。”他还请求开发“铅禁”，允许民间自由开采贩卖。这些都反映了萌芽中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利益与要求，对以后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维新思想，起了一定的先驱作用。

林则徐到新疆后，伊犁将军布彦泰奏请让林则徐在新疆兴办屯田垦荒事宜，林则徐指挥军民开沟凿渠引水灌溉，得良田三万七千余顷，让许多维吾尔族百姓耕种土地。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清廷以林则徐在新疆查勘开垦，著有劳绩，命回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补。第二年，林则徐被任命为陕西巡抚。1847年，授云贵总督，镇压了当地的汉族和少数民族起义。因此，被皇帝加太子太保，赐花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他因病请归。第二年，广西太平天国起义，他被授以钦差大臣，去广西镇压起义，他见诏后星驰就道，走到半路，林则徐病死在潮州。

林则徐死后，皇帝十分痛惜，追赠太子太傅，谥号文忠。在云南、江苏、陕西都为他建了祠堂。林则徐才识过人，而对待下属十分和蔼，因此手下人都乐为其所用。

在外国资本主义开始向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中华民族面

临沦入半殖民地深渊的严重关头，林则徐能挺身而出，坚决实行禁烟，并发动人民群众，抵抗外国武装侵略，维护了民族尊严和主权，捍卫了祖国的领土。他还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发展民族工商业。这些都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和民族的利益，是他一生活动与思想的主流。可以说，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他的名字，将昭垂史册。

姚莹

姚莹（1785～1853年），字石甫，号明叔，又号展和，祖籍安徽桐城。清代爱国将领。

一、关心国运 坚决主战

姚莹小时，受到严格家教，师承祖父——桐城派大师姚鼐。他出身科举，1808年成进士。道光初年，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与龚自珍、魏源等人交往投契，甚为相得。他注重现实，关心国家命运，以文章善持论，指陈时事利害，慷慨深切而显露才华。

1816年起为官福建，先后任平和、龙溪县令，三年后，调往台湾，署海防同知。噶玛兰同知。1831年改发江苏，历任元和、武进知县，迁高邮知州，不久提为淮南监掣同知，护理两淮盐运史。“自牧令至监司，所至有贤声，其政绩在民，不可胜记。”数次被林则徐、陶澍等著名的封疆大吏荐举，认为他才大可用。

1837年，因他熟悉情形，被升任台湾兵备道。当时，鸦片输入愈烈，危害日深，姚莹深知这不啻国难当头，因怀林刚徐遥相呼应，坚决支持林则徐的禁烟斗争。

在去台湾之前，姚莹就非常注意了解西方各国的情况，读过当时还不多的几本介绍外国的书籍，使他敏锐地感到西方殖民势力的威胁。他曾提醒清政府，注意英国侵略者的野心，早作准备。特别是在禁烟之后，他认为英国决不会善罢干休。

禁烟确实触到了英国资产阶级的痛处，顿时恼羞在怒。1839年夏季开始，中国南部海疆战云密布，大战在即。

强敌压境，姚莹坚决主战。他痛斥那些懦弱怕战的主和派，成为以林则徐为首的抵抗派中的一名杰出的爱国者。姚莹知道，台湾孤悬海外，远离大陆，战守困难，稍一疏忽，后果不堪设想。但他坚信民心可用，因此，他一到台湾便与总兵达洪阿“预为战守计”，团结全台文武军民，筹备海防。命令所属各级官兵，修整炮台船只，铸造枪炮弹药，训练水师，加强巡逻，坚决打击鸦片走私，防止夷船偷渡。

二、保卫台湾 数战数捷

1840年6月，英国舰船四十余艘及四千名士兵到达中国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了。不出姚莹所料，7月17日，一艘英国侵略军的双桅帆船，在我台湾西南沿海游弋了两天之后，偷偷驶进鹿耳门，伺机泊岸。这时，在英船北侧的海面上，姚莹派出一队兵船，枪炮齐鸣，敌船四周顿时腾起一股股冲天的水柱。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英船惊慌失措，一面放炮抵抗，一面狼狈而逃。由于姚莹准备充分，英军侵袭阴谋遭到挫败。慑于台湾沿岸的严密防务，整整一年英军没敢冒险进犯。

姚莹并没有放松自己的警惕。他深知，“英夷垂涎台湾已久”，虽被击退，还会“大队复来”。他向督抚邓廷桢等提出“募

壮勇以贴兵防”，“派兵勇以卫炮台”，“练水勇以凿夷船”，“习火器以焚贼艘”，“造大舰以防攻战”，“雇快船以通文报”，“派委员以资防守”等七条防御侵袭的重要措施。并把台湾十七个重要海口和澎湖七口全部设防，同时经常派人或亲自巡视、察看。在他的主持下，台湾防务日渐巩固。

1841年7月，英国又派三桅船舰三只，第二次侵入台湾，但因无机可乘，怏怏而退。9月13日，转而靠近鸡笼港（今基隆），向我海岸炮台开炮。我守军奋勇还击，炮中敌舰，致使敌舰桅杆中折，“冲礁击碎，夷人纷纷落水，死者不计其数，或凫水上岸，或上杉板逃生。”这时，鸡笼附近四乡居民，“屯丁乡勇”，守军水兵合于一处，围追堵截，大获全胜，共击毙和俘虏敌军一百六十六人，获新式大炮十尊。

10月19日，英军再次窥伺鸡笼，声言必要救回被俘英军。台湾海岸守军开炮还击，军民携同作战，终又将敌军击退。

知己知彼，才能保证战胜。姚莹感到原来所了解到的敌情远不够用，他一面继续寻找有关国外情况的书籍、地图；一面亲自进行调查。每次战斗结束，必亲审俘虏、搜集敌船上的各种图表、书信。他分析，英军武器精良，是其长处，但其在台湾作战，战线长、消耗大；并且在战术上最怕搁浅和火攻。因此他认为，与敌作战应“不与海上争锋”，“而以计诱其搁浅，设伏歼擒”。他采取塞港、御炮、破鸟枪、守城邑、稽查奸民等五项完整的防御办法。

几次侵袭均遭败北，敌人又企图寻求防守薄弱的地点实施进攻。1842年3月11日，英舰三桅船一艘，携带杉板四只，靠近大安港（淡化和彰化之间）。姚莹早有预料，并做好了充分的

准备。他派人假作向导，把敌舰引到海边沙汕搁浅后，尽起四周伏兵，猛烈轰击，打死打伤侵略军数十人，并缴获大炮十三门，鸟枪二十支，使敌人企图攻占台湾的阴谋破产了。

三、赤子之心 名垂青史

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导致了鸦片战争的失败，1842年8月，签订了《南京条约》。消息传来，深深刺痛姚莹一颗爱国之心。他痛恨那些主张和议的大员鼠目寸光，只能在敌人的坚船利炮面前“惊心咋舌，罔知所为，相顾聚谋，惟以和夷为事，辱师丧师，不知愤耻。”

主和派妥协投降，诿战争责任于抵抗派。在议和交换战俘时，英人璞鼎查诡称，曾被姚莹俘虏、处决的英军是“遭风难民”，姚莹抗英之举实乃“冒功欺国”。怡良等人对姚莹衔恨于前，陷害于后，随声附和。姚莹和达洪阿竟被坐罪逮问。这一决定，震动朝野，“一时中外作诗著论甚众，闺阁中亦多感咏”；在朝官员也多有“见其功，未见其罪”之议论；特别是姚莹与之共同抗战的台湾军民，更是义愤填膺。当怡良去台湾拿问姚莹时，众兵痛哭投戈，“士民复千百为群，日匍伏于大府行署，纷纷合呈申诉者，凡数十起。”这不仅表明了中国人民对妥协投降的无比愤恨，同时也表达了台湾人民对姚莹这样的爱国官员的尊敬和爱戴。

1843年10月，姚莹被解到北京。他坚信“真道自在人间”。在内外舆论的压力下，道光皇帝也感到致罪于姚莹于情理不合，便在姚莹入狱六日后，降旨以同知直隶知州，发往四川效用。不久，又遣往西藏治狱，往返六七千里，道经绝漠，历尽辛苦，朋

友们都为他抱不平。但他说：“吾辈立志本不在温饱，亦不畏权势，苟能一言一事于斯世有益，所获多矣！夫君子之心，当为国家宣力分忧，保疆土而安黎庶，不在一身之荣辱也。”

在藏期间，姚莹以其忧国忧世的拳拳赤子之心，时刻系念祖国安危。尽管身遭贬谪，环境恶劣，他仍搜集了大量有关边疆的材料，了解周边各国的情况，写下了长达六十卷的介绍我国西藏地区、藏外以至西洋各国情事、诸教源流的《康輶纪行》一书。他说：“欲我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是诚喋血饮恨而为此书。冀血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胥沦于鬼域。”通过印度等国被英侵占的事实和俄国的所为，他提醒国人，英人“窥藏之心久矣”。俄英两国的争夺，是中国两部边疆的严重威胁。他看到鸦片战争以后，“可骇可耻之事，书契以来所未有”，为此痛心疾首。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因为中国无人留心海外，宜其轻中国而敢肆猖獗也。”中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清政府对外界茫然无知，瞶瞶从事的结果。因此，他向人们大声疾呼：开眼看世界！这在当时万马齐喑的时代，犹如巨钟长鸣，震醒了多少昏昏睡梦中的中国人。

当时，好心人劝他不要谈国外之事，免再罹难。他说：“谓余一腔热血何必掬以示人，余谓君血自来真热耳！”姚莹正是把满腔热血献给了祖国。

1848年，姚莹病返原籍。1850年，咸丰帝登位，他被重新起用，任广西按察使，1853年病逝。

姚莹关心祖国前途和民族命运，倡导向西方学习，不愧为近代中国爱国志士的先驱者。他以坚决捍卫祖国神圣领土台湾为己任，以其卓著功勋而名垂青史。

葛云飞

葛云飞（1789～1841 年），字雨田，又字鹏起，浙江山阴（今绍兴市）人。清朝爱国名将。鸦片战争中，曾镇守定海，率领军民英勇地反击了英国侵略者。

一、以正以诚 唯忠唯勇

葛云飞出生于一个下级军官家庭。父葛承陞，曾任江西长淮千总。葛云飞从小就志向远大，既好读书，又爱习武。一天，他跟随父亲外出打猎，父亲问他：“男孩子，要学会拉弓射箭，你会吗？”葛云飞没有回答，立即拉弓挖箭，六发六中。父亲惊喜异常，勉励葛云飞长大要“弃儒从将，报国效忠”。葛云飞牢记父亲的教诲，努力学习军事。他三十岁考举人，三十五岁考中武进士，先后任浙江水师守备、瑞安协副将。经过五次提升，于 1839 年（道光十九年）擢任浙江舟山群岛定海镇总兵。著有《制械制药要言》、《浙海险要图说》、《名将录》及诗文数十卷，后人誉称他是“文武兼通”的将领。

“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惜死”，这是民族英雄岳飞的名言。葛云飞十分敬仰岳飞，更是把这两名话牢记心底。他在戎马生涯中，特别注重严于律己，以诚待人，正直清廉，勇敢刚毅，爱兵如子，身先士卒。他的品德，也感染了属下官兵。

葛云飞在浙江瑞安任副将时，亲笔写过一副对联，并把它悬挂在将府的大厅里。这副对联的上联是：“持躬以正，接人以诚”；下联是：“任事唯忠，决几唯勇”。充分表达了他为国为民，一心报国的志向。1839年（道光十九年），他任浙江定海镇总兵时，随身携带了两把宝刀，一把刻着“昭勇”二字，另一把刻着“成忠”二字。意思是卫国杀敌，生死不惜。一副对联，一对宝刀，是葛云飞一生忠于自己誓言的历史见证。

二、反对投降 收复定海

1840年（道光二十年）6月，英国侵略者对中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广州关关培防守严密，英军进攻受挫，即沿海北上。7月，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强占了定海。这时，葛云飞因父亲去世正在原籍服丧。他一得知定海失守的消息，立即奔赴镇海前线，担负起御敌守土的重任。

定海失陷后，清廷派投降派的首领之一伊里布为钦差大臣，代替主战的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办理军政要务。伊里布主张对英妥协，放弃定海，葛云飞坚决反对。他认为，定海城地处舟山群岛的西部定海岛的中间，周围洋面上大小岛屿星罗棋布，构成了沪、杭、甬的天然屏障，成为控制整个华东地区海上交通的咽喉，是兵家必争之地。更重要的是：“卫国守疆，乃兵将之责。”因此，定海一定要收复。一次，一位名叫安突德的英军炮兵军官在定海的附近测绘地图，被群众抓获。葛云飞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感到这是收复定海的极好时机。因为英军侵占定海后，士兵水土不服，生病的甚多，且遭到当地群众的反对；而安突德又是敌军的重要谋士，被俘后，英军头目坐卧不安，要求释放。于是，他

向伊里布建议：趁敌恐慌之机，发动猛烈进攻，一举收复定海。伊里布不但不支持他的主张，反而强迫他参加同英国侵略军的妥协谈判。葛云飞怒不可遏，愤然宣称：“同逆贼不共戴天，不能相见！”后来，他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参加了谈判。谈判前，他嘱咐部下：“敌人如果开口辱骂我们，我就当场把他刺死，你们抓住他的随从，杀他一个不留！”谈判中，他立场坚定，针锋相对，对英国侵略者提出的无理要求，坚决予以驳回，谈判没有达成协议。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1月，清王朝另一个投降分子琦善，在广州与英国代表义律私下口允了《穿鼻草约》，以换取英军撤出虎门沙角、大角炮台，归还定海。消息传来，葛云飞及其官兵群情激愤，而伊里布却十分高兴，准备先行释放安突德，等待英军撤出定海。葛云飞指出：敌人“机诈成性”，能相信他们的鬼话吗？一旦先交出俘虏，敌人反脸不认帐，赖在定海不走怎么办？他坚定地要求亲自带领军队，分水陆两路挺进，迫使英军交出定海，然后再释放俘虏。伊里布迫于当时形势，勉强采纳了葛云飞的意见。安徽寿春镇总兵王锡鹏、江浙江处州镇总兵郑国鸿随调协助葛云飞收复和守卫定海。不出所料，狡猾的敌人果然提出：先释放俘虏，后交城池。葛云飞义正词严地加以拒绝，一面指挥官兵严阵以待，一面警告敌军：“限汝半时，若再异议，即将贼目（安突德）阵前正法，督令水陆兵来剿矣。”英军见清军来势勇猛，只好先撤出了定海。

定海收复后，葛云飞计划在此增建炮台等一系列防御设施，但清廷不拨经费。他又提出预借自己三年俸薪来修筑定海城防，亦遭拒绝。对此，葛云飞十分气愤，他在给家中的一封信中说：

“文武大员们勾心斗角，对定海的防守全然不顾，这种局势，实在令人痛心！”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8月底，英军第二次北犯。葛云飞请求上级增兵支援，但一直得不到支持。见此情形，有人对葛云飞说：“敌人又要进攻定海了，你虽尽心尽责，但上面昏庸无道，你岂不是赤手空拳地去与敌人硬拼吗？何不一去了之。”葛云飞慨然回答：“大丈夫以身许国，事已至此，当竭力杀敌，一死报国。”

三、城亡亦亡 生死相守

不久，传来厦门失守的消息。为了防备敌人来犯，葛云飞和王锡鹏、郑国鸿三总兵经过研究，进一步划分了防地。王锡鹏率兵据守城西险要晓峰岭，把住西山通向定海城的要道；郑国鸿扼守城西南沿海一线，防止敌人入港口后从这里登陆；葛云飞坚守半塘。半塘位于城南工城一线，面向大海，这里地势平坦，易攻不易守，是敌人必争的重要关口。三总兵决心同心协力，生死以守。

1841年9月，英军头目璞鼎充舰船二十九艘，海军两千余人，再次进犯定海。9月26日上午，葛云飞得到英军开始进攻定海的消息，即与王、郑两总兵共同部署战斗任务，并与部属一同宣誓：“城亡亦亡，不离定海半步！”下午，两艘英舰闯入定海城西南沿海港湾窥视，遭守军炮火轰击，慌忙离去。次日晨，英舰三艘从正面攻击城南土城防线，葛云飞指挥半塘炮台守军将其击退。28日拂晓，英军进攻城西，王锡鹏指挥守军巧妙地利用岩洞隐蔽自己，消灭敌人，使英军无法登陆。29日，英军为分散守军兵力，采取兵分两路同时发起进攻的战法，也被守军击退。

从9月26日至30日，英军动用四十多艘舰船，一次又一次地发动进攻，仍未能占领滩头阵地。这五昼夜的激战，定海五千守军是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英军有精良的武器，并不断地得到增援，清军装备落后，使用土炮、原始刀箭，孤军无援，粮弹不济，伤亡惨重。但全体官兵为了反抗侵略，保卫国土，仍是“前队阵亡，后队继进”，短兵相接，肉搏血战。

10月1日，英军经过充分准备，集合所有兵力，发动全面进攻。防守城西、城西南的总兵王锡鹏、郑国鸿，在激战中相继受伤，战至流尽最后一滴血。城西和城西南阵地失陷后，敌军向葛云飞坚守的阵地蜂拥而至，三面夹击半塘。葛云飞头扎青巾，身穿麻袍，脚登铁齿靴，冒着敌人的炮火，一边指挥战斗，一边亲手操炮轰击敌人。最后，他带领剩下的二百余名勇士冲向敌阵，与敌人肉搏厮杀，吓得敌人胆战心寒。正当葛云飞率部趁机关转战至城西南竹山门时，不幸面部受伤，右眼突出，鲜血淋漓，但他依然坚持与敌人拚杀。他在全身布满四十多处战伤的情况下，还亲手杀死了被俘释放的英国军官安突德。

葛云飞牺牲后，仍然屹立在岩石旁，手举大刀，怒目前视，表现了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

裕 谦

裕谦（约1795～1841年），原名裕泰，博罗忒氏，字鲁山，蒙古镶黄旗人。清末爱国将领。

一、为官清廉 思想开明

裕谦家世代为官，他自己在嘉庆廿二年（1817年）中进士，一帆风顺进入官场，历任知府、按察使、巡抚等职，1839年署理两江总督。他为官清廉，比较关心民间疾苦，特别注重教育。他曾经动员各地捐款兴办义学，“自信天下无不可教之人，无不可善之俗，与其以法绳之，何若以礼束之”。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7月，英军北犯福建、浙江，攻陷定海，两江地区震动。9月，道光皇帝听信琦善谗言，将力主抗战的林则徐革职查办。裕谦痛恨琦善之流的投降媚外，上疏为林则徐极力辩护。他盛赞林则徐是“兵民所悦服，逆夷所畏惮”，挽留林则徐到浙江来共同抗击英国侵略者。他还接受林则徐的推荐，把魏源聘为幕僚。

同年9月，裕谦由宝山赴上海，切实整顿东南防务。他查明江苏沿海岸原有炮台多陈旧不堪，建议添铸三千斤到八千斤的大炮数十位，重建炮台，分口排立，严阵以待。他又亲自检阅各军，将年老力衰的游击黄琴及历练不深的守备孟兆兰分别勒休撤任。并在江宁省赶制盘螺丝抬炮一千杆，分发水陆各营，选精壮兵丁，勤加练习。1841年春，裕谦被任命为钦差大臣。

英军占领定海后，旋退走，副都统海龄建议乘机封闭所有港口，以防止汉奸与英人暗通声气。裕谦上奏反对，他认为沿海人民靠海为家，一旦封港，百姓将何以为生？他又指出，上年对英战争时，渔民曾踊跃协助官兵运粮、救护、作战，功不可没，今后如有战事，仍须依靠他们协助，所以“断无用其船而不准其谋生之理”。况且少数败类勾结洋人，必停泊在人迹不到的偏僻海

汉，怎能公然出入码头？裕谦的分析合情合理，为清政府所采纳。

时参赞大臣杨芳，看到英舰横行无阻，炮火猛烈，认为其中必有“邪术”。他曾在广州以粪桶迎击英舰，名之曰“以邪制邪”，结果一败涂地，中外传为笑谈。“妙计”失灵，杨芳吓破了胆，转而建议干脆废弃水师，龟缩大陆。裕谦坚决反对，他说英军船坚炮利，我水师暂避其锋，乃权宜之计。“一俟洋务平定，必应简练水师，讲求船械，以为久安长治之图。”流露出学习西方船械的开明思想，与杨芳之流的昏聩形成鲜明的对照。对于东南沿海流传的外国“新闻纸”（报纸），裕谦反对一概盲目排斥，认为“新闻纸”与商务关涉之处颇多，所以商人传钞邮寄，“以订货物之应否运往，并无他意。”鉴于当时处在非常状态，他同意不准传播包括“新闻纸”在内的“夷书夷事”，但“亦不必根究”，以免不必要的株连。

英军退出定海后，裕谦并不认为事情已结束。1841年4月27日，广州和约订立，“公知不足恃，守益严”。他抓紧时间，救济、招抚难民，严禁官兵骚扰百姓。对于有过汉奸行为的人，他分别情节，只惩处首犯，小有过失者皆教育了事，尽量团结上下，准备应付新的事变。他广征武士，“不问其人之流品”，只要愿为国家出力，就可应召入伍。他还出告示奖励人民擒杀侵略者，如有缴获英兵船赏银两万，船内物资除枪炮、鸦片外，余皆归得船者。生擒义律、懿律，赏银五万，擒“白鬼”一名赏银二百至五百，擒“黑鬼”一名赏银一百，斩首者减半。

他估计英军可能再犯，对于定海防务提出了六十条详细意见，包括增添陆军，添拨大炮，制补军械，修理制船，浙江提督按年巡阅定海等项。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他的这些主张并未能完

全实现。

二、殚竭血诚 身先作则

1841年8月，战事再起，璞鼎查率军犯厦门，总兵江继芸力战牺牲。裕谦得报，一面飞调江宁北旗官兵八百名，寿春镇标官兵一千名，兼程前来镇海以便调遣。一面报告上级，表示自己“惟有殚竭血诚，身先作则”，决一死战。他率领文武僚属庄严宣誓与镇海共存亡，“文武将佐，敢有受夷一纸书，去镇海一步者，明正典刑，幽遭神殛”。言词慷慨，闻者莫不感奋。

当时镇海军兵数千，裕谦直接指挥的不过徐州一部及手下亲兵，其余军队皆隶属提督余步云。裕谦与余步云约好分险驻军，由余步云守招宝山，知府黄冕守金鸡山，裕谦坐镇军中。余步云本是一个贪生怕死的懦夫，竟称病不视事。

9月26日，英军大举进犯定海。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率部殊死抵抗，血战六昼夜，重创英军，烧其战舰。英军疯狂反扑，调鼓浪屿军队来援，侵略军依仗人多势众，船炮坚利，攻陷定海，三总兵皆以身殉国。

定海陷，镇海危在旦夕。英军集结北上，香港空虚，裕谦请求道光帝转令奕山进攻，以牵制北犯英军。奕山等每月开销军费三十余万两，大饱私囊，奏称“香港地方洋人并不久居”，又称“守为上策，攻战次之”，拒绝出战。英军毫无后顾之忧，全力扑向镇海。

裕谦知镇海兵单，援军未至，余步云又首鼠两端，知事无可为，决心以死报国。他激励将士，凭城固守，同时将军中全部文件转移至嘉兴行馆，安排家属后事，遣散幕僚，让他们暂避城外

数里。裕谦交代他们：如果我军得胜，你们快书捷报，如果战败，你们保护我的家人出走，不要管我。他坚信敌人可以一时占领镇海，却休想永久占有它。他还希望朝廷能另简大员，镇守东南门户，勉励众幕僚襄助后来人防守海疆。

10月10日凌晨，英军兵临城下，裕谦登城督战，他亲擂战鼓，士气大振，硝烟弥漫，杀声震野。忽见余步云单骑来谒，裕谦正全力指挥杀敌，没有工夫理他。不一会儿，余步云复转回，对裕谦嚅嚅地说：“我死是应该的，但家有老小百余口，我死了他们怎么办？而且我女儿正巧今天出嫁，这便如何是好？”裕谦声色俱厉地回答：“儿女之情，君固不免，但忠义高于一切。”说完扔下余步云，投入激战。余步云逃窜，招宝山军无主帅而溃散，牵动金鸡山阵脚，黄冕军亦败。英军乘势猛扑，一时枪炮齐发，弹如雨注，清军的原始武器抵挡不住，守兵皆散。

裕谦见大势已去，悲愤万分。他徒步下城，向着西北方向叩头遥拜，举身投水。有千总马瑞鹏看见，跳入水中急救，裕谦已昏迷，马瑞鹏以一小肩舆护送裕谦转移。英军恨裕谦入骨，出十万金购其尸体，马瑞鹏等人冒着生命危险，把他秘密送一小船上。他在昏迷中仍喃喃语城上战事，舟行五里，这位蒙古族爱国官员停止了呼吸，只见他微睁双眼，死不瞑目，似有无限隐恨。

历史上强敌入侵时，敢不敢于拼命抵抗，是对每个人的严峻考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裕谦敢于领导士兵，以大刀长矛抗击近代化装备的殖民军，表现了中国人民反侵略的英雄气概。裕谦虽死，浩气长存。

道光皇帝在其死后赠太子太保，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在镇海建立专祠，谥号靖节。

海 龄

海龄（？～1842 年），满族，郭洛罗氏，满洲镶白旗人，清朝爱国将领。他作战勇敢，指挥有方，历任骁骑校，张家口守备，大名、正定总兵，西安、江宁副都统，京口（今江苏镇江）副都统。

一、不畏强敌 誓死抗英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末期，海龄领导和指挥了震惊中外的镇江保卫战。对于这一次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者的保卫战，恩格斯曾予以高度评价和热烈赞扬，他在《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一文中指出，英军在进攻镇江时，“才充分认识到：驻防旗兵虽然不通兵法，可是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这些驻防旗军总共只有一千五百人。但却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个。……在这次战争中，英军损失了一百八十五人，他们为了对此进行报复，在劫城的时候大肆屠杀。英军作战时自始至终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手段，这种手段是和引起战争的走私贪欲完全相符的。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遇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

1840 年，英帝国主义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相继侵占了厦门、定海，并于 1842 年 6 月攻陷上海。7 月，英军出动军舰七十余艘（其中两艘各装备有大炮七十四门），士兵七千多

人，沿长江西犯，威逼南京城之门户镇江。当时，镇江城外各地由浙江参赞大臣齐慎、湖北提督刘允孝各率兵二千余驻守；镇江城内只由海龄率旗兵千人、青洲兵六百人防守，城防武器仅有土炮二十多门，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很大，镇江危在旦夕。

当时，腐败无能的清王朝对洋人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在这种政策的影响下，英军所到之处，官吏皆惊慌逃窜，兵士不击自溃，“或以贵师而奉承恐后，或以宿将而畏葸先奔，或以重臣而一败涂地。”两江总督牛鑑在镇江不仅不作抗击英军的军事部署，反而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去慰劳英军。当敌进逼时，牛鑑鞋底抹油，溜之大吉。

在这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海龄挺身而出，勇敢地挑起抗击英军的重担。他竟然宣布：英军入侵，本副都统即率军出击！

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海龄进行了一系列的战前准备工作。如察看地形，调整炮位，抢修工事；亲率守军操炮练武，提高杀敌技术；将大部分旗营官兵调进城内，增加城防力量；预付半年军饷，激励部队奋力作战；清查户口，严防奸细混入城内，等等。同时，还教育群众，组织群众，要求城内居民收集大刀、长矛、短剑以及砖瓦碎石，和军队一起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巷战，誓与敌人血战到底。

英军自上海沿江西犯以来，从未遭到清军的真正抵抗。当兵临镇江城下，见守城军民英风凛凛，众志成城，未敢贸然攻城，遂屯兵城外，一面观察动静一面进行攻城准备。一场恶战，即将在镇江城展开。

二、避敌之长 击敌之短

英军经过一番准备，于7月15日对镇江城发动了猛烈进攻。

第一仗是在城外焦山开始的，海龄指挥扼守焦山的一百多名蒙古族旗兵，与英军奋力厮杀。在战斗中，海龄发现敌人每次进攻都先是用洋炮轰击，杀伤对方有生力量，然后再让步兵冲锋，占领目标。根据英军这一作战特点，海龄指挥部属避敌之长，击敌之短，躲开敌人的炮火，诱敌深入，乘短兵相接时将其消灭。当敌人猛烈打炮的时候，守军士兵就利用树丛、土堆、山凹等地形地物，将自己隐蔽起来。英军炮击过后，见山上没有一丝动静，以为山上中国守军已被其炮火所灭，皆洋洋自得地爬上山来。当英军爬到半山腰时，清军便出其不意地从各个隐蔽处一跃而出，手执大刀、长矛冲入敌群。英军还没有醒悟过来，就都一命归阴了。

“坚甲利炮”，是英军之所以能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的主要军事支柱。海龄号召全城军民人人献计献策，运用各种办法打击敌人。镇江军民利用水势流向，在敌舰上游向江中撒了大批稻草，草顺水势，沿江而下，涌到敌舰周围，又被旋转的水流卷进舰身下面，缠住敌舰推进器的拨水叶子，使敌舰无法行驶，被迫停在江中。晚上，敌人都龟缩在一起，不敢行动。镇江军民趁着茫茫黑夜，划着小船悄悄靠近敌舰，利用各种燃烧物，顺风顺水放起火来。一连几个晚上，烧毁不少敌舰。

三、孤军奋战 浩气长存

在英勇的镇江军民面前，英军屡遭惨败。恼羞成怒的英军经过周密准备于7月21日对镇江城发动了报复性的总攻。驻守镇江城外东、南两线高地的齐慎和刘允孝所率守军，在英军猛烈的攻击下，交战不久即溃败。镇江城外有利的防御地形，很快被敌人占领，城内守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这时，英海军陆战队趁势大批登陆，将镇江城团团围住，并在数十门大炮的掩护下，向南门发起攻击。

面对这种形势，海龄镇定自如，毫不动摇。他亲临南门，登上鼓楼指挥守军用炮、弓箭、石块、砖头打击敌人，使其无法靠近城门。英军妄图在南门突破的计划落了空。与此同时，英军总指挥官璞鼎查所率领的另一支部队渡过运河，直扑东门，也被东门守军用土炮、土枪击退。璞鼎查重整部队转向西门，调来重炮猛轰城墙。海龄立即赶到西门指挥战斗，在军民齐心协力的奋勇抗击下，英军进攻西门又遭失败。

屡吃败仗的英军接受了几次失败的教训，在转向进攻北门时，一面用猛烈的炮火进行掩护，一面搭起云梯偷偷地爬上城墙。守军见敌人爬上城来，立即扑上去，与登城英军展开肉搏战。有的用大刀砍杀敌人，有的把敌人拦腰抱起摔下城去，有的甚至抱住敌人一起滚下城墙，同归于尽。这时，敌人发现城墙是依山而筑，并有寨门，遂以十多门大炮集中轰击一处寨门，结果寨门被轰塌，一股英军从轰塌的寨门缺口处鼠窜入城。海龄率军赶来，果断地组织反击，与敌殊死战斗，大部分敌人被砍杀，其余的为了保命皆溜出城去。

英军不甘心失败，再次集中兵力猛攻西门。午后，西门被英军用火药炸开。守卫西门的镶白旗举人噶喇，率士兵冒死搬运土石，堵城拒敌。由于敌人连续以猛烈的炮火进行轰击，堵城失败，英军趁着滚滚浓烟，穷凶极恶地杀进城来。海龄又赶到西门，和噶喇所率士兵一起和敌人拚死厮杀。激战中，海龄身负重伤，仍然坚持指挥战斗。此时，大批英军涌至，海龄即令部队与敌人展开巷战。他对将士们说：在敌人面前，我们要做一名勇士，宁可为国家战死疆场，决不能为个人苟活而拜倒在敌人脚下。

在浴血奋战中，海龄路过家门，见到怀抱婴儿的妻子，便对她说：“今日之战，官兵恐将不利，请勿惜别，立刻当去。”妻子深明大义鼓励丈夫说：“今日临大事，君犹念妻子乎？君但督士卒，见死勿弃城。”说毕，即情抱婴儿纵身跳入熊熊大火之中。海龄见妻子如此壮烈死去，即飞身上马，率四十名亲兵杀向敌阵。将士们在海龄的影响下，面对有洋枪、洋炮的敌人，毫不畏惧。城堡被敌占领，就利用房屋、断桥与敌周旋，使英军每争夺一所房子、一座桥梁、一条街道，都要付出重大代价，直至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海龄见镇江城已不保全便坚定不屈地跳进大火中自焚殉职。

后人为了纪念镇江保卫战中壮烈牺牲的将士，修建了一座忠烈祠。祠中有这样一副引人深思的楹联：“当时谁识孤军苦，此日犹闻杀贼呼。”

骆秉章

骆秉章（1793～1867年），原名俊，字吁门，号儒斋。广东花县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士，在历任多种职务后升任

湖南巡抚。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长期在湖南、湖北、江西与曾国藩、胡林翼等密切合作，镇压太平军。咸丰九年春（1859年），石达开再次由江西进入湖南。骆秉章调魏喻义、陈杰扼守岷河，命刘长佑、刘坤一招兵四万人准备迎战，并下令把在江西的肖启江、张远兰和在贵州的田兴恕调会湖南。石部太平军攻陷桂阳、宜章、兴宁，进取衡州；在岷河遭官军拦堵，回攻嘉禾、新田、临武、宁远，主力驻屯永兴。刘长佑兵出祁阳，与石达开相持。太平军在攻东安和兴安时，受挫于刘坤一，转往宝庆，人数号称三十万；但在这三十万人中，许多人都是一哄而起参加义军行列的乌合之众，经骆秉章招抚，数万人自动散伙。官军赵焕联、田兴恕部率先到达，结营于宝庆城外。太平军列环形阵达二百里，将官军全都包围住了。胡林翼派李续宜驰援，骆秉章也派刘长佑、刘岳昭、何绍彩三路进兵。六月，两军大战于宝庆城下。太平军因人数众多但缺乏粮食，再战再败，被迫往东撤退，由全州进入广西。

咸丰十年（1860年），骆秉章奉命赴四川督办军务；载淳（同治）即位，委任他为四川总督。同治元年冬（1862年），蓝大顺、李永和等川、滇起义军被平定，蓝、李等在兴盛时人数曾多达十余万。石达开见四川境内战事连绵不断，于元年春攻陷石柱，进军涪州，但受阻于刘岳昭部，仍又返回贵州。随后又从叙永、江安、长安分攻洪、高、应等，被刘岳昭和曾传理击败；撤退到云南，再分兵攻筠连、高县，官军扼守住了金沙江。石达开计划分三路进川，骆秉章亦分调诸将和土司兵相应设防。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石部战将赖裕新从宁远攻冕宁，到达越嶲，在与邛部土司岭承恩的战斗中阵亡；余部分散到川西十余里的区

域内，遭到官兵和民团的分头截杀，几乎全部被歼灭于平武山谷中。三月，石达开率部渡金沙江，被唐友耕等部官军阻挡，被迫抄小路转往土司紫打地。恰值大渡河河水暴涨，官军趁太平军半渡之际发动袭击；太平军撤退后猛攻松林、小河，前面又被土司王应元堵住。岭承恩夜袭马鞍山，断了太平军的粮道。石达开于是陷入困境，无法渡过河去，粮食又吃尽了，靠杀马吃肉和吃树叶过日子。部队逐日减员，最后只剩下七、八千人，走到老鸦漩，再次遭土司兵拦截。石达开带着儿子一人和随从三人投降，余部除四千人被散外，其他人全部惨遭屠杀。五月，石达开就义于成都。

同治六年（1867 年），骆秉章升任四川总督协办大学士；十一月，骆秉章病故。

左宗棠

左宗棠（1812～1885 年），字季高，湖南湘阴人。清末湘军首领之一，洋务派的中坚人物。举人出身。从咸丰十年（1860 年）到光绪元年（1875 年）之间，先后参加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起义，从光绪元年开始，他率兵讨伐阿古柏，收复了乌鲁木齐、和阗（今和田）等地，阻遏了俄英对新疆的侵略。后任军机大臣、两江总督，中

法战争中督办福建军务。1885年7月，病逝于福州。谥号文襄。

一、镇压起义 中兴名臣

左宗棠出身于一个文化家庭，他的父亲左观澜是个廪生，有很好的学问和修养。道光十二年（1832年），左宗棠考中了举人，但随后他三次入京会试都名落孙山。于是他放弃了科举，一心钻研历史、地理、兵法经世致用的学问。因生计所迫，还从事私塾教学，有时也参加一点田间劳动，曾自号“湘上农人”。他平时喜欢故作豪言壮语惊人，在公卿士大夫中颇有名声。曾经自比为诸葛亮，大家都觉得他非常狂妄。但胡林翼却十分欣赏他，认为看遍全国，没有一个人的才能超过左宗棠。左宗棠快四十岁时，他对身边的亲友说：“除非帝王一心想求得贤相，否则，我这辈子大概是没有什么指望了。”

咸丰初年，太平天国起义。在胡林翼的推荐下，左宗棠开始入仕，从知县提拔为直隶州同知。后来，左宗棠的名声越来越大，他的一个同乡在见咸丰帝时，咸丰问他：“你认识那个举人左宗棠吗？他为什么这么久没有外出任职，年纪多大了？再拖下去精力就会衰退，你可以写信告诉他我的意思，应当及时出来为我督办贼寇。”

咸丰六年（1856年），左宗棠因功被加四品卿衔。不久，以四品京堂的身份跟从曾国藩治理军务。左宗棠招募了五千人马，参考运用王鑫的治军法则，号称“楚军”。咸丰十年八月，左宗棠楚军建成后挥师东下，取道江西，转战前进，一路攻克德兴、婺源。太平军直赴浮梁景德镇，切断了清军的粮饷要道。左宗棠返师回击，在江西乐平、鄱阳一带与太平军展开激战，大败太平

军。

第二年，左宗棠被任命为太常寺卿，协办江南军务。于是左宗棠率楚军八千人向东援助浙江，在曾国藩的大力推举下，左宗棠又被任为浙江巡抚。

同治二年（1863年），太平军聚集人马在富阳。当时因清军已多次打败太平军，因此许多清军部队都争相建议要乘胜收取被太平军占领的杭州。但左宗棠却不喜欢打攻坚战。于是他率部从金华向严州进军。四月，左宗棠被任命为浙闽总督，兼巡抚事宜。当时，清军大批人染上了病疫，左宗棠也患了疟疾，困乏疲惫，因此他招募了法国的常捷军（洋枪队）协助进攻太平军。七月，清军攻克富阳。第二年三月，李鸿章与左宗棠共同进攻，攻克了嘉兴，接着又攻克了杭州，太平军的守将陈炳文、汪海洋逃走。皇帝得到捷报，下诏给左宗棠加授太子少保衔，赏赐黄马褂。接着，左宗棠又相继攻克常州、江宁、湖州、浙江各地平定，评论军功，左宗棠被封为一等恪靖伯。

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左宗棠进军福建，将太平军逐到了广东。十月，太平军攻占嘉应。左宗棠汇集了闽、浙、江、粤各路人马合围嘉应，十二月，大败太平军，斩俘的将士达七万六千余人。左宗棠也因此被赐予双眼花翎。

同治五年，左宗棠因广东太平军已平，建议裁兵减饷，增加团练的费用。又认为海关开禁，不制造装备船舰器械就不能图谋自强，于是左宗棠在马尾山下创建船厂，举荐沈葆楨主持船厂事务。

这时西北的回族起义，和陕西、甘肃捻军相合，声势浩大。同治六年（1867年）春，左宗棠率一万二千兵士向西进军，计

划用炮车去制服义军的马队，而以马队去对付捻军的步兵。在这场战争中，捻军及回族军几次打败左宗棠，因而他被处以革职的处分。

因为捻军始终在运动中作战，所以左宗棠向朝廷建议一边防守一边主动出击，皇上同意，于是各地军队集结，左宗棠会同淮军、豫军接连打败捻军。张兆愚死后，西捻平息。同治七年，左宗棠又率军大败回军。同治十二年，陕西、甘肃、宁夏的回民起义也被镇压下去，朝廷嘉奖左宗棠，赐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加封一等轻车都尉。左宗棠同时也上章奏请在甘肃开科举考场，设立学政。第二年，左宗棠被晋升为东阁大学士。

二、双防并重 收复新疆

同治十年（1871年），受英、俄两国支持和控制的塞外回族首领帕夏（通译阿古柏），利用清朝鞭长莫及的机会，擅自进入边关，占据了我国新疆喀什噶尔，后来又慢慢侵占了南部的八个城池，又攻占了乌鲁木齐，占领了天山南北。英国人暗中帮助他，想让他另立一个国家，以挟制俄国。这时俄国以回民多次扰乱其边境为由，突然发兵，占领了伊犁，并且扬言要占乌鲁木齐。

光绪元年（1875年），左宗棠平定了关中陇西之后，将要出关，但这时朝中又起了海疆防守的争议。

当时日本侵犯我国台湾，东南海防吃紧。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认为：自清高宗平定新疆以来，每年要花费银两数百万，就像一个无底的漏斗。竭尽天下的财力赡养西北官军，没有剩余的财力来预防不测之需。新疆不收复，对国家元气无伤，有了新疆，对国家只有损失而无收益，应遵照英国

人的建议，准许帕夏自立为国，作为大清的藩国，停止西征，专力于海防。准备出关的部队，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

以湖南巡抚王文韶为代表的塞防派认为：西洋各国，以俄国最大，离中国最近，又最狡猾；目前已经占据了我国伊犁地区，势必长期不还；如不迅速出兵收复，沙俄必将得寸进尺，继续入侵。因此应全力于西征，如西北无恙，其它列强自然不敢挑衅东南。

这时，皇帝还不甘心放弃新疆，但在海防论者的喧嚣声中，又颇感左右为难，举棋不定。于是，密谕陕甘总督兼督办新疆粮饷事宜的左宗棠，不指名地转述了海防、塞防的两地意见，让左宗棠帮助拿意见。当时，无论资历、声望，还是地位、才干，左宗棠都是当时唯一可以同李鸿章相抗衡的人物，他的意见，无疑将对清政府的最后决策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左宗棠在兰州军营接到密谕之后，经过周密筹划，给皇帝上了一道长达五千多字的奏章，他说：“关、陇刚刚平定，不及时规划这些国家的旧有之地，而割弃使他们自立为国，这是给自己留下后患。万一帕夏国不能长存，不是从西面被英国人所合并，即日向北归入俄罗斯的版图。我们的版图无缘无故缩小，边防险要尽皆散失，到那时，防守边疆的士兵不会比现在减少，粮饷费用也一如现在。这不仅无益海防之业，挫伤国威，而且助长叛乱。这是万万不可以的。”军机大臣文祥十分赞赏左宗棠的建议。于是，清政府发布上谕，认为左宗棠所见甚是，决定采纳海防、塞防并重的主张，在加强海防的同时，出兵收复新疆；决定将景廉和袁葆恒调回北京任职，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

务。金顺为副将。

用兵新疆，有兵、饷、粮、运四大困难，因此，左宗棠着手先解决这几大问题。首先是军队的整顿。当时的清政府总以为兵多多益善，左宗棠根据实际情况，依据粮运困难，主张“精兵”。陕甘战事结束时，左宗棠辖有一百八十多营，他汰弱留强，一下裁掉了四十营，以后又作了进一步的裁减。副将金顺原有三十营，进疆之前接统成禄部十七营，进疆后接统景廉部三十四营，共计八十一营，金顺以拥多兵为荣，不愿裁减，左宗棠便奏请清政府，命令他裁掉了四十二营。景廉在新疆时，曾教条地搬用古代“寓兵于农”的政策，搞且耕且战，结果不伦不类，粮食没有生产出来，仗也打不了。左宗棠一接任，立即划分兵农为二，择其精壮者为兵，散其老弱者为农。对于原来驻守新疆各城的清军残部，则令保守现驻城隘，不担负作战任务。另从五十五营老湘军中精选二十五营作为主力，在粮运完成以前，暂在凉州（今甘肃武威）整训，待命出关。这样就提高了战斗力，而且为军饷和粮食的筹备数量提供了依据。

其次是军饷的筹集。用兵新疆，每年需饷约一千万两。但是，由于饷源靠各省、关供应陕甘的协饷、厘金和海关税，各督抚拖欠。因此在光绪元年（1875年），左宗棠只收到二百六十多万两协饷。第二年初，左宗棠在要饷、催饷无效的情况下，申请借外债一千万两，但受到李鸿章和沈葆楨的反对。不得已，左宗棠再次恳请清政府准借四百万两外债以解燃眉之急。清政府体谅左宗棠的难处，决定从户部库存四成洋税项下，一次拨给左宗棠二百万两，令各省、关三个月内合解三百万两，逾期不到，准左宗棠指名弹劾，从重治罪。另外，让左宗棠自己设法借外债五百万两。

左宗棠接到上谕，高兴万分。

在采粮方面，左宗棠开辟了五个粮源：一是河西地区，二是口北地区，即今河套地区、包头、宁夏、呼和浩特等地，三是北疆地区，四是俄商之粮。

在运输方面，左宗棠采取了多种办法。俄粮包给俄商运送，口北粮食包给骆驼商队用直达的方式运送，这两条路的运输，费力不大。最困难、最复杂的是河西一线，不仅要运输几千万斤粮食，还要运输大批的武器、弹药、军装、被服等军用物资。从凉州经甘州（今甘肃张掖）、肃州、安西、哈密、巴里坤到古城，全长三千五百四十里。沿途人烟稀少，道路年久失修。尤其是从安西到哈密的一千多里，茫茫戈壁，砂砾纵横，除马莲井有点水外，没有台站，没有水草。从哈密到巴里坤，中隔天山，山高路险，大车难以翻越。由于多年战乱，牲口、民夫和车辆严重缺乏，购雇两穷。左宗棠从实际出发，规定玉门关内主要采用车运，玉门关外主要采用驼运，在发挥官运（辎重部队）作用的同时，主要雇请民夫运输，关内百斤百里给银四钱，关外加价一钱；具体方式是“节节短运”，分程包干，各运一段，层递衔接，流水而进，此外，还让军队裹粮出关。凡出关部队，除随身背带和车、驼装运一批粮食之外，走一大站后，再腾出车、驼回头再运一批，如此往复而前。经过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左宗棠将大批作战物资运达新疆前敌。

光绪二年（1876年）春，左宗棠奏调擅长办理后勤的刘典抵达兰州，负责陕、甘和新疆的后路事宜；同时，委托是年只有三十三岁的刘锦棠总理行营营务，负责指挥前敌诸军作战。他自己也移大营于肃州，居中坐镇，统筹调度。

依据新疆的敌情和地理条件，左宗棠计划以歼灭阿古柏入侵势力为第一期作战任务，战略部署是“先北路而后南路”，三月，刘锦棠在受命出关时，左宗棠又授以“先迟后速、缓进急战”的八字方针，告诫他务必做到稳扎稳打。

按照先北后南的战略部署，清军出关后，第一个战役是攻占新疆，收复乌鲁木齐至玛纳斯一带，扼全疆总要之处，为南进准备后方基地。

这时，帕夏的主力都在吐鲁番地区，北疆是由投降他的白彦虎、马人得、马明各部防守的，总兵力约有两万人，主力六千余人部署在乌鲁木齐东北的古牧地（今米泉）。

左宗棠确定：由刘锦棠和金顺两部六十四营、三万多人马担负作战任务；刘锦棠和金顺会师后，首先攻占古牧地，撤乌鲁木齐屏障，再攻占乌鲁木齐满、汉各城，如果阿古柏从南路率军来援，则刘、金两部合力猛打数仗；歼灭阿军援兵，为下兵南路大张声势；此后分兵两路：金顺率部西攻昌吉、呼图壁和玛纳斯南北二城，刘锦棠率部在乌鲁木齐地区清剿残匪，准备对付阿军的反扑。

光绪二年（1876年）五月，刘锦棠率军向北翻过天山，迅速攻取了古牧地和乌鲁木齐，金顺西攻，不战而下昌吉、呼图壁和玛纳斯北城，历时仅十多天。白彦虎、马人得率残部南逃，帕夏的援军五千骑兵来援，刚到达坂城，闻败而上。这些进展，比左宗棠预计的顺利得多。

左宗棠闻讯，高兴异常，立即着手部署天山战役，准备分兵攻取天山地区的达坂城、吐鲁番和托克逊，打开进军南疆的门户。计划一上报，清廷也很满意。不料，金顺久攻玛纳斯南城不

克，直到刘锦棠派去十一营老湘军增援，到十月才攻克，这时大雪已经封山，无法南进了。

清军攻占乌鲁木齐后，帕夏（阿古柏）十分惊慌，一面请英国出面调解，一面赶赴托克逊部署防御。英国公使威妥玛于是以代表帕夏“乞降”为词，发动外交攻势，要求清政府停止进军，准许阿古柏为属国，免去朝贡。清廷转询左宗棠，左宗棠断然拒绝，指出英国的阴谋是让阿古柏长期侵占我南疆地区。同时，左宗棠函告刘锦棠，大军南进时，如果帕夏派代表真意求降，可押解肃州大营，如意图缓兵，即将来使遣回。

左宗棠认为，天山战役不同于北疆战役，清军将同阿古柏的主力交战，需要认真对付。为此，他计划：集中刘锦棠、张曜、徐占彪三支部队作战。分兵三路，同时进击。以刘锦棠为北路，从乌鲁木齐出发，由北而南，攻打达坂城，如果得手快，则分兵配合张、徐两军夹攻吐鲁番；以张曜为东路，从哈密出发，由东而西，以徐占彪为东北路，从巴里坤出发，由东北而西南，出木垒河，越天山南下，与张曜在盐池会师后，合兵西攻吐鲁番，如果进展快，则西进配合刘锦棠夹攻达坂城，两城攻克后，三军合攻托克逊。

玛纳斯一战，证明金顺在指挥作战上的无能，恰逢清廷任命他为伊犁将军，于是他的三十九营军队便由左宗棠裁为二十营，担负玛纳斯以西到精河一带的防务。在粮食上，左宗棠大量调集粮草，以备进军之需，同时还赶运了一批军装、被服和新买的后膛枪、炮到达前敌。

南进之前，左宗棠向各部反复叮嘱：“大军所到的地方，不要奸淫掠夺，不要残杀无辜，因为这是吊伐之师，新疆的百姓厌

烦战乱已经很久了，朝廷的仁义之师如及时之雨，现在正要求大家这样做。”这样就争取了南疆人民的配合和支持。

按照左宗棠的部署，光绪三年（1877年）三月，刘锦棠率部一路攻打达坂城，仅用了四天就全歼了守敌，无一漏网，还生擒了爱伊德尔呼里。接着，刘锦棠分兵一部，与张、徐两军同日抵达吐鲁番城下。这时，艾克木汗、白彦虎已经南逃，马人得稍作抵抗后，率部投降。刘锦棠自率一部直捣托克逊，海古拉接战不利，慌忙烧毁存粮和火药，仓皇逃往喀喇沙尔。总计一战歼敌两万余人，救出百姓两万余人。刘锦棠对俘虏全部宽大释放，对百姓作为妥当的安置。爱伊德尔呼里主动写了劝降信给帕夏。左宗棠的战役计划顺利地实现了。至此，南疆八城，门户洞开。

天山战役结束后，刘锦棠建议暂作小停顿。左宗棠认为，只作小停顿，粮运准备还来不及。从吐鲁番到库尔勒一千多里，沿途产粮极少，必须采运足够的粮食才能进军。吐鲁番本是产粮区，可是，存粮已被敌毁，当时青黄不接，新粮还要三个月才能收获。哈密、巴里坤、古城和乌鲁木齐各粮局所储存粮，短时间内运不出来。需要派人到吐鲁番和托克逊设粮局，采运粮草，还需要调运足够的银两随军前进，以备在库车以南随地买粮之用。因此，左宗棠决定，部队暂缓进军，待暑天过去和“秋粮采运足供”之时，再举进兵。

清军的缓进，客观上促进了帕夏（阿古柏）营垒的分化瓦解。当天山战役打响时，帕夏（阿古柏）从喀喇沙尔退到了库尔勒。于光绪三年四月服毒自杀（一说中风而死），他的死，引起了一场内乱的爆发。其子海古拉携其父尸逃向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途中，被其长兄伯克胡里所杀。艾克木汗在库尔勒自称为汗，

进据阿克苏后被伯克胡里打败，逃奔沙俄。原来投降阿古柏（帕夏）的尼牙斯在和阗起兵，进围叶尔羌以策应清军，反叛国投敌的喀什噶尔汉城守备何步云，乘机反正，率军占据喀什噶尔汉城。白彦虎则逃到了开都河西岸。

左宗棠此时想趋势擒住白彦虎，奏章还没上，恰遇库伦大臣上书声言西部边境现在正应议定疆界，而朝中大臣也认为西域征战费用巨大，现在乌鲁木齐、吐鲁番既然已经回复，可以休兵罢战了。左宗棠感叹道：“现在正是有利之时，怎么能作出划边界退缩防守的计策呢？”便上疏据理力争，皇上觉得左宗棠的意见很对。当时俄国正与土耳其作战，金顺请求乘虚袭击伊犁。左宗棠说：“不行，出师没有名正言顺的理由，他们就会抓住口实了。”

根据敌情和地势，左宗棠安排了南疆战役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攻占东四城，控制阿克苏；第二个阶段攻取西四城，收复整个南疆。为了使战役顺利进展，左宗棠组成了三个梯队：以刘锦棠部三十一营为主战之军，组成一线兵团，首先出发攻敌；以张曜部十六营为且战且防之军，组成一线兵团，稍后出发，接防已克之城，清剿残敌，防敌回窜，徐占彪一军在天山战役中曾勒索敌财，破坏军纪，左宗棠觉得徐占彪“不明事理，不受教益”，便将其撤回巴里坤、古城一带驻防。另调易开俊部七营安远军为防军，组成三线兵团，在张曜之后出发，填防阿克苏以东各城。战役发起的具体时间，授权刘锦棠决定。

八月，清军粮运准备完毕，先遣部队控制了托克逊至曲惠一线。刘锦棠不失时机地发起了南疆战役。由于白彦虎一触即逃，刘锦棠机动灵活，断然率精锐步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月驰驱三千里，在维族人民的支持和协助下，一举收复了东四城。

在此之际，英国又向清政府交涉，要求清政府准许伯克胡里在西四城“立国”，作为属国，每年入贡。驻英公使郭嵩焘和李鸿章鼓动清政府批准这一要求，清廷将情况通报左宗棠，左宗棠怒不可遏，立即上奏痛斥李鸿章之流的主张，同时命令刘锦棠一意进军，如遇外国人交涉，请其到肃州大营说话。

十一月，刘锦棠得知尼牙斯和何步云反正的消息，不待张曜一军到达阿克苏接防，便分兵三路，于年底收复了西四城。除伯克胡里和白彦虎各率一部、分道投奔沙俄而漏网之外，余敌全部被歼。阿古柏的侵略势力终于被消灭了。沦陷十多年的天山南北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左宗棠向朝廷报捷，皇上下诏晋升左宗棠为二等侯。布鲁特十四部争相归附清朝。

三、决之战阵 收复伊犁

伊犁地区被沙俄强占之后，虽经清政府几次交涉，均无结果。但沙俄政府曾许下过诺言：只要清政府能够保证新疆地区的安定秩序，就交还伊犁。沙俄原以为中国无力收复新疆南北，只不过借此诺言敷衍搪塞罢了。待左宗棠收复南疆之后，清政府于光绪四年（1878年）特派前驻法钦差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谈判归还伊犁问题。光绪五年八月（1879年10月2日），崇厚在沙俄的威胁、愚弄之下，于克里米亚半岛的里瓦几亚擅自与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此约规定中国仅收回伊犁孤城一座，伊犁西面的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南面的特克斯河流域和塔尔巴哈台地区的斋桑湖以东土地皆为沙俄所有，沙俄可在蒙古及新疆全境免税进行贸易；中国还要赔偿俄军占领费止埥万卢布（折合白银二百八十万两）等十

八条不平等条款。消息传出，举国民愤沸腾。左宗棠上疏说：“从俄国占据伊犁以来，蚕食侵占没有止日，新疆已有每日缩地百里的势头。俄国把伊犁看成自己的外府，等到我们要讨回土地，他们就索要赔款卢布五百万元。这样俄国归还伊犁，对俄国而言没有丝毫损伤，而我们得回伊犁，只不过是一片荒野郊原。现在崇厚又提出给俄国额尔果斯河和帖克斯河，这就是把伊犁西南的土地划归给俄国啊！哪里有还没开仗，就先割地求和的道理呢？现在我们尚一箭未发，如果要割地，这是万万不可的！另外，俄国的商人想要贸易，俄国政府也想深入我国，广设领事馆，这也决不能答应。俄国人心早藏有野心，对我国虎视眈眈，他们总以为我大清已厌倦了用兵，因此想借此来牵制我们，强占我疆土。臣以为，为今之计，应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后决之以战阵，坚忍求胜。臣虽已年老，但我仍旧可以为国上阵。”皇上非常高兴，嘉奖了他。把崇厚治罪，然后命曾纪泽再去谈判。

光绪六年（1880年）清政府改派前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出使沙俄改约。沙俄为向清廷施加压力，派出一支约有二十三艘舰船的分舰队，在中国黄海海面示威，同时增兵伊犁。清政府为应付沙俄的武装挑衅，也在中俄边界的沿海地区采取了防御措施，并命左宗棠准备收复伊犁。

左宗棠接到命令后，于是年四月，抬着棺材从肃州出发，以示决一死战。五月到达哈密，计划分兵三路收复伊犁：金顺出精河为东路，严防俄军窜犯北疆；刘锦棠出乌什为西路，越过天山，直指伊犁西南，切断俄军增援；张曜出阿克苏为中路，沿特克斯河指向伊犁以南；派谭上连等分屯于喀什噶尔、阿克苏、哈密，为后路声援。准备参战的马、步卒约六万人。

是年六月，曾纪泽赴俄。此事正值俄土战争结束不久，沙俄已经精疲力竭，中国也已做好了充分的军事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沙俄被迫于 1881 年 2 月 24 日在圣彼得堡改订归还伊犁条约。这次改订中俄伊犁条约，中国虽然争回了以前划失的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一万九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但仍划失了霍尔果斯河以西和北疆斋桑湖以东地区，并将赔偿俄军占领费增为九百万卢布（折合白银 500 万两）。通过这一条约和 1882 年至 1884 年签订的《伊犁界约》等五个子约，沙俄共侵占我国七万余平方公里领土。

光绪七年（1881 年）正月，左宗棠奉诏入京，被命管理兵部的事务。二月，左宗棠奏请教练旗兵，兴修水利。七月，因病请告假还乡，皇上一再挽留。九月，左宗棠被授为两江总督，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

左宗棠因功高，在入紫禁城时诏谕可骑马，上殿由两名侍卫搀扶。当时，京城内外纷纷传言，左宗棠是决不容许洋教堂的高楼可俯瞰宫中，他一来，教堂就得被拆毁。为避闲言，左宗棠只能出来安民。

光绪九年，法军入侵越南，左宗棠自请赴云南督师。写信叫旧部下王德榜在那里招募军队，号恪靖定边军，法国不久就谈和了。左宗棠就没去云南。第二年，左宗棠奉命去福建，命王鑫准备渡海去增援台湾，名曰恪靖援台军，王鑫刚到台南，就与法军遭遇，正好王德榜在越南会同其它各军大败法军于谅山。法国再度求和。左宗棠也因病引退。

光绪十年（1885 年）七月，左宗棠病逝于福州，时年七十三岁。皇上追赠太傅，谥号文襄。在京城昭忠祠贤良祠设祭，

并专门在湖南和他立功的各省建祠纪念。

左宗棠为人足智多谋，但也有些偏激，穆宗曾告诫过他。当时满朝文武多出自曾国藩的门下，曾国藩与左宗棠时合时不合，但左宗棠是唯一在朝廷中能与曾国藩抗衡的人。左宗棠在外交中很有谋略，词锋锐利，很多人都依附于他的门下，但他门下成材出名的人却远不及曾国藩。他著有《左文襄公全集》。

冯子才

冯子才（1818～1903 年），字南干，号萃亭（一作翠亭），广西钦州（原属广东，今广西钦县）人，行伍出身。清朝爱国名将。

一、气高于山 剑斩楼兰

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老将冯子才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以近七十岁的高龄，驰骋疆场，奋勇杀敌，打得法国侵略者丢盔弃甲，狼狈逃窜，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早在十八世纪末，法国侵略者已开始侵占越南，除企图变越南为它的殖民地外，还妄想以越南为跳板，将其魔爪伸向我国的广西、云南等地。为了中越两国人民的友好和根本利益，中国人民积极支持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于是，法国在 1884 年（光绪十年）6 月，公然对我国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奋

勇抗击。但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采取妥协政策，进一步助长了法国侵略者的扩张野心。

1885年（光绪十一年）2月，法国侵略者大举进攻中国的南大门镇南关（今友谊关）。当时，广西巡抚、清军前线统帅潘鼎新，积极执行李鸿章的投降政策，法军进攻，他不但不予抵抗，反而私自弃军逃命，引起全军溃退，使镇南关当日即落入敌手。法军入关后，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并张贴出“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的标语，气焰十分嚣张。此时，广西危在旦夕，在全国军民一致要求抗击法军的压力下，清政府迫不得已起用了在军队中任职四十多年、深孚众望的退休爱国老将冯子材，任命他为广西军务帮办，负责组军戍边，抗击法军的入侵。

冯子材早年参加过广东天地会起义，1851年（咸丰元年）参加清军，曾随向荣、张国栋镇压过太平军，从兵卒逐步擢升至提督。1862年（同治元年）任广西提督，1875年（光绪元年）调任贵州提督，1881年（光绪七年）回任广西。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冯子材亲身体会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三元里等地人民群众反侵略、反投降的斗争，使他倍受鼓舞。他竭力主张保卫疆土，抵御外敌，却遭到清政府中投降派的排斥和打击。一气之下，年已六十五岁的冯子材于1883年（光绪九年）“称疾”归田，回到原籍钦州。1884年，法军进犯我滇、桂两省边境时，他为国担忧，又任广东高、雷、钦、廉四府团练督办，率部抗击法军。次年2月，经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准，冯子材毅然承命于危难之时，出任广西军务帮办。他立即召旧部，募新兵，扩编部队，赶赴前线。出征前，冯子材对家人说：“万一军有不利，百粤非复我有，亟率我眷属，奉香火持归南江祖籍，

永为中国人，免奴外族也。”并带了两个儿子同行，准备将自己的尸体运回家乡，以此来表达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

二、整军设垒 以守为攻

冯子材抵达前线后，面对民心不定、军纪涣散、指挥混乱的局面，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首先是教育军队，约法三章，不准欺压百姓，要处处关心群众利益，使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军队抗法作战。其次是整顿溃散之军和扩编新军，加紧军事训练，努力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再是把湘、淮、粤、桂各支军队的指挥关系统一起来，组建作战指挥中心。冯子材虽已年近七十高龄，仍受诸将推举，就任抗法前线统帅。他以自己多年的作战经验，提出积极防御、“保关克谅”（即坚守镇南关，趁机攻克谅山）的方针，极大地鼓舞了全体军民的战斗士气，很快出现了一个团结无间、积极准备反攻的新局面。前线军民的誓言是“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迫于中国军民的强大声势，法国侵略军烧掉镇南关，近退镇南关外三十里的文渊城。

随后，冯子材会同王孝琪、王德榜、苏元春诸将到镇南关前视察地形。鉴于镇南关已被法军烧毁，他们决定选择距镇南关十里的关前隘作为决战的战场。关前隘两侧都是崇山峻岭，中间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战场选定后，冯子材组织军民在隘口处突击修筑起一道三里半长的高墙，横跨东西两岭，墙外还挖了一条很深的壕沟，以利坚守。此外，又在东西两岭的山顶上构筑了炮台，以便居高临下，打击来犯之敌。

在军事部署上，冯子材着眼于以守为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根据敌我态势，组成了严密的纵深防御体系。他主动承担了

艰巨的正面作战任务，率所部扼守长墙和山头要塞。派王孝琪率其所部驻守山后半里的地方，与防御正面形成犄角之势，随时增援扼守正面的中陆军。派苏元春、陈嘉率其所部驻隘后五里幕府处；蒋宗汉、方友升率其所部驻守距关前隘以北三十五里的凭祥，作为战略预备队。派王德榜率其所部驻距关前隘以东三十里的油隘，以防法军从侧背绕道入关，并准备随时抄袭来犯之敌的后路。派魏刚率其所部驻距关前隘以西一百里的艾瓦，防止法军偷袭关西一百三十里的茆封，确保镇南关后路的安全。

与冯子材加紧布防的同时，法军也在调兵遣将，准备大举进攻。法军得知镇南关防守森严，正面进攻难以取胜，就准备偷袭茆封，企图绕过镇南关，夺取龙州，从北面包围镇南关守军。冯子材得到越南人民的密报后，针对敌人的诡计，急调魏刚军秘密进驻茆封，又派一支部队埋伏在敌人必经之地，待敌败退时，再予以痛击。3月13日，法军果然进犯茆封，当即遭到魏刚军迎头痛击。敌被迫后撤，又遭到冯子材伏兵一阵猛杀。法军伤亡惨重，狼狈败逃。

这一仗的巨大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军民战胜法国侵略军的信心。

三、以静制动 以动制动

在抗击法军的战斗中，冯子材不是进行“守株待兔”式的防御战。他在战术运用上灵活机动，善于变化，有时以守为攻，以静制动，有时守中有攻，以动制动。不论怎样变化，皆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

法军偷袭茆封失败，司令尼格里恼羞成怒，扬言要在3月

24、25 两日向镇南关发动总攻，与冯子材进行决战。根据以往法军的活动规律，冯子材敏锐地识破这是敌人的阴谋，他估计敌人可能要提前发起进攻。为了打乱敌人的战斗部署，冯子材决定采取两手：一面督令部队加强防守，一面抽调一部兵马主动出击，先发制人，击敌于措手不及之中。3月21日晚，冯子材和王孝琪率军出关，袭击法军前哨据点文渊城，一度冲进了文渊城街心，敌军三座山头炮台被毁坏两座，激战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傍晚。这次出其不意的主动出击，打乱了敌人的如意算盘，法军慌忙于2月23日凌晨，发起了进攻。

法军兵分三路，配属三支炮队，向我东、西岭和关前隘长墙同时发动强攻。他们发现东岭五座炮台是仓促修成的，不够坚固，便在开花大炮的掩护下，凶猛地进行分析，五座炮台被攻占了三座。这时，法军利用东岭炮台，居高临下，掩护其主力向关前隘长墙猛扑。冯子材披挂佩剑，振臂对将士们说：“法再入关，有何面目见粤民？何以生为！”在他的爱国热忱激励下，将士们誓与长墙共存亡，个个奋勇杀敌。恰在此时，从法军背后杀出一支清军，牵制了正面进攻关前隘长墙的敌人。原来，这是王孝琪在反击进攻西岭之敌的同时，派出的一支部队。他们从小路迂回到敌人背后，解了关前隘之危。傍晚，苏元春也从幕府赶到，登上东岭，巩固了尚未被敌夺去的两座炮台，与敌展开了拉锯战。这一天，驻在油隘的王德榜军按照预定计划，穿插到法军的老巢文渊，切断了敌人的补给线，使敌顿陷困境。入夜后，法军被迫停止进攻，冯子材预计到第二天将会有一场更大的恶战，便抓紧时间整顿军队，抢修工事，并派出三百名敢死队员，趁夜暗越出长墙，潜伏在长墙外的沟渠杂草丛中，待机歼敌。

3月24日，法军仍分三路进攻，每路约两千余人。他们还是在开花大炮的掩护下，以主力猛扑中路长墙。激战中，法军利用被炮火轰塌的缺口冲上了长墙。冯子材手持长矛，一声大呼，跃身出墙。他的两个儿子相华、相荣紧紧跟在冯子才身后一同冲进敌阵。主帅的行动是无声的命令，全军群情激奋，潜伏的三百名勇士突然跃起，在敌群中拼杀；守墙的士兵也大开栅门，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人冲去。两军短兵相接，展开了肉搏战，一时间，“肉雨扑征衣”，“血花飞满面”，杀得敌人尸横遍野。法军“被杀急，则投枪降，去帽为叩首状，以手挥颈”，十分狼狽。

与此同时，东岭也发生了激烈的争夺战。为夺回被法军占领的三座炮台，清军七上七下，不少将士受伤不下火线。王孝琪军击败西路法军，由西岭包抄敌后；王德榜部消灭敌人运输队后，也从关外赶来夹击东岭的敌人。清军齐心协力，一举夺回被敌占领的东岭三座炮台，以此为转机，清军逐渐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清军援兵从四面八方涌来，一千多名越南义勇军也奋勇投入了战斗。经两天激战，法军增援被截，弹尽粮绝，战不能胜，退不能脱，被清军重重包围。

25日，冯子材命令全军发起总攻，与敌进行最后决战。对这次决战，有一个法国侵略者在事后是这样描述的：“中国军的号筒愤怒地响起前进的命令。从所有的堡垒，从所有的天边各处，像烟云一般的中国军队，展开旗帜跑来，发出同时把枪炮的音响都遮断的喊杀声。他们因成功而胆力加大，奋力狂怒地向我军驰突前来。如果战斗不立时中止，惨祸怕就要来临了。”在清军和越南义勇军的沉重打击下，法军全面溃败，法军司令尼格里几乎丧命，“毙伤法寇二千，擒斩数百，内有军官数十”，只有少

数敌人夺路逃至文渊城。

四、敌退我进 挥泪班师

镇南关战役，使法军已成惊弓之鸟，冯子材决定，乘胜率军挥戈南下，跟踪追击，帮助越南人民收复谅山等失地。

冯子材和王孝琪、苏元春、王德榜等将率部进军。一路上，人不解甲马不下鞍，在越南人民的支持下，攻关斩将，取得节节胜利。26日，攻克文渊。29日，攻克军事重镇谅山，重伤法军司令尼格里。31日，又收复谷松和屯梅，接着猛向郎甲、船头进军，准备攻打北宁。清军进攻势如破竹，法军和被法军裹胁的越南伪军，已土崩瓦解。

越南人民由于痛恨法国侵略者，皆纷纷和冯子材联络。越南北宁总督黄延金集合各地义民，组织忠义五大团，共两万余人，都打着冯子材的旗号。河内、太原等地人民也揭竿而起，反抗法军。他们为清军筹措粮食，担任向导，或直接参加作战。

此时，西线的滇军、黑旗军和越南人民义勇军，在临洮大败法军，接连攻克了越南几十个州县。中路的唐景崧部，和越南人民联合攻下了太原。趁此大好形势，冯子材即约黑旗军进攻北宁、河内两省，准备一鼓作气把法国侵略军赶出越南。

中越人民抗法斗争的伟大胜利，迫使法国茹费理内阁下台，将法军驱逐出越南已势在必成。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英、美、俄等国的讹诈，清政府不但与法国政府很快签订了《巴黎停战协定》，宣布停战，而且于6月9日又在天津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法新约》。结果，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

停战命令传到前线，全军将士无不愤慨。冯子材急告广西巡

抚张之洞：“去岁上谕‘议和者诛’，请上折诛议和之人，士气可奋，法可除，后患可免。”张之洞三次秉奏，请求暂缓撤兵，清政府“严不准”。前线将士气得“拔剑斫地，恨恨连声”。

冯子材挥泪班师回国，沿途“越民挽辔乞留，痛哭不舍，随之入境者甚多。”他踏入祖国故土时，受到边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龙州“商民香灯、爆竹欢迎者，三十里不绝”。

中法战争后，冯子材相继调任云南、贵州提督等职。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因病去职，第二年7月病逝。

李秀成

李秀成（1823～1864年），广西藤县人，太平天国忠王。

1860年盛夏的一天凌晨，上海城外青浦一带枪炮齐鸣，杀声震天。英雄的太平军战士正在与美国流氓华尔组织的“洋枪队”激烈交战。这是太平天国第一次在战场上与帝国主义者较量。“洋枪队”依仗武器优势向太平军阵地猛扑。太平军不畏强暴，奋勇反击，终于把“洋枪队”打个落花流水。这一仗共歼灭洋枪队六、七百人，缴获洋枪二千余支，大炮十多门，华尔身中五伤，仓惶逃命。“青浦之战”的指挥者，就是太平天国杰出领导人忠王李秀成。

一、出身贫寒 身担大任

李秀成出生于一个雇农家庭。八岁开始随舅父读过两年书，后因家贫，不得不辍学回家，帮工务农。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农民头上除了封建主义这座大山外，又加上外国侵略者这座大山，更加压得透不过气来。李秀成一家终年劳累，仍然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他盼望着苦难生活的结束，盼望无灾无难，人人平等的美妙的“天堂”的到来。当他得知洪秀全等人创办的拜上帝会要在人间建设“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小天堂”时，立刻与全家人一起参加了拜上帝会。1851年9月，太平军路过藤县，他又率全家参加了起义军。

李秀成开始为太平军一名普通战士。他作战勇敢，又渐渐显露出军事才能，攻占南京后，担任右四军帅，带领一万名新兵驻守在太平门外。不久随石达开去安庆安民，镇守庐州。他与活动在江淮的另一支农民起义军捻军建立联系，说服捻军领袖张洛行接受太平天国领导，壮大了革命的力量。

正当革命顺利发展之时，天京城发生令人痛心的内讧，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相继被杀，翼王石达开也负气出走。翼王是李秀成的直接领导，翼王出走时要求李秀成同行。李秀成对石达开的文韬武略十分佩服，但是他顾全大局，不同意出走。1857年底，天王封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主持军务，陈、李成为太平国后期两根顶天支柱。此后陈玉成主要在上游作战，李秀成则活动于天京周围及江浙一带，在东南富庶地区建立根据地，支持和拱卫天京。

李秀成是一位忠诚的战士。1859年他驻守天京对岸浦口

时，陈玉成先封为英王，李秀成尚未受封。他自己处之泰然，部下却议论纷纷。叛徒李昭寿乘机挑拨离间，来信劝降。不料此事为天王知道，产生怀疑，下令封锁江面，断绝交通，防止李秀成叛变。李秀成内为天王所怀疑，外受敌人威逼，但是他立场坚定，不为所动，继续与来犯的清军作战。如此十多天，天王终于受到感动，亲自在一块黄缎子上书写“万古忠义”四字，赐给李秀成，封他为忠王。

受封以后，李秀成更加积极地为革命奋斗。1860年初，重新建立的“江南大营”在钦差大臣和春的指挥下，在天京周围修筑一百多座营垒，还挖了一条一百多里长的工事，号称“万里长壕”，把天京城团团包围起来。李秀成仔细分析敌情，决定不与敌人在天京决战。他率领精锐自芜湖出发，昼夜行军，突然于3月19日攻克杭州。和春见后方失守，大惊失色，急忙抽调“江南大营”清兵一万多人救援杭州。李秀成探知和春中计，立刻放弃杭州，退至安徽，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分五路进击“江南大营”。和春毫无准备，从梦中惊醒，仓惶披衣上马，狼狈逃跑。李秀成指挥大军内外夹攻，踏破敌营五十余座，彻底摧毁“江南大营”。

再破“江南大营”后，李秀成乘胜前进，挥军东向，十几天内连克常州、无锡、苏州等重镇，解放苏南等大片土地，最后以苏州为中心，建立太平天国苏福省。1861年底，李秀成率军再克杭州，又在浙江开拓大片疆土，与苏福省连成一片，形成一个地域广大的根据地。

二、天国支柱 万古忠义

在建设江浙根据地的过程中，李秀成还与帝国主义干涉者

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攻克苏州不久，李秀成率军继续东进，攻占昆山、嘉兴、青浦、松江等地，直逼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基地——上海。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歪曲《南京条约》有关条款，在上海建立大片租界。英法侵略者俨然以主人自居，威胁太平军“勿攻上海，否则还击。”此时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正在京津一带与英法联军作战。但是上海的清朝官吏却“忘记”了英法是敌国，居然无耻地向敌人请求援助。1860年6月，清政府苏松太道吴煦和买办杨坊出钱，由美国流氓华尔出面招募了一批外国的亡命之徒组成“洋枪队”，专门与太平军为敌。7月，华尔率“洋枪队”偷袭太平军占领的松江，接着又在一万名清军的配合下，进犯驻守青浦的太平军。李秀成在青浦大败“洋枪队”之后，乘胜进逼上海城下。英法联军公然协助清军作战，用山炮、来福枪猛烈扫射太平军，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英国军舰也炮击太平军阵地。太平军义愤填膺，奋起反击，与英法干涉军激战四天。因后方告急，不得不退离上海。

1862年1月，李秀成乘攻克杭州的余威，再次进攻上海。太平军从四面八方抵达上海郊区后，李秀成发布文告，严正警告外国侵略者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如敢继续助清军为遂，那就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但是这时帝国主义已通过《北京条约》从清政府手里取得更多的殖民特权，它们蓄意加紧勾结清政府，与太平军为敌。帝国主义强盗一面从天津调来英法联军一千多人，一面把“洋枪队”大大扩充，改编为“常胜军”，同时还用军舰把李鸿章的淮军从安庆运到上海。中外反动派互相勾结，向太平军阵地疯狂反扑，相继侵占嘉定、青浦，向太仓进犯。李秀成立刻从苏州集中一万多名精兵赶到太仓，迎头痛击敌人。经过两天

激战，太平军连破敌营三十多座，歼灭外国侵略军几百人，清军五千人，俘获洋枪大炮不计其数。李秀成堂弟侍王李世贤在南桥击毙法国干涉军司令、海军上将卜罗德。接着李秀成穷追猛打，收复嘉定，又在青浦全歼“常胜军”一个团，活捉“常胜军”二号头目法尔思德。“常胜军”残余被紧紧包围在松江城内，惶惶不可终日。正在这时，凶恶的湘军由曾国藩弟弟曾国荃率领，自安庆顺江而下，包围天京。天王一天连下三道诏书，命李秀成赶快回师救援。李秀成不得不再次放弃对上海的进攻。攻占上海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是太平军在上海外围狠狠教训了外国侵略者，显示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力量和决心。

安庆失守，英王牺牲后，太平天国已进入极困难的阶段。“大厦将倾兮，一木难支”。但李秀成在极艰难的环境下，独立支持，顽强奋斗，使革命又坚持了两三年。

撤离上海后，李秀成在苏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太平军三十万人，兵分三路救援天京。10月13日，他亲自率主力向湘军盘踞的雨花台发动进攻。在长达四十多天的战斗中，太平军轮番作战，昼夜猛攻，打得湘军恐惶万状、胆破心惊。

太平军虽然勇敢顽强，但在整个战场上毕竟处于劣势。此时外援断绝，既无粮食，又无棉衣，不得不下令撤退。不久，苏州也在中外反动派联合进攻下失守，天京两面受敌，粮食断绝，形势极为险恶。李秀成不愧为“忠王”，他不顾别人劝阻，毅然回到天京，指挥太平军同敌人浴血奋战。1864年7月19日，天京终于失守。李秀成保护幼天王突围，他把自己的战马让给幼天王，自己不幸于天京东南方山被捕。1864年7月在南京被杀，终年四十二岁。

张树声

张树声（1824～1884年），字振轩，安徽合肥人，清朝著名抗法爱国将领。

一、少负志节 通达开明

张树声从小就有志向，读书好深沉思索，特别专心于经世之学。经科举，为廪生。1853年，同其弟树珊、树屏倡练乡团，与刘铭传等团练相呼应，镇压太平军和捻军。1861年，两江总督曾国藩令李鸿章招募淮军增援上海。李鸿章筹建淮军，张树声对于创建淮军起过重要作用。时人称：“淮军之兴，实树声为之倡也。”他先后出任：署理两江总督，兼署办理南洋通商事务大臣，江苏巡抚，贵州巡抚，广西巡抚，直至两广总督。他在仕途上平步青云，成为淮系军阀官僚集团中地位仅次于李鸿章而为清廷所倚重的地方大员。

张树声又是地主阶级中一位较少保守思想、通达时务的开明人物。他的著作《张靖达公奏议》、《张靖达公杂著》、《张树声来往函牍》等，不仅记叙了他在各个时期的活动，还反映了他的社会政治思想。许多洋务派在学习西方时，都是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弃而不取。张树声在《遗折》中则大胆地提出，“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他解释西方的体与用：“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即使铁舰成行，

铁路四达，也终难救国；必须改革封建制度，实行君主立宪政治。作为清廷大吏能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提出这样的主张，是破天荒的，的确要有一点精神和勇气。

二、加强边防 心驰疆场

中法战争之前，祖国的南疆已是警报频传。法国殖民者在中国的邻邦越南，鲸吞蚕食，像一股黑潮向越南北部与中国南部边疆漫来。

1897年，张树声奉旨调往广西巡抚，同年授两广总督。这位富于爱国精神的清朝大员，开始走上捍卫祖国南部边疆的前线。

清朝政治从上到下，久已败坏，两广地区甚于他省。“二十年来治粤者习为宽弛，纪纲淆紊，庶事堕废，吏疵军敝，胶固难理。”张树声到任，以身作则，用心整军理财，革除地方恶劣习俗。当时，“广东赌风甲天下，尤其是葡萄牙殖民者在澳门大开赌场，引诱内地人们行赌。这不仅使广东财困民贫，也使社会风气日趋败坏。张树声三次奏请严禁，以“塞漏卮”，“除隐患”。经他一番苦心经营，广东“风气翕然一变”。这些努力，对于加强边防、巩固边疆有着积极的意义。

法国在越南的活动及其野心所在，张树声是很清楚的。为了防御法国的北侵，他派记名提督黄桂兰率军在越南谅山、高平等省择要驻防。

这期间，张树声有过一段荣耀的插曲。1882年3月，直隶总督李鸿章丧母归葬，张树声奉旨往天津署理直隶总督兼署北洋大臣。这年7月23日，朝鲜发生“壬午政变”。日本借机出兵，

企图一举吞并朝鲜。为保护朝鲜和稳固中国东北边疆，张树声当机立断，从速出派统领北洋水师记名提督丁汝昌率三艘兵轮先行去朝鲜，继而派遣驻防登州的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统三千大兵横海而东，乘夜色直插朝鲜王京，俘策划政变的大院君李昱应，解往保定，朝鲜政局稳定下来。日本兵轮晚一天到达海口，见清军阵容齐整，内乱平定，相顾愕然。清廷为了嘉奖张树声，赏太子少保銜。

1883年，南方边警告急。7月中旬，张树声奉命回两广总督本任，筹办两广防务。

“越南危急存亡之际，实中国安危利害之机。”张树声对法国侵略越南，并将危及中国，忧心忡忡。建议朝廷坚持定见，勿喜于小胜，勿怵于小挫，沉舟破釜，以抗战去赢得局势转机，不能再委曲求全，任法国侵略者横行。爱国者刘永福率黑旗军助越苦战，而清政府唯恐激怒法国，不敢公开援助黑旗军。张树声则认为，应理直气壮地支持刘永福，支持越南。

张树声一回到广东，就亲自视察海防，发现“兵饷俱缺，炮台枪炮水雷一切备御之具荡焉无有”。好在他南下时，在天津购买了一批哈乞开司、毛瑟等枪支及克虏伯过山炮，并带来江南旧部提督吴宏洛所辖五营淮军。但是兵力财力还是不足以应付日益紧张的时局。

在重重困难的情况下，张树声部署战守十分认真。他派吴宏洛驻扎长洲，扼险而守，并筑新式炮台于虎门、长洲、鱼珠、沙路，又募兵训练，分布要害，从外国订购克虏伯大炮二十余尊，毛瑟枪数千支及水雷炸药等。建议设广州至龙州电线，以通消息；布设水雷于各港口，以阻截法军兵轮。他不赞同“恶谈西

学”的会办广东防务大臣彭玉麟不切实际的蛮干。张树声曾两次奏请要求亲自赴越督战，被清政府拒绝。

广东，与外国交涉事务繁多，涉及洋人的案件日多一日。那些在中国土地上威风张扬、肆意横行的洋人，根本不把弱国的官员百姓放在眼里。张树声自称，每办一案，往往苦思力索，期于上尊国体，下顺民心。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清政府对外是妥协软弱的，张树声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除了要维护中国的权益，同时也要镇压人民的反抗，完全顺乎民心也是做不到的。

1883年9月，由于英人在广州先后两次惨杀无辜的中国百姓，激起人民群众的英勇反抗。愤怒的群众冲进洋人居住的沙面，放火烧了英美德法各国洋房。人民群众的暴力行动，是张树声不能容忍的。他立即派兵前去弹压，将群众驱散。当然，在“沙面事件”的交涉中，他还是站在了民族立场上，与外国领事据理力争。他对外国法庭判决杀害中国人的凶手罗根为“错误杀人”至为不满，指出这样的判决不能不激怒群众，是外国法庭的官吏庇护凶手，而视中国人的生命如草芥，并将给外国领事的照会公诸报端，表示强烈的抗议。外国领事为张树声激切的言辞所震惊。

军事、政务、对外交涉等各项事务，张树声都要亲自筹划办理，黎明即起，日暮不辍，时常批阅公牒至深夜。过度的操劳，使他染病渐深，数次咯血。张树声自请开两个总督缺，专治军事。1884年5月奉上谕获准，令山西巡抚张之洞接任两广总督。

张树声交御后，亲驻黄埔行营。冒炎暑，沐海风，登山涉海，各处勘察。督率所部各营，加紧训练，演习布放水雷，设靶操练大炮，务求准确轰击目标，虽是病重体衰，仍怀报国之志，表示：

如有警报，但使一息尚存，未填沟壑，誓不与贼俱生，即当舆疾前驱，率先将士，式遏寇氛！”

张树声身在病室，心驰疆场，念念不忘防务部署，死神在走近，生命之火就要燃尽的时刻，他还在喊着：“开炮！”而“无一语及私”。经医疗无效，1884年10月死于广州。张之洞等守护在张树声的病榻前，注视着这位生命垂危仍不忘保卫边疆的爱国将领，不由潸然泪下。张之洞等在奏折中慨叹：“时事方艰，一时封疆旧臣如树声之文武兼资、通达中外机要者已不多有……不独臣等痛失同志之助，犹不能不为国家惜此人也。”

张树声是地主阶级开明派代表人物，他虽然毫不例外地敌视、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但是，他反抗外敌的爱国精神和为国家复兴而勇于改革的魄力却有殁于后人。

石达开

石达开（1831～1863年），广西贵县人，太平天国翼王，著名将领。

石达开生于殷实人家，却投身农民起义的队伍；他勇猛能战，人称“石敢当”，同时又胸有韬略，不乏文采，号为“石相公”；他毕生忠于“天国”事业，最后却凄然败于远离天京的蜀道之上。所有这些都给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广为咏叹，绵延不绝于

后世。

一、少尚正武 起义封王

石达开的祖父、父亲都出身贫寒，但到石达开出生时，家里已渐渐地富裕起来，但家人也还都保留着亲身劳作的习惯。这样一种特定的家庭环境对于养成石达开后来的性情有很大关系。少年时代，他做过农活，也曾读书，但对于八股考试、功名利禄却不怎样上心，平时倒爱看些被视为不伦之类的杂书。他非常喜爱《孙子兵法》，大概有点尚武气概。稍大之后，他又曾走出小村，到集市经商，贩卖牲畜、木炭、竹子等等。这样闯荡了一阵之后，见多识广，心胸也就渐渐地开阔起来，结识了不少江湖上的“英雄好汉”，彼此畅诉衷曲，相见恨晚，再加上他颇通文墨，头脑灵活，能够为人排解纷难，救人之急，还曾组织众人与霸道人物斗争，这个富于正气、性格豪爽的年轻人的名声越来越响，俨然成为当地引人注目的角色。

虎在山上行，龙自潭中生。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农民斗争此伏彼起，为石达开这样人物提供了施展抱负的用武之地。民族饱受屈辱，百姓各尝艰辛，一些有志之士开始探索救世之道。广东贫寒书生洪秀全以及冯云山立志削尽天下不平。1844年，他们沿途说教，来到石达开的家乡。他们在当地听说石达开为人热心、正直，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就主动前去拜访。他们晤谈几次，便觉得志同道合，决心同心协力，共图大业。他们很快建立和扩大了起义组织——“拜上帝会”，发动贫苦百姓，与不公正的社会现实做斗争。由于石达开在当地的威望很高，在起义的准备工作中起了突出的作用。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

之后，石达开被封为左军主将，后来又被封为翼王，取“羽翼朝廷”之意，成为太平天国的六个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太平军由南向北的推进过程中，石达开过关斩将，攻占武昌之后，率军顺江而下，浩浩荡荡，直逼南京。在他的亲自督战下，干净利落地占领了这座六朝古都，为太平天国设京于此立下了汗马功劳。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后，石达开在革命事业中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他承担了许多政务工作，同时负责南京城的防卫。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当时太平军势力集中于长江上下，而南北方向上则受清军重压，南京城里实行了一整套战时政策，石达开都与闻其事。

二、才略超人 视死如归

1854年，农民义军的死对头曾国藩在湖南起兵，率领他亲自组建的湘军一路杀来，穷凶极恶，迫使太平军放弃两湖，退守江西；敌军水师顺江而下，抵达江西湖口，天京政权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紧要关头，石达开受命出征，抗击凶焰万丈的强敌。经过一番恶战，敌军仍然冲过了湖口关卡，打通了长江进入鄱阳湖的水上道路。这时，石达开表现出作为一个优秀将领所特有的智谋和胆略。他毅然决定让开通道，诱敌深入。不出所料，狂妄的湘军头脑发热，把一百二十余艘轻便战船全部开进内湖，只把笨重的巨型战舰停在外江。石达开抓住时机，果断地命令抢堵湖口水卡，把敌军水师一分为二。当天夜里，太平军对停在外江的敌军展开火攻，数十只轻便小艇像箭一样射向敌人船队，烈焰奔突，杀声震天，笨重的敌船运转不灵，又无轻便舰只保护，完全失去了还手之力，敌军只好丢下被烧毁的几十只战船，仓惶逃

命。被封锁在鄱阳湖内的敌军只能隔岸观火，望火兴叹，在此后两三年内，凄伤地游荡在江西内河里。石达开率领太平军乘胜追击，第三次攻占武昌，解除了天京上游的威胁。曾经骄横一时的湘军组建者曾国藩，把自己座船上的御赐物品丢在太平军手里，落荒而逃，羞愤之中差点投水而死。湖口战役充分显示了石达开的卓越才能和超人胆略，他的对手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这样一个优秀将领未能在革命事业中充分发挥他的才干。1856年9月，石达开正在武昌前线指挥作战，天京城里爆发了太平军内讧：北王韦昌辉杀害了居功自傲的东王杨秀清及其部下。石达开得知后，为之震惊，星夜疾驰，赶回天京，斥责韦昌辉等人的卑劣行径。但他未能控制局势，而且本人的生命也受到威胁，不得不只身逃出天京。韦昌辉等人残暴地屠杀了石达开的家人，并悬赏购买石达开的脑袋。天京城外的太平将士闻知后，义愤填膺，坚决地与石达开站在一起，树起靖难义旗，要求惩办祸首。韦昌辉终于伏法，石达开回到天京，受到全体将士的热烈欢迎，担负起“提理政务”的重任。

天京事变表明，农民阶级的弱点是怎样严重地影响着革命进程。韦昌辉虽已伏法，但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天王洪秀全对石达开表示了极大的不信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矛盾，企图重演自相残杀的惨剧。“我石达开对天国事业一无二志，韦昌辉杀我全家，我仍以大局为重，重返天京，为国效力，为什么仍处处遭人排挤算计？”他仰望苍天，扪心自问，感到不被人理解的莫大苦闷和愤慨。1857年5月，怒气冲天的石达开不能忍受别人的不信任，再次偷偷地逃离天京，决心率兵远征，永不回还。翼王石达开带领数万战士出走，不仅严重地影响了革命事业的发

展，而且也使石达开从此走上绝路。历史大错就这样铸成了。

石达开率军远征后，仍然尊奉洪秀全为天王，坚持对清军作战，但终因脱离革命中心，无所依托，被敌人多次围攻，屡受挫折，转战江西、浙江、福建、广西和湖南，突入四川，又撤到云南。1863年6月，在四川，石达开的部队被清军围困在水流湍急的大渡河南岸，弹尽粮绝，损失惨重。石达开率军左冲右突，强行渡河，均遭失败。身处此种绝境，眼望翻腾狂奔的大渡河水，遥想当年天国部队千军万马下长江的浩荡声势，石达开愧悔交加，声泪俱下。他已下定了必死的决心，但仍然希望能够拯救跟随自己转战千里之忠实部下，他愿以自己的一死换得部下的余生。在目睹家人投河自尽之后，石达开步入敌军大营。卑鄙的清军在石达开的部队放下武器之后，在一个黑夜里突然发动了残暴的大屠杀，石达开的最后一番苦心破碎了。

1863年6月，石达开在成都身受凌迟之刑，英勇就义。临刑之际，他神色安然，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表现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终年三十三岁。

石达开，真好样，
夺采石，勇无当，
一马冲入南京城，
太平天国第一王。

这是流传在安徽民间的一首民谣，它形象地刻划了农民起义英雄石达开的骁勇风姿。

丁汝昌

丁汝昌（1836～1895）年，原名先达，字禹廷，号次章，安徽庐江人。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中，丁汝昌率北洋水师将士奋勇抗日，在近代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

一、莘负奇气 报国无门

道光十六年十月初十（1836年11月18日），丁汝昌出生在安徽庐江县北分石咀村（今石头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丁汝昌就表现出倔强的个性和聪明的头脑。父亲丁灿勋务农种田，家境贫苦，无力供他上学。为了生计，父亲只得把他送出去给人当佣工。他常常是给人家干活，没有工钱，只管吃饭。但丁汝昌却没有表现出任何哀怨，他那倔强好胜的性格、不屈不挠的精神更加突出了。咸丰初年，庐江地区久旱不雨，荒情越来越重，但丁汝昌无力赡养自己的父母双亲，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贫病交加中被活活地饿死。

咸丰三年（1853年），秋风送爽，也给安徽这块古老贫瘠的土地送来一丝希冀。太平天国的陈玉成率领太平军打到了安徽。太平军所向披靡，连克无为、巢县、桐城、舒城等地。咸丰三年十二月二十日（1854年1月18日），丁汝昌的家乡庐江也被太平军攻克，太平军的一系列政策，受到农民的欢迎。这时丁汝昌

十七岁，他双亲已故，无牵无挂，于是参加了太平军，隶属程学启部下。后来跟随太平军到安庆驻守。咸丰十一年夏，安庆被清军包围了，形势十分危急。陈玉成率领太平军再次援救安庆，但战斗失利了。这时，程学启率部下三百人投降了清政府，投靠了曾国荃，丁汝昌因此也一同被编入了湘军。安应失陷后，曾国荃让程学启带领开字营，丁汝昌此时为哨官，授千总之职。第二年，程学启部受上级调遣，拨归了李鸿章的淮军，丁汝昌亦随之到上海镇压太平军。不久，又隶属刘铭传，丁汝昌此时升任营官，领队。同治三年（1864年），丁汝昌升为副将，统先锋马队三营，参加镇压东西捻军。同年，因为听说大将要避地名的说法，他为了避“钉（丁）不在炉（庐）”之讳，举家迁移，迁至巢县江郎中村（今其后代仍居住在这个村里）。同治七年，因镇压起义有功，授总兵之职，同时又晋加提督衔，赐“协勇巴图鲁”勇号。同治十三年（1874年），丁汝昌因事得罪了他的顶头上司刘传铭，刘传铭对他心怀不满，企图把他召去，然后把他杀掉。丁汝昌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一刻未敢停留，星夜赶回家中避了起来。刘传铭见他逃走，也未追杀。丁汝昌本以为很快就能复出，没想到一闲便是五年。当时，国家外患频繁，丁汝昌虽然想报效国家，为国出力，但却报国无门。这时的丁汝昌心情十分忧虑烦闷，他常常一个人对着空旷的院子叹气。心里非常想走出家门，参加到报国的行列中去。

二、统领海军 才能初显

光绪五年四月（1879年5月），清政府确定先创设北洋水师，然后由一化三。也就是先建立北洋舰队，然后逐步建立南洋

舰队和粤海舰队。派李鸿章具体督办北洋水师事宜。李鸿章因为十分赏识丁汝昌的才干，所以赏请留丁汝昌在北洋水师差遣。丁汝昌终于又重返军队，不久，北洋水师在英国订购的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四艘炮舰来华交货，丁汝昌被派为督操，从此，丁汝昌开始了他的海军生涯，而且日后率师与日本所打的甲午海战，成为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中光辉的一页。

光绪六年（1880年）12月，丁汝昌受命率管带林泰曾、副管带邓世昌等，去英国督带超勇、扬威两艘巡洋舰回国，途中他考察了法国、德国的军事、工业等情况。这次出行，也是清政府的龙旗第一次航行海外。第二年10月30日，超勇、扬威号军舰抵达天津大沽港。李鸿章见丁汝昌任务完成得好，对他更加器重，奏请丁汝昌改督操为统领北洋海军。光绪八年，因丁汝昌巡南海有功，赏头品顶戴，换“西林巴图鲁”勇号。次年，又授天津镇总兵，赏穿黄马褂。光绪十四年（1888年）9月，北洋海军正式成军，舰队官制设提督一人，总兵一人，副将五人，参将四人，游击九人，都司二十七人，守备六十人，千总六十五人，把总九十九人。丁汝昌被授为北洋海军提督，统率大小舰艇四十余艘，约五万吨。为了培养急需的海军专业技术人才，根据丁汝昌的建议，又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5月，设水师学堂于刘公岛，由丁汝昌兼领总办。刘公岛地处山东半岛威海市的黄海前哨；它横距海上，形成天然屏障，是扼守东陲海疆的重要军港。在这里设水师学堂，是一个天然的好场所。光绪二十年，丁汝昌被赏加尚书衔。丁汝昌深知海军在抵御列强、保卫祖国海疆上的重要，很重视北洋海军的建设，平素督练认真，营规也较为严明，官兵有一定的近代军事素质，而且爱国热情很高。无论是士气还是战

斗力，都远胜过当时清政府的陆军。

三、积极主战 抗击日寇

光绪二十年（1894年）春天，朝鲜爆发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的烈火迅速燃烧起来。朝鲜见无力镇压，请求清政府派兵“进剿”。6月，清军进驻朝鲜。这时，日本正在策划一场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看到有机可乘，就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派出大批军队在仁川登陆，进入汉城，与驻朝清军形成对峙。清政府多次建议中日同时撤军，都被日本政府蛮横拒绝。

丁汝昌对局势的认识一直比较清醒，他曾上书朝廷，请求率海军主力出海，为援朝的“高升号”兵船护航，但李鸿章没有同意。结果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7月25日，高升号遭到日本侵略者不宣而战的袭击。高升号被击沉，死伤七百多人，两艘护航舰受到攻击，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同时，日军又在陆上向驻守牙山的清军发起进攻，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8月1日，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但北洋海军一直被李鸿章视为私产，采取“避战保船”的消极方针，严令丁汝昌只可守大同江至威海卫一线，后来又缩小到成山角至鸭绿江口一线，决不准“滥进袭击”。丁汝昌受制于李鸿章，虽积极主战，但无法施展。丁汝昌愤慨不已，但却难以违抗，只能在划定的区域内游戈，不能越雷池一步。朝廷中的一些主战派不明真相，就迁怒于丁汝昌，弹劾他“畏葸无能、巧滑避敌”，于是朝廷下令将他革职。只是由于无人替代和北洋海军将士的反对，才改为暂免处分，戴罪立功。对于这种莫须有的罪名，丁汝昌心情十分难过，但他想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就将这些都置之于脑后了。他依旧勤勉认真，忍辱负重，锐

意备战。

9月初，朝鲜平壤吃紧，清政府决定从海道派援军到鸭绿江边的大东沟。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北洋舰队护航。护航任务完成后，舰队于17日返航。途中，忽然发现西南方远处海面上出现如柱薄烟，远远望见来船都悬挂着美国旗。近中午时，来船渐近，共十二艘，都改悬日本旗。镇远舰的瞭望哨兵发现后报告，立刻，战斗警报响彻海空。丁汝昌在旗舰“定远”号铁甲舰上，与总兵兼旗舰管带刘步蟾等议定，以“分段纵列”的阵势，起锚迎战。顷刻之间，战斗准备井然就绪。这时，北洋舰队开足马力，破浪前进。距离在迅速地缩短，在距敌舰五千米时，旗舰定远号首发一炮，紧接着各舰大炮相继怒吼，颗颗炮弹飞向敌舰，激战开始了。

这时，双方实际投入战斗的兵力是：中方有战舰十艘，鱼雷艇四艘；日方有战舰十二艘。从力量对比来看，中国舰队共三万一千吨，日本舰队共三万八千吨；中国舰只较旧，主要战舰“定远”号和“镇远”号舰龄已达十二年；日本舰只大多在甲午战争前不久下水，式样新，动作快；日舰航速最快的“吉野”每小时可达二十三海里，其余各舰也多为十九海里，而中国舰只最快的每小时只有十八海里，其余各舰多为十四、五海里，日舰的装备是新式的速射炮多，中国舰队的优点是“定远”、“镇海”两主力舰吨位大（各七千吨），火炮口径大，装甲厚。总的来说，双方舰队在装备上各有长短。

中日舰队相遇，日舰以“吉野”、“浪速”等四艘快速战舰为前锋。日本舰队司令伊东佑亨率旗舰“松岛”及其他七艘舰只组成本队，排成鱼贯纵列，依次衔尾前进。日本舰队的阵势，有利

于充分发挥快速舰的机动灵活性和一舷齐的快速炮的威力。中国舰队交战中，摆成“人”字阵，丁汝昌奋勇督战，力搏强敌。他与刘步蟾乘坐的旗舰“定远”号恰在“人”字尖上，冲锋在前，将日本舰队拦腰截断。战斗中，丁汝昌面对强敌，冷静沉着，指挥果断，开战不久就击中敌舰一艘。鏖战中，丁汝昌正在旗舰“定远”号飞桥上指挥，因飞桥年久失修，被敌人炮火击中舰后震动破裂，丁汝昌从空中跌落，身受重伤，不久帅旗也被打落。丁汝昌拒绝随从把他抬入舱中，坚持坐在甲板上，鼓励士兵为国英勇奋战。但是，丁汝昌此时只能鼓励“定远”号甲板上的士兵，已不能指挥全舰队。这样，中国舰队的各舰几乎就成了各自为战，处于不利的地位。尽管如此，中国舰队的广大将士都能同仇敌忾，英勇作战。双方激战了五个多小时。中国北洋舰队涌现了许多视死如归的英雄，使日本舰队受到沉重的打击。据日方《日清战争实记》中记载，日军的旗舰“松岛”号被“镇远”号所发的两枚大炮弹击中，使其弹仓爆炸，船体倾斜，死伤达一百多人。另外日方的“吉野”舰也完全失去了战斗力，“赤诚”号等三艘日舰受重伤，几乎沉没。“赤诚”号的舰长海军少佐坂元八太郎被击毙。从而迫使日军首先退出战斗。这次战斗，清北洋舰队也损失了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四艘军舰。

四、劲节励冰 殉身报国

黄海海战之后，李鸿章为了保存他的实力，在奏报中有意夸大战败程度，强调中国舰队不及日本，以此为理由，命令舰队避战于港内，不准出击。从此，把黄海的制海权拱手交给了日本。

这样一来，日本侵略者更加肆无忌惮了。经过一个多月的休

整和准备，10月下旬又分海陆两路进犯旅顺、大连。旅顺和威海卫是北洋海军的两个基地，隔海相望，控制着渤海的门户。旅顺背山面海，水深港阔，形势险要。北洋舰队用了几十年时间，花了几千万两银子，在这里建下了巨大的船坞以及海岸炮台、陆路炮台三十余座，安有大炮一百多门，其中多数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德国克虏伯厂出产的新式大炮。李鸿章曾经自夸为“固若金汤”。但是，由于清朝的腐败，数万陆军在日军登陆前六天就不战自溃，望风而逃。10月24日，日军在花园口登陆，辽东陷入敌手。李鸿章命令北洋舰队驶离旅顺，避往威海卫。日军三万余人顺利在花园口登陆。此时，丁汝昌亲自跑到天津去见李鸿章，要求率领舰队出战，进援旅顺，受到李鸿章的训斥：“你好好在威海卫守住你的几条船，此外没有你的事。”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月，日军又在山东荣城登陆，希图抄北洋舰队的驻地威海卫的后路，造成海岸夹击之势。日军二万余人在海军的护送下，进犯威海卫。当时北洋舰队虽然损失了五艘战舰，但主力尚存，还可以与敌人一决战阵。丁汝昌反对死守这种作法，他向李鸿章表示：“我们与其坐在这里等敌人来围攻，不如率水师出击对敌人迎头痛击。”但李鸿章说：“如果有违令出战的，就是胜了我也要治罪。”丁汝昌只好悻悻地返回威海卫，准备最后一战寄希望于万一。威海卫防御的弱点在陆路，丁汝昌要求山东巡抚李秉衡认真布置兵力，以防日军抄袭后路。但李秉衡根本不理睬丁汝昌的建议，敷衍塞责，听到日军逼近的消息，就狼奔豕突，从烟台直退到莱州。1月20日，日军在威海卫的东侧成山头登陆，采取和进攻旅顺时一样的包抄后路的老办法。即日攻占荣城县，兵分两路，扑向威海卫。日军先攻南岸炮

台，丁汝昌亲自率舰发炮支援，战斗了两昼夜，击毙了日军第六师团第十一旅团长、左翼司令陆军少将大寺安纯，杀伤了不少日军。但由于众寡悬殊，威海陆路南北炮台相继失守。于是，刘公岛成为孤岛，北洋舰队全被困在了威海港内。

日本陆军占据南北炮台后，海军即封锁东西港口，海、陆一齐发炮，对港内进行轰击。在这种极不利的情况下，北洋舰队的水兵及刘公岛和日岛炮台上的守军，仍坚持抵抗，英勇战斗。2月9日的海战，丁汝昌亲登靖远舰指挥。战至中午，靖远为敌炮击中搁浅，丁汝昌被水手救上小船，幸免于难。日军先后发动八次进攻，都被击退，并使其多艘军舰受伤。日军见硬的不行，便来软的，诱丁汝昌率舰投降。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在给丁汝昌的劝降书中说：“大厦将倾，不是一木所能支。”而且诱之以利。丁汝昌览信后，断然拒绝说：“我决不会丢弃报国的大义，我一定要以死来尽我的职责！”并把劝降书交给李鸿章，决心以死报国。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嘱咐他的亲人：“我已经以身许国了，请你们不要挂念。”

日本侵略者见战不成，劝降也不成，就采取了对北洋舰队长期围困的方针。北洋舰队陷于重围之中，形势越来越险恶。丁汝昌认为，此时，只要陆上援军赶到，水陆夹击，刘公岛之围还可解除。为此，他派一名水手怀密信凫水到威海北岸，潜去烟台求援。趁这危急之时，北洋海军副提督英国人马格禄和顾问美国人浩威等，勾结威海营务处提调牛昶昞等，唆使士兵、水手哗变，胁迫丁汝昌投降。丁汝昌严词拒绝，他说：“我早知道你们会这样干，但是我决心以死报国，决不会看着你们这些败类投降，你们想杀我，很容易，我决不会怕死的！”

2月11日，日军水陆进行夹攻，丁汝昌接到密派外出联络求援的水手的回报，知道山东巡抚李秉衡已由烟台逃往莱州，等待陆上援军已不可能。此时，岛上已近弹尽粮绝，北洋舰队到了最后时刻。丁汝昌于夜间召开各舰管带和洋员会议，主张率领剩余船只，冒死突围。他说：“如果我们开足马力突围而出，或许能幸存一些，能到达烟台，也比全军覆灭好。”但是马格禄、浩威、牛昶昞等人均不答应，并自动散会。为防止留下的主力战舰资敌，丁汝昌下令用炸药沉舰毁台，但无人听令，只有右翼总兵刘步蟾自沉定远舰，然后自杀殉国。丁汝昌感到自己对扭转局势已经无能为力了，但决不屈辱而生，决心与军舰共存亡。为了防止有人盗印降敌，严令召牛昶昞等当面把提督印截去一角使其作废。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十一日夜，愤而服毒自杀殉国，时年五十九岁。

次日晨，洋员和那些无耻的将领以他的名义，起草投降书，向日军乞降，把残存的十艘大小舰只和大批枪炮辎重拱手交给了侵略者。清政府苦心经营十六年、耗费巨资的北洋海军就这样覆灭了。

1934年5月，冯玉祥将军到威海楼环翠楼登临凭吊丁汝昌、邓世昌，写了一副楹联：“劲节励冰霜，对万倾碧涛，凭此丹心垂世教；登临余感慨，望中原戎马，擎将热泪拜乡贤。”热讴歌了在甲午海战中捐躯的义士们。

刘铭传

刘铭传(1836~1896)，字省三，号大潜山人，安徽合肥人。清末著名将领。

一、嫉恶如仇 保卫台湾

海风从身旁拂过，海浪在脚下轰响，隔海眺望秀丽的台湾岛，你会有怎样的遐想？一泓碧水多像祖国大陆与宝岛联结的纽带，跳跃的浪花又多像海峡两岸共振的脉搏！你还会想到历史上许许多多有益于台湾的保卫与建设的人们吧？是的，切莫忘记他们：驱逐荷兰殖民者的郑成功，统一台湾的康熙皇帝，还有保卫台湾、开发宝岛的刘铭传……

1854年，为对抗太平军，刘铭传在家乡办团练。1862年改编为准军，长期镇压太平军、捻军，由千总、都司、总兵，升至直隶提督，所部号“铭军”，为淮军主力之一。他有将才，通经国大略，又喜诗文，著有《大潜山房诗稿》。但他嫉恶如仇，不愿与官场中的腐败之风同流合污，几次挂冠归籍。他的一首诗写道：“名士无妨茅屋小，英雄总是布衣多。为嫌士宦无胆肝，不惯逢迎受折磨。饥有糗粮寒有帛，草庐安卧且高歌。”一个封建官吏能不曲从流弊而独善其身，确是难能可贵！

刘铭传经营台湾，是从中法战争开始的。法国殖民者一面在越南逞凶，一面派出兵船在福建、台湾海域游弋，战事一触即发。为加强台湾防务，1884年6月下旬，清政府擢在籍养病的刘铭传以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刘铭传闻命，即扶病南下，渡海赴台。

他行至上海时，法国公使九次来探询行期，阴谋在海上邀击。刘铭传置酒高会，声言某日乘某船渡台以迷惑敌人，而于当夜乘风大雨急，轻装登上小艇，再换乘兵舰直驶台湾。离开上海数小时后，法国公使才得到消息，急令军舰追赶。这时，刘铭传已顺利到达基隆港登陆。这一天是7月16日。

驻守台湾的清军共四十营，台南部署了三十一营，台北只有九营，不及四千人。这种兵力配置的不合理，使得法军乘虚而入，重点攻击台北。清军装备太差，基隆险要之地，仅有五门固定方向的大炮，只能正面守，不能攻左右。刘铭传巡视数日，不胜唏嘘叹息，历任官员如此昏庸，不治防务，每年徒费饷银百数十万两，怎能不误国？重新调动部署军队，已是缓不济急，他只得就现有条件，加固炮台，严饬官兵全力备战。

基隆煤矿对于法国海军可以说是胜败攸关。占据煤矿，就可保证兵舰有充足的燃料。进而占领台湾，更是法军既定目标。法军曾与刘铭传交涉，欲购买煤炭，遭到断然拒绝。8月4日，敌远东舰队副司令利士比率舰五艘开至基隆口外。次日，敌舰用猛烈的炮火轰击基隆炮台，炮台在爆炸声中化为乌有，清军处于被动局面。刘铭传果断采取诱敌陆战的战术，仅留少数官兵在正面固守海岸小山制高点，主力撤到后山埋伏。敌军以为清军溃败，四、五百名敌人蜂拥上岸，筑垒安炮。夜雨潇潇，刘铭传派遣的壮士邓长安等悄悄摸向敌垒，毁掉敌人的大炮。刘铭传又亲率伏兵从左右向敌出击，形成对敌军的三面夹攻。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昏了头脑，丢弃工事，向海上的军舰逃命。一些敌兵饮弹命绝，一些敌兵在忙乱中葬身大海。基隆保卫战首战告捷，毙敌官兵百余人，夺军旗两面，缴获洋枪数十杆，大炮四尊，帐篷

十余架。捷报传出，朝野欢跃。上谕嘉奖刘铭传，交部优叙，发内帑银三千两犒赏官兵。

利士比黠武不赢，又别生诡计，通过英人邀请刘铭传到法国兵船上谈话，遭到拒绝；请求恢复中外贸易，并请刘铭传致函清廷从速议和，同样被严辞驳回。以后，利士比再度进攻基隆，败绩而归。

8月23日，法军舰队在马尾港袭击了福建水师，气焰嚣张一时。9月末，在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率领下，分别在基隆和沪尾索战。

沪尾在台北府城西偏北，距台北仅三十余里，有淡水河相通，可称台北锁钥。刘铭传只好兵分两支，一部由自己率领迎战基隆，一部由提督孙开华统带固守沪尾。基隆在数千名敌兵的轮番攻击下岿然不动。孤拔突然改变主攻方向，调兵舰助攻沪尾。沪尾清军飞书向基隆告急。刘铭传认为，沪尾有失，台北府不保，基隆后路被抄，守基隆清军则不战而溃，非舍车保帅不能维持局面。毅然决定，转移基隆煤矿机器，炸毁煤矿，部分官兵扼狮球岭而守，其余增援沪尾。10月1日，法军占领基隆。

由于刘铭传主动撤出基隆，加强了沪尾方面力量。传令移土石塞海口，使敌舰不得近岸。令孙开华、章高元距海数里环山设伏，张李成率领的民兵五百人伏于海滨草莽之中，诱敌登陆。10月8日，法军八艘军舰遥击沪尾，继而放下小船载千余人登岸。诱敌的清军佯败，法军追击不舍。敌人进入伏击圈后，清军逾壕奋击，民兵从敌后突起，切断敌人退路。我军人人奋勇，与敌展开肉搏战，杀敌声震天撼海。法军被击毙三百余名，其余夺路后逃，自相践踏，慌乱中敌炮击中小艇，溺死百余人。清军又获得

沪尾之战大胜。

10月下旬，法军奉本国政府命令，封锁台湾各海口，断绝海上交通，以困台湾。台湾军民抱着极大爱国热情，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不动摇，不后退，誓与海岛共存亡。清军连月苦战，伤亡不小，军需枯竭，增援的军队和兵船不能进港。军营中疫病流行，病者十居八九，九营之众能战者不过千人。在这样严重的时刻，领导者的情绪和行动都会影响群众，影响战局。刘铭传鼓动官兵，拚死守岛，常短衣草履，巡访军营，安抚慰问，与士兵同食同饮。又采取积极的自救措施，动员绅商各界捐饷募兵，修整工事。战斗中，他身先士卒，舍生忘死，一次，一发炮弹从头上掠过爆炸，所乘战马受惊伏地，刘铭传面色不改。军民感佩，齐心战守。经谈判，中法战争结束，1885年6、7月间，法军从基隆及其占领的澎湖列岛撤出。台湾保卫战历时近一年，法军没能夺取台湾，孤拔凄迷地说，攻台是一个最不合算的战役，连他自己也在法军撤出前死于澎湖。刘铭传领导军民保卫台湾，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不朽功勋。

二、变法图强 开发台湾

中法战争结束，清廷以台湾为南洋门户，决定设省，授刘铭传为首任福建台湾巡抚。之后，刘铭传开始了他的开发、建设台湾的事业。

他提出一套新的台湾行政区划方案，以台中彰化地区为全省政治中心，将原来的二府、三厅、八县扩大为一州、三府、四厅、十一县，并严肃吏治，加强了对地方的统治。

刘铭传从中法战争中得到教训，感到前车可鉴，后患方殷，

不能不先为设备，以防患于未然。在基隆、沪尾、安平、旗后、澎湖赶修了十座新式炮台，购进新式后膛钢炮和水雷，整编军队，严格训练。

中法战争之前，关于战和，朝臣各持一端，争吵不休。他在所著《刘壮肃公奏议》中有精辟的议论：主战者应察兵将、器械、炮台、兵船是否可战，不可空谈一气；主和者当思历次屈辱和恶果，剜肉补疮，遗害无穷。战不如人而欲图强，犹井中求火也；器不如人而不知变，犹当暑著貂也。今中国战不如人，器不如人，不思改图，以后将如何立国！弃官乡居时，曾与名士会饮，刘铭传长叹说：“中国不变西法，罢科举，火六部例案，速开西校，译西书以培养人才，不出十年，中国将无法挽救。他摒弃封建士大夫闭关自守的陈腐观念，主张变法图强，民族自立。这种比较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指导着他对台湾的治理。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在台湾日益增多。他办起机器局、机器厂、军械所、火药库、水雷局、邮政局，大力开发自然资源，兴办樟脑、硫磺、煤炭各业。又修铁路、辟番途、开港口，奖励贸易，保护农商。在台南、台北两府设清赋局，清丈土地，查检隐漏，增加了税收。

刘铭传倡言修筑铁路，早在1880年。这年，他奉诏至京，条陈开造铁路。他认为，中国非速开铁路万不能自强。修筑铁路，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以及厘捐行旅，对于国防尤为重要。到台湾后，精心筹画，于1889年修建了由基隆到台北的铁路，这是台湾的第一条铁路。

清朝官吏往往歧视所谓“生番”，即高山族人民，激化了民族矛盾，高山族人民生活地区不能得到开发。刘铭传深感不“抚番”不足以团结一切力量，建设台湾，保卫台湾。1886年设立

了抚垦总局，下设十个分局，自任抚垦大臣，开始开山“抚番”。修进山道路数百里，令地方官、通译和官军一同入山劝化。有违反规定、虐待“番民”者，受到责罚。台南副将潘高升残杀无辜“番民”，刘铭传上疏弹劾。到1888年，全台有八百番社、二十万人接受招抚，同时垦田百数十万亩。各抚垦局设“番学”，招收“番童”就读。其父母有来校探望者，辄跳舞歌呼而去。“抚番”的成功，密切了台湾地区的民族关系，对高山族人民的发展进步有沉刻的意义。

发展教育，培养成才，刘铭传做了很多工作。除“番学”外，开办书院、儒学、义学、官塾，尤其是仿西方创办了新式学校——西学堂。台湾出现“文风蒸蒸日上”的局面。

1891年，刘铭传闻户部奏请天下海军十年内毋增炮舰，喟然长叹，愤愤辞职还乡。他经营台湾七年，力疾任事，呕心沥血，改变了台湾的面貌，保卫了祖国的领土完整和统一。

“将军呕心六载功，不就翻以资敌成。”1895年，战败的清政府将台湾拱手割让给日本侵略者，刘铭传和台湾人民流洒的血汗付诸东流。刘铭传闻讯，悲怆不已，留下规复宝岛的遗愿，溘然长逝。倏忽近百年，黄泉之下的英雄一定还在聆听着台湾的松涛响、海浪声……

左宝贵

左宝贵（1837～1894），守冠廷，山东省费县（今山东费县）人。清末抗日将领。

咸丰六年（1856年），左宝贵投奔了清军江南大营，在镇压

太平军中，因功奖六品军功。咸丰十年，奖五品顶戴。同治元年（1862年），左宝贵升为都司，第二年升为游击。同治七年（1868年），因镇压捻军有功升为副将。同治十一年又加赏总兵衔。后镇压起义者宋三好于石砬子边。被清廷赐号鏗色巴图鲁，晋记名提督，授高州镇总兵，但仍旧留在沈阳平定起义，因此赏穿黄马褂，双

眼花翎。

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本进兵朝鲜，左宝贵奉命从奉天（今沈阳）前往抵御日军，准备与汝贵、马玉昆等会师。当时叶志超向李鸿章电告战况，虚报胜利，于是被拜为总统诸军之将，叶志超将几路人马分散出城，让左宝贵驻守平壤。不到一天的工夫，日军突然来到，左宝贵与部将来绅阿等力战击退了日军。但日军很快又分道来攻，左宝贵又力战败敌。叶志超此时贪生怕死，召集全军，要弃城逃跑，左宝贵坚决不同意。叶志超弃城逃跑，左宝贵率军与日作战，日军架起大炮攻城，炮火飞扬，左宝贵指挥若定，站在城头上，大声呼喊，命部下打击日军。突然，一炮弹在左宝贵身边爆炸，左宝贵身负重伤，部下将他从城头上抬下来时，他还能说话，但过了一会儿，他就永远地合上了眼睛。

左宝贵牺牲后，清廷追赠他为太子少保，谥号忠壮，给他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袭之职。

陈玉成

陈玉成（1837～1862 年），广西藤县人。太平天国青年英雄、英王，太平军统帅。

一、少年英雄 天国英王

1856 年 2 月，大批清军在江苏巡抚吉尔抗可率领下包围了太平天国东部重镇镇江，镇江告急。太平军派燕王秦日纲前往救援，准备先与城内太平军取得联系，然后里应外合，夹击清军。但是援军来到镇江城外，发现镇江已被清军重重封锁，江面布满了敌船。很明显，此刻进城联系，势必要冒极大的危险。这时，一员小将挺身而出，他挑选几名勇士，驾驶一只小船，于枪林弹雨之中冲过敌人的封锁线，冲进了镇江城。最后太平军内外夹攻，大败清军。这位浑身是胆的小将，就是太平天国赫赫有名的英雄陈玉成，此时他才十九岁。

陈玉成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自幼父母双亡，随叔父陈承谔生活。叔父家里也很穷，因而他很小就不得不为人家干活。艰难的生活环境，使陈玉成磨炼出一副勇敢坚强的性格。早年在金田起义爆发前，陈玉成就参加了拜上帝会，十四岁随叔父一起参加了金田起义，成为太平军童子军中的一员。玉成年纪虽小，但作战勇敢，多次立功，1853 年 3 月太平军攻战南京后，被

提拔为左四军正典圣粮，职同监军。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派兵西征。西征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相继克复安庆、九江、汉口、汉阳等地。但攻打武昌时却遇到了困难，连续几个月没有拿下。不久，陈玉成随援军来到武昌。他自告奋勇冒险去城下侦察。当了解到城内敌人粮草已断，士气低落的情况后，建议发动奇袭，出奇制胜。主将同意了他的作战计划。当晚陈玉成挑选五百名精兵，绕道梁子湖来到武昌城东面。他布置三百名战士从正面摆开攻城的阵势，吸引守城清军注意，自己却率领其余二百名战士埋伏于僻静处。当敌人的注意力被吸引到正面后，陈玉成等突然用绳索套住城垛，缘绳而上，强登城头。这二百名勇士如飞将军从天而降，守城几千名清军茫然不知所措，仓皇夺门而逃。太平军一举攻克武昌。捷报传到天京，陈玉成被越级提拔为殿右三十检点，统领陆军后十三军和水师前四师。

攻克武昌后，陈玉成继续转战于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上游山区。“三十检点回马枪”闻名全军，陈玉成成了太平军第一流的英雄。

1856年初，清军“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加紧对天京的围困，陈玉成奉命东下。镇江解围之后，他与秦日纲、李秀成一起，率太平军乘胜前进，连破江北、江南两座大营，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和“江南大营”统帅向荣相继自杀，太平天国军事上达到全盛时期。

但是，就是这一年秋天，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了令人痛心的互相残杀，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敌人乘机反扑，夺回武昌、九江、镇江等军事重镇，重建“江北大营”、“江南大营”，再次形

成对天京的包围。1857 年底，年仅二十岁的陈玉成被封为前军主将，与李秀成一起主持军务。陈玉成受命于危难之间，决心竭尽全力挽救革命危机。

1858 年 8 月上旬，陈玉成和李秀成等在安庆东边的枞阳镇召集会议，决定协同作战，首先打破“江北大营”，恢复天京与江北的交通。陈玉成挥师东进，9 月上旬与李秀成率领的太平军在滁州东南的乌衣会师。清军见太平军长驱直入，大为恐慌，除出动“江北大营”大批清军外，还调来蒙古都统胜保的马步兵。胜保的蒙古骑兵未受过太平军打击，异常骄横，9 月 25 日气势汹汹向乌衣进犯。陈玉成早有防备，他预先布置了一支专破骑兵的刀牌手埋伏在路旁。胜保的骑兵一到，刀牌兵一跃而起，冲入敌阵，刀砍敌骑马足。胜保的骑兵纷纷倒地，前后互相践踏，乱成一团。太平军乘势合拢夹击，杀得敌军人仰马翻。这一仗共歼灭清军三、四千人，胜保的骑兵全军覆没，胜保单骑逃跑。太平军乘胜直捣浦口，再破“江北大营”。

正当陈玉成等在天京外围殊死战斗的时候，太平天国的死敌湘军却乘上游空虚，大举进犯安徽。湘军悍将李续宾率六千余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先后攻陷太湖、潜山、桐城、舒城等地，接着又大举向庐州（今安徽合肥）西南六十公里的三河镇猛扑。三河位于巢湖西岸，交通方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三河守将一天之内五次向陈玉成求援。陈玉成冷静地分析形势，认为三河东临巢湖，北靠庐州，南有庐江，三面都在太平军掌握之中，李续宾虽然凶悍，却犯了孤军深入的大忌。决定率太平军主力前往救援，集中优势兵力，采取迂回包围战术，歼灭敌军。11 月初，他召集所属各部从苏北出发，直奔三河南部的白石山、金牛

镇，包抄湘军后路，又命庐州太平军南下，切断李续宾与舒城湘军的联系，敌人完全陷入太平军包围之中。11月5日黎明，大雾迷漫，对面看不见人。陈玉成一马当先，直冲敌阵，奋勇杀敌。湘军光听见声音，看不清底细，顿时一片混乱。这时李秀成援军赶到，三河守军也出城助战，三路会合，打得敌人溃不成军。李续宾慌忙收拾残部，龟缩堡垒，企图死守待援。陈玉成乘势将敌人团团包围。经过三天激战，湘军堡垒全部被打破，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被击毙，李续宾被迫投水自杀，所部六千余人全部被歼，太平军大获全胜。“三河之战”是对湘军的沉重打击。湘军头目曾国藩不得不承认：“三河败后，元气大伤”，另一头目胡林翼也惊叹：“全军皆寒，不可复战”。三河战后，陈玉成乘胜收复舒城、桐城，安徽局势转危为安。1859年3月，陈玉成被封为英王。

二、围魏救赵 兵败就义

1860年春，曾国藩亲自率湘军主力八万人，兵分四路再次进犯安徽，围攻安庆。太平天国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攻打武汉，以迫使湘军为救武汉而撤安庆之围。3月，陈玉成自桐城出发，沿长江北岸火速西进，十二天内连克安徽霍山、英山，挺进湖北，攻占离武汉仅八十公里的黄州。太平军突然西进，引起敌人一片恐慌。远在安徽的胡林翼心急如焚，口吐鲜血，大骂自己“笨人下棋，死不顾家”。武昌城内的清军更是乱作一团，束手待毙。正在这时，帝国主义居然公开出面干涉。3月初，英国水师提督何伯、参赞巴夏礼驾驶军舰闯进汉口。太平军攻占黄州，巴夏礼立刻来黄州，威胁说：太平军若继续前进，进攻武汉，

将“损害英国商业利益”，英国不能坐视，蛮横地要太平军“远离该埠”，迫使陈玉成停止进攻。武汉敌军绝处逢生。

“围魏救赵”的计划失败，安庆局势更加危急。陈玉成于4月回师救援安庆，与洪仁玕率领的援军在桐城会合。但几经激战，终未奏效。安庆长期受困，弹尽粮绝，不久失守。

安庆失守后，陈玉成退守庐州，准备坐镇庐州，一面“进兵取粮”，支援天京，一面广招兵马，收复安庆。但是狡猾的敌人不给陈玉成以喘息的机会，不久又两路夹击，围攻庐州。陈玉成指挥庐州太平军顽强抵抗了三个多月，终因兵单力薄，外援隔绝，不得不放弃庐州，路过寿州时，为反复无常的土豪苗沛霖所骗，被捕送清军胜保大营。

在戒备森严的胜保大营里，陈玉成大义凛然，宁死不屈。胜保要他跪下，陈玉成厉声说：“我是堂堂天国英王，你不过是我手下一员败将，我怎能向你下跪！”胜保奸笑道：“那么，现在你怎么会落到我的手下了呢？”陈玉成冷笑道：“我只不过是遭奸人暗算，自投罗网，哪里是你有什么本事。你可记得，当年乌衣一战，你的骑兵有一个生还的吗？”胜保见硬的不行，又换了一副嘴脸，以酒食相待，劝玉成投降。陈玉成大声喝道：“大丈夫要杀就杀，何必罗嗦？”1862年6月4日，陈玉成在河南延津慷慨就义，年仅二十五岁。

刘永福

刘永福（1837～1917 年），字渊亭，广西博白县上思村人。他率领黑旗军转战中越边境，常与越南军民协同作战斗，抗击法国侵略者。后来，又奉命镇守台湾，屡建战功。

一、机动灵活 以智胜敌

刘永福祖辈世代为农，清贫如洗，因无生计，他童年时随父母流徙广东钦州（今属广西）。十三岁时，他就到船上当佣工，受尽欺压奴役，历尽人间艰辛。他在和工友谈心时会说：“大丈夫不能为数百万生灵造福，甚觉可羞可卑！”咸丰七年（1857 年），他联络了一批人，投奔了当时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刘永福率领一支以七星黑旗为战旗的黑旗军。转战中越边境。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法国就妄想建立一个包括越南和中国西南地区的所谓“东方帝国”。为此目的，同治十二年（1873 年）11 月 5 日，法国驻西贡总督黎眉派大将安邨率大军侵占越南河内，直逼我国边境，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应越南政府的要求，1873 年 12 月，刘永福亲率黑旗军，会同越南将领黄佐炎部，向河内近郊进军。法国侵略军头子安邨和李维业出城挑战，刘永福指挥黑旗军和越南的军队奋起攻击。交战时，黑旗军且战且退九

十里，法军得意地穷追不放，待敌军追到一茅草茂密处，刘永福即令士兵放起火来，法军十分惊慌，纷纷溃败。但没想到黑旗军预先设有伏兵，而且挖有不少壕沟，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在敌人慌乱之际，刘永福杀了一个回马枪，击毙了安邨、李维业，消灭了法军两千多人，一举收复了河内。

法国侵略者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蓄意扩大侵略战争，决心把战火烧到中国境内。光绪八年（1882年）4月，法国又派大元帅李威利率领战舰二十八艘，率兵五千人，再次攻陷河内，直窥中国云南。应越南政府之请，清政府决定派刘永福率黑旗军再度进军越南，支援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光绪九年（1883年），在距离河内约二公里的纸桥一带，刘永福率军与法军展开了名震中外的纸桥大战。双方犬牙交错，短兵相接，胶着围攻。刘永福身先士卒，指挥灵活。这场战斗，黑旗军个个英勇杀敌，从早上九点打到下午一点，法军被打得大败，两千余人被歼灭，大元帅李威利以及副元帅等数十名将官被击毙。此后，刘永福所率黑旗军留驻越南，和越南人民并肩战斗，每战必克，所向披靡，打得法国侵略者闻风丧胆。

光绪十一年（1885年）初，法国又派出海军向中国沿海进行海盗式的骚扰。同时，向越南增兵，以便海陆呼应。在越南的法国侵略军得到增援之后，一度强占了中国要塞镇南关（今友谊关）。侵略者还在关前插立木柱，上面用汉字写上“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气焰十分嚣张。刘永福为了对付枪械精良的法军，有效地打击敌人，有一次，他命令士兵们用猪血涂满全身，天黑时躺在死人堆里。次日，刘永福即以小股部队出击，引诱敌人来追赶。这时，装死的黑旗军突然一跃而起，挥舞大刀冲入敌

阵，吓得敌人胆颤心惊；抱头鼠窜。黑旗军挥刀猛冲，杀死法军五、六百人。

此时，爱国老将冯子材出任前敌统帅，率军赶到前线。他和刘永福一起，在越南战场的东西两线，大败法军。可是，腐败的清政府却奴颜卑膝地与法国谈和，签订了屈辱的“中法新约”，并在数日内连发六道诏命，调刘永福回国，致使越南很快沦为法国殖民地，中国的西南边疆也受到严重威胁。

二、依靠百姓 以劣胜优

刘永福由越南回国后，任广东南澳总兵。中日战争时，清政府调刘永福率黑旗军到台湾帮办防务，并驻守台湾。

光绪二十年（1894年）底，日本侵略军占领旅顺和大连，并准备进攻山东。在帝国主义列强的讹诈、恐吓、诱骗下，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日本马关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

1895年4月25日，台北人民鸣锣罢市，坚决反对日本侵占台湾和清政府的投降卖国。台湾各阶层群众纷纷表示“桑梓之地，义与同亡”，“万众一心，誓同死守”。1895年5月底，日本侵略军在台湾基隆东北登陆，台湾巡抚唐景崧按照清政府的命令，采取不抵抗政策，率大小军政官员撤回大陆，使台北不战而陷。6月2日，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在基隆口外的日舰上，偷偷办完交割台湾的手续，日寇主力近卫师团即向台湾开始了大举进犯，台湾人民纷纷组织义民军，决心抗击日本侵略者。日本全权官海军大将桦山资纪致书台南守将刘永福，令其撤出台湾，刘永福义正词严地加以拒绝。为了协同对日作战，黑旗军和台湾义民

军共推刘永福为台湾军事统帅，刘永福在誓师宣言中表示：“自问年将六十，万死不辞……本帮办亦犹人也，无尺寸长，有忠义气，任劳任怨，无诈无虞”，决心与台湾爱国军民抗战到底。农民领袖徐骧组织的抗日义民军，积极协同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展开了悲壮激烈的台湾保卫战。

日寇从海陆两路向台南和台中进犯，刘永福分兵把守，自己坐镇台南，指挥军民严密防范。日军舰艇几次企图从台南的安平口登陆，都被刘永福指挥将士击退、歼灭。日军见台南防守严密，不易攻破，便从陆路改攻台中。6月中旬，进犯台中的日寇收买汉奸，从小路抄袭了台中的门户新竹。守将杨紫云和义民军英勇抗击，最后因弹药缺乏，寡不敌众，杨紫云战死，新竹陷落。但台湾义民军在徐骧的领导下，不断向新竹的日寇发起反击，大小战斗二十余次，牵制日军达两个月之久，使日军的南侵计划受到沉重打击。日本人竹越与三郎在《台湾统治志》一书中供认：“不论何时，只要我军一被打败，附近村民便立刻变成我们的敌人。每个人甚至年轻妇女都拿起武器来，一面呼喊着，一面投入战斗。我们的对手非常顽强，丝毫不怕死。”

8月下旬，日军又大举进犯苗栗、大甲溪，刘永福派部将吴彭年带领黑旗军，联合徐骧的台湾义民军扼守。在大甲溪，当敌人刚刚过溪上岸，埋伏在南岸的吴彭年部立即给以迎头痛击，日军立脚不稳，大部队又尚未过河，慌忙退却。在退却过程中，又遭徐骧所率义民军的再次伏击，伤亡惨重。日军凭着人多势众，武器精良，弹药充足，最后侵占了大甲溪。

紧接着，日军又向台中重镇彰化进犯，刘永福急派部将吴彭年率黑旗军冲锋队——七星队前往支援，与徐骧的义民军一起，

同日军展开了激战。开始，他们采取诱敌深入、左右包抄的战术，大败日军，但败敌却在汉奸土匪的引导下，转攻彰化东门外八卦山，并从山上炮轰彰化城。吴彭年仅以数百人的兵力，与日寇大战于城东的制高点。黑旗军以一当十，拚死战斗，打退了日寇的多次攻击。这时，日军想用诱降的办法收买刘永福，结果遭到严词痛斥，于是，便集中炮火疯狂地轰击八卦山，吴彭年和七星队的三百名将士以及台湾义民军吴汤兴部，全部壮烈牺牲。彰化城内的汉奸随即打开城门，放进了日军。

彰化陷落后，日军把军事主力转向台南。9月初，又占领了云林、大莆林。刘永福调部将王德标与黄荣邦、林义成、简精华等率领数千义民军对云林县发起反攻，日寇见势不妙，仓惶弃城逃走，王德标会同义民军乘胜追击，围攻彰化城。在战局对我十分有利的情况下，卖国求荣的清政府对台湾坚持抗战部队和义民军实行封锁，断绝一切物资供应和补给，使围攻彰化的战斗失利。

日寇近卫师团感到兵力不足，难以对付英勇善战的刘永福指挥的部队和义民军，就急忙请求从辽东调两个师团到台湾。重组“南进司令部”。一路日军继续向南进攻嘉义县城；另一路日军在台湾南部枋寮和台南以北的布袋口登陆，配合陆路日军进攻台南，形势十分危急。11月12日，日寇以大炮轰塌嘉义城门，攻入城中。守城的黑旗军和义民军与敌进行巷战，杀敌无数，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而不得不退出嘉义城。刘永福所率的黑旗军和义民军退出嘉义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战斗，义军大部战死，徐骧也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10月下旬，台南失陷，刘永指挥黑旗军边战边退，步步设防，直战至弹尽粮绝，后潜身乘

外国轮船内渡厦门。

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和台湾义民军，在五个多月的抗战中，以劣势装备抗击日寇三个近代化师团和一支海军部队，歼敌三万余人，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1915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年近八十高龄的刘永福听到这个消息，万分气愤，提出愿为维护国家主权再上战场。不幸，疾病和愤恨交加，第二年就去世了。

刘锦棠

刘锦棠（1844～1894年），字毅斋，湖南湘乡人（今湖南湘乡市）。清末著名将领。

刘锦棠的父亲叫刘厚荣，镇压太平军时战死在岳州。刘锦棠于是投奔了老湘营，跟随他的叔父刘松山从江西转战到安徽。同治四年（1865年），他因功升为知县。同治六年，因镇压捻军有功，升为知府。陕甘总督左宗棠很欣赏他，加按察御史衔。同治八年二月，刘锦棠因功加布政使，赏给法福凌阿巴图鲁勇号。同治九年二月，刘松山被宁夏回民军击毙，刘锦棠被赏三品卿衔，接了他叔叔刘松山的旧部。十一月，加恩赏给云骑尉世职。后又随左宗棠镇压陕西甘肃回民起义。于光绪元年（1875年），受到皇帝嘉奖。左宗棠出关，他受

命总理营务。

光绪二年（1876年），刘锦棠随大军征讨新疆叛乱分子阿古柏。四月，左宗棠命刘锦棠率主力二万余人，出星星峡，给哈密、巴里坤至古城子，与金顺部会合。六月二日，刘锦棠、金顺率步马军三万多人从吉木萨尔出发，八日首克吉木萨尔以西之阜康城，接着向阜康西南之古牧地进军。古牧地是乌鲁木齐的外围要点，从阜康到古牧地有两条通道：一条经西树儿头子，是大路，但要通过戈壁，缺水；一条是经黄田，小路，水源充足，但敌人设防严密。二十日，清军在西树儿头子筑垒、凿井，故张声势。二十一日夜，突然袭击黄田，二十二日攻克黄田，二十八日攻克古牧地，歼敌六千。当时，清军在古牧地缴获敌人一件公文，大意是说乌鲁木齐城的壮丁已经派尽，防守无人；等待南路阿古柏的援军亦无希望。刘锦棠当机立断，下令进攻。于二十九日一举攻克了乌鲁木齐。刘锦棠攻下乌鲁木齐之后，大帅左宗棠向皇帝奏报，称赞他“忠勇罕俦，机神敏速，有谋能断，履险如夷。实一时杰出之才。”皇帝很快赏刘锦棠骑都尉世职。

阿古柏得知乌鲁木齐已被清军所破，即搜罗南逃的残兵，部署于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一线，构成三角防御地带，互为策应。阿古柏守喀喇沙尔（今新疆焉耆）。以上共计兵力为四万余人。清军则由金顺率四十个营的兵力守乌鲁木齐及其以西地区，并集中步、马、炮军五十四年营计二万五千余人，兵分东、北两路，对敌实施分进合击。刘锦棠率主力一万五千人由乌鲁木齐越天山，拟先夺取达坂城，自西北向东南进攻吐鲁番和托克逊；张曜、徐占彪分别从哈密、巴里坤向盐池（今新疆七角井以西）集结，南下与西进两路兵会师。十三日，刘锦棠率军攻占托克逊，其它两

路也相继得手，打开了通往南疆的门户。

阿古柏见南疆门户失守，走投无路，逃至库尔勒后服毒自杀。其部出现了混乱溃散的状态。按左宗棠的部署，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十七日，刘锦棠率三十三个营为前锋，张曜率十六个营继进，总兵力约二万人，直指伯克胡里与白彦虎所盘踞的南疆各城。九月一日，刘锦棠率军收复喀喇沙尔，三日收复库尔勒。十二日，追白彦虎至库东，十五日追至拜城，十八日抵阿克苏。下阿克苏城时，俘虏的人达十多万。二十一日，收复乌什。十一月十三日，刘锦棠率军攻克喀什噶尔，白彦虎、伯克胡里率残部逃入俄境。二十日，请军克英吉沙，二十九日克和阗。至此，除伊犁外，新疆全境已被清军收复。刘锦棠也晋二等男爵。光绪四年，加授三品太常寺卿。七月，转通政使司通政使。

光绪四年（1878年）九月，阿古柏的旧部犯边，刘锦棠派提督方友升、谭慎典等分兵击败了敌人。此外，他多次率军击溃小股叛军及入侵者。光绪六年正月，皇上命刘锦棠帮办新疆军务。八月，左宗棠奉诏回京，刘锦棠受命署理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九月，他移驻哈密。布置南路和哈密等地的防务。十一月，上命哈密及镇迪道所属文武地方官，均暂归刘锦棠统辖。光绪七年（1881年），刘锦棠被授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伊犁因未收回，在左宗棠、刘锦棠率军收复南疆之后，清政府于光绪四年（1878年）特派前驻法钦差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谈判归还伊犁问题。但崇厚与俄签了一个不平等的丧权辱国条约《里瓦几亚条约》。国人大哗，于是在光绪六年，改派前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出使沙俄改约。为了对付沙俄的武装挑衅，左宗棠又奉命率军准备武力收复伊犁。

光绪六年四月，左宗棠抬着棺材从肃州出发，以示决一死战，五月到哈密，计划分兵三路收复伊犁：金顺出精河为东路，严防俄军窜犯北疆，刘锦棠出乌什为西路，越过天山，直指伊犁西南，切断俄军增援；张曜出阿克苏为中路，沿特克斯河指向伊犁以南。派谭上连等分屯于喀什噶尔、阿克苏、哈密，为后路声援。准备参战人马约六万人。在这种情况下，沙俄与中国签订了归还伊犁条约。

刘锦棠见新疆既平，请设新疆行省，隶属陕甘总督，设巡抚布政使。皇上准奏，加授他按察使衔。光绪九年，因刘锦棠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新疆的措施，政绩突出，升为兵部右侍郎。第二年，因慈禧太后五十大寿，赏加尚书衔。又授为新疆巡抚，仍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办新疆事宜。光绪十五年（1889年），慈禧垂帘听政，赏加太子少保衔，第二年晋太子太保衔。光绪二十年，因慈禧六十大寿，晋封一等男爵。六月入京晋见，七月，刘锦棠因病去世。皇上下诏，谥号襄勤。第二年，在湖南他的家乡和省城建专祠祭祀他。

刘步蟾

刘步蟾（1852～1895年），字子香，福建侯官（今闽侯）人。在1894年甲午海战中，舍生忘死，志节凛然。

同治六年（1867年），刘步蟾考入福建船政学堂，学习英文、测量及驾驶，成绩优异，屡次获优等奖。同治十年，刘步蟾在建威兵船任事，随船游历了南北洋及新加坡等地。第二年，在会考闽、广的驾驶生中，刘步蟾一举夺冠。从此，刘步蟾开始驾船巡

历祖国的海岸线，并且用西洋的方法测量了台湾等地的地势，把风土人情也记载下来，他绘制的地图，又清楚又详细。

光绪元年（1875年），刘步蟾被派往欧洲学习枪炮、水雷等制造技术，并且在英国的旗舰马那多号上见习。他看到西方先进的海军装备和科学技术，深感国家的落后，因此更加如饥似渴地学习。当时英军的远东舰队司令非常赏识他，说他不但学习用功，而且对西学也颇有了解。据传曾请他留在英军中任职，但被刘步蟾拒绝了。光绪五年，李鸿章认为他颖达英俊，学有心得，是可用之海军人才，令他驾驶定购的快船回国，加副将衔。光绪十一年，刘步蟾受命去德国督带定远号等舰回国，加总兵衔。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舰队正式成立，刘步蟾被任命为舰队右翼总兵，加头品顶戴，赐号强勇巴图鲁。

刘步蟾因为精通西学，所以许多北洋海军的规制多出他的手，他对北洋海军的建立和训练功劳卓著，是一名出色的海军将领。他曾反对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建议要不断补充海军实力，以抵御外来的侵略。刘步蟾还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民族意识，一直抵制洋人对中国海军的控制。先后和北洋水师总教习英国人琅威理、秦莱等作过不懈的斗争。

光绪二十年（1894年）9月17日，在鸭绿江口外的黄海海面上，中日海军展开了世界史上第一次蒸汽机舰队的海战，这是甲午中日战争中双方海军主力的决战。刘步蟾按照海军提督丁汝

昌的部署，率定远舰航行在雁行阵的尖端，迎着鱼贯而来的日本舰队破浪前进。在距敌舰五千多米时，刘步蟾先发制人，下令开炮，炮弹在敌巡洋舰吉野号附近爆炸，继发一炮，飞向吉野号甲板，十一名敌军官兵饮弹伤亡。敌舰第一游击队不敢与定远舰对峙，凭借速度快，抢过北洋舰队右侧包抄后路。海战开始不久，敌人的炮弹炸毁了冲锋在前的定远舰桅楼，提督丁汝昌身负重伤。刘步蟾立即代为督战。

敌舰比睿号落在本队之后，试图从定远和靖远两舰中间穿过，结果陷入重围。刘步蟾指挥定远号发射三十公分半巨炮，打穿其右舷舰长室，落在后墙中爆炸，下甲板被破坏，燃起熊熊大火，几十人在飞进的弹雨中毙命，三十多人受伤。比睿号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慌忙逃跑，闯出重围。

定远舰越战越勇，很快咬住了敌舰赤城号。刘步蟾指挥战士用后部十五公分克虏伯炮轰击赤城号，弹片击中正在观看海图的敌舰长坂元八太郎少佐的头部，顿时脑浆乌血浅洒一片。这是中日甲午海战中日本唯一丧命的舰长。接着，来远号又打一炮，赤城号也载着十几具尸体仓忙向大海深处逃窜。

战斗激烈地进行着，定远舰逼近敌舰西京号，先后命中其左右舷侧和上甲板，其舵机顿时失灵。我方其它舰只也前来聚歼，西京丸号像一头受伤的野兽乱奔乱闯，竟侥幸逃脱。

敌舰在速度和速射炮上占了优势，北洋舰队的超勇、扬威、致远、经远先后被敌击沉，胆小怕死的济远号管带方伯谦带舰逃跑，广甲号也溜之大吉。战场止只有定远号等四艘舰与敌人在拼搏。定远号和姊妹舰镇远号相互依持，毫不气馁。定远舰经过几个小时的苦战，已是弹痕累累，炮械破残，仅剩三门大炮还能施

放。刘步蟾镇定自若，沉着指挥应战。酣战的大海上，浓烟滚滚，烈焰排空。刘步蟾对广大将士发誓说：“我们一定要战斗到底，舰存人存，舰亡与亡！”

日本海军自丰岛海战后，依仗在舰数、吨位、航速和炮火上的优势，一直在黄海巡梭，扬言要“聚歼清国舰队于黄海”，气焰十分狂妄。而首当其冲的就是要消灭北洋舰队的两大主力舰定远号和镇远号。可是，刘步蟾等将士已抱定了以死相拚的决心，所以愈战愈勇，日本官兵气急败坏地叫喊：“定远号怎么还不沉呢？”

定远号非但没有沉，反而在管带刘步蟾的指挥下，给敌人以猛烈的回击。日军旗舰松岛号欲将定远号置于死地，从弹舱同时搬出三颗大炮弹放在炮前准备发射。没想到定远舰的大炮一声怒吼，准确地击中松岛号，日军的三颗大炮弹也一起炸开，害人先害己，顿时日舰上如百电千雷崩裂。日军发出凄惨的狼嚎鬼叫。不大一会儿，松岛号剧烈震荡，船体开始倾斜。日舰上烈火熊熊，浓烟滚滚，日军死伤了八十多人，死尸到处都是，有的坠入海底，有的散乱在甲板上，骨碎血溢，异臭扑鼻。该舰完全丧失了战斗能力和指挥能力。日军的海军司令伊东祐亨只得换乘桥立号。

鏖战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敌舰已是精疲力竭，无心恋战，便首先退出战场。北洋舰队升旗集队，追逐敌人十余里，日舰利用航速优势，飞驶逃遁。黄海大战结束了。这次大海战，北洋舰队遭受很大损失，但是，由于刘步蟾等海军将士的英勇抵抗，给敌人以有效的杀伤，并保住了舰队的主力。

刘步蟾因此战有功，晋升记名提督，赏换格洪额巴图鲁勇号。丁汝昌离舰养伤，刘步蟾代理其职，在旅顺军港夜以继日督

修战舰，一个月后，战舰全部修复，10月18日，休整后的北洋舰队开向威海卫。

清朝陆军极其腐败，不堪一击。日本陆军从荣成登陆，轻取威海，占领了沿岸炮台，与日本海军形成对北洋舰队的夹击。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2月5日清晨，日本的鱼雷艇偷袭定远舰，刘步蟾随丁汝昌登上甲板观察，发炮击沉一鱼雷艇。这时，定远舰也中弹受伤，海水往舱里猛灌。为了防止沉没，刘步蟾当机立断，急令断锚南驶，到刘公岛东南海岸浅水处搁浅。这样定远号还可以作“水炮台”使用。2月10日，定远舰的炮弹打光了，可是甲板还露在水面上。刘步蟾为了防止舰被敌人缴获，下令将二百五十磅炸药点燃，一声巨响，定远舰永远地消失了。这时，在舰队中任职的一些洋员，煽动蛊惑官兵向日军投降。丁汝昌、刘步蟾的号令没有人执行。当夜，刘步蟾看着濒于毁灭的舰队，想着不可挽回的败局，肝肠寸短。痛心疾首，最后服毒自杀，履行了自己“苟丧舰，将自裁”的誓言，时年四十三岁。山东巡抚李秉衡在给皇帝的奏折中称：刘步蟾“船亡与亡，志节凛然，无愧舍生取义。”

邓世昌

邓世昌（1855～1894），字正卿，广东番禺（今珠海）人。历任广东、福建舰船管带及千总、守备。后来李鸿章把他调到北洋水师，任致远号巡洋舰管带，后因有功，升总兵，海军中军副将，光绪二十年（1894年），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壮烈牺牲，年仅三十九岁。死后光绪帝赐号为壮节。

一、少年有志 治军有方

邓世昌，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原名永昌。自幼十分聪明好学。其父邓焕芬在番禺邓氏宗谱中属第二十三世。母亲刘氏共生六子，邓世昌是老四。他身材不高，性格沉毅，少年时就有办事的才干和心计。后移居上海，精通英语，对于凡是长见识、增知识的事十分留意。他在上海黄浦江一带看到外国人的军舰任意出入中国的海港，常常叹息说：“中国通商日盛，外国舰只来华日多，中国的弱点被外国人探知，假使中国不用西方的办法建立海军，一旦强邻挑衅，就没有办法对付了。”因此，邓世昌在青少年时，就立志于我国的海军建设。

同治六年（1867年），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楨在福建任船政大臣，招考广东籍而又学过英语的青年入船政学堂，培养航海技术人才。当时船政学堂招收学生十人，邓世昌就是其中之一。他学习十分认真刻苦，成绩也特别出众，各门课程的考试都在最好的等级里，尤其对“测量”和“驾驶”两门课，成绩最为出众，受到沈葆楨的器重。同治十年，邓世昌被派到建威舰实习，并巡航南洋各岛，不久，被提升为该舰管带。同治十三年，因邓世昌成绩卓著，被奖励五品军功，派充“琛航”运输舰的管带。光绪元年（1875年），他先后被调任“海东”、“云和”、“飞霆”等炮舰管带。针对日本窥台湾，扼澎湖、基隆等要冲，邓世昌被清政府补千总，调任振威号舰长。因为还要缉捕海盗，又升为守备。加

都司衔。

光绪五年（1879年），李鸿章兴建海军，得知邓世昌不但熟悉管理军舰和航海技术，而且是水师中才能特别出众的人才后，便把他调到北洋水师，担任镇南炮舰管带。第二年，总教习英国人葛雷森率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四炮舰巡游渤海，至海洋岛，镇南舰触礁，由于邓世昌沉着指挥，很快使船脱离了危险。但是邓世昌还是因此被撤了职，由洋教习英国人章斯敦接任。同年十二月，邓世昌以副管带的身份，跟随督操丁汝昌到英国接带“超勇”、“扬威”两艘巡洋舰。这是他第一次出洋，深感机会难得，更加留意西方海军的发展，认真考察西方的海军情况，详细了解了训练海战的技术。这次往返共十个月，邓世昌学到了不少东西，进步十分大。

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的政局发生了动乱，起义者放火烧毁了汉城的日本公使馆，迫使侵略者狼狈逃往仁川。日本侵略者利用这一事件，派遣军队去朝鲜，以战争相威胁。这时，清政府也知道了此事，派邓世昌随丁汝昌率舰护送浙江提督吴长庆的陆军部队东渡，以增援朝鲜。邓世昌指挥部队快速行驶，直接奔仁川而去，这样他们比日本的舰队早一天到达了仁川，日本人见中国军队已经增援了朝鲜，没有办法，只好悻悻返回。日本人虽未敢轻举妄动，但是却胁迫朝鲜签订了《仁川条约》，取得了在汉城驻扎军队的特权。从此，日本的侵略势力进一步扩张。朝鲜事端平息之后，清政府为表彰邓世昌此次护送陆军有功之举，破格提升，免补都司，迁游击，赐勇号“勃勇巴图鲁”。此时的邓世昌，管带“扬威”舰，往来于天津、朝鲜。冬天寒冷，北方的海面都结了冰，邓世昌便南下巡查，担任台湾、厦门一带的海上

防务。

光绪十三年七月（1887年8月），李鸿章在英、德两国订购的致远、靖远、来远、经远四艘巡洋舰已将交货，就派邓世昌、叶祖珪、林永升、邱宝仁出洋接带。邓世昌以营务处副将衔参将兼致远号舰长。在归航的途中，他正好生了病，但他带病坚持监视行船，不怕惊涛骇浪，抓紧时间，指挥这些新舰沿途进行实地演习。在演习时，邓世昌每天都要演习数种阵法，一会操练水险，一会操练火险，一会作备战攻击。舰上的将士们也个个都精神勃发，严阵以待，没有一个惊惶失措，使全体将士在远洋航行中受到了一次很好的锻炼。邓世昌还十分关心舰上士兵的生活，其他舰上升火的水手病故了许多，不得不雇用“升火土人”，但致远号却没有。这全凭邓世昌的关怀。经过长时间的远洋航行，光绪十四年三月十五日（1888年4月25日），邓世昌率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舰安全抵达天津大沽港。这一年，台湾的土著居民反叛，邓世昌以副将的身份跟随丁汝昌前往征讨。在埤南和叛军交战，邓世昌指挥部队摧毁了叛军的碉堡和庄寨，被提升为总兵。清政府任命他仍为致远号管带。同年5月，李鸿章到威海检阅北洋舰队，因为邓世昌训练得力，奏准赏换“噶尔萨巴图鲁”勇号。同年9月，北洋舰队成军，授邓世昌中军中营副将，仍管带致远舰。

邓世昌治军严整，办事认真，并刻苦钻研海军业务，为当时北洋水师中的优秀将领。他平时精于训练，办事特别谨慎，受到人们的赞誉。他虽然没有出洋留过学，但是对西方的各方面的知识都了解得很多很深，比一般同僚总是高出一筹。当时海军的左右翼总兵分别是福建人林泰和刘步蟾。丁汝昌一向不熟悉海战，

因此他的命令部下不能很好地执行。只有邓世昌是广东人，又担任舰船总管，不到规定的时间决不让士兵上岸，因此福建人都很嫉妒他。但他治军有方，有人称赞他使船就像驾马一样熟练迅速，放炮比放箭还得心应手，对各种战术他无一不精。

二、勇敢果决 胆识非凡

邓世昌不仅航海技术精湛，而且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年轻有为，意气风发，在大海上航行，以天为被，以海为席，从无怨言，哪里艰苦，他就到哪里。而且他还经常在军队鼓动士气，他曾经对人讲：“人都是要死的，但是我要死得其所！”他的豪气常常感动得别人都掉下眼泪。

光绪二十年（1894年）夏，日军侵袭朝鲜，封锁住海上通道。7月25日晨，中国军舰济远、广乙号受李鸿章之命开往牙山。行抵牙山口外丰岛附近，突然遇到日本军舰。日舰不宣而战，突然向济远和广乙号军舰开炮。中国的广乙舰船身小，战斗力弱，受到严重创伤。日舰又炮击济远号，济远号是铁甲快船，战斗力强，舰上的官兵有一部分作战勇敢，和比他们强大的日舰展开了猛烈的搏斗。都司沈寿昌、守备杨建章、黄承勋中弹牺牲。但是管带方柏谦贪生怕死，下令逃跑。这时，清政府雇用的英国商船“高升”号和自备的运输船“操江”恰逢载运一千多名援朝陆军和各种器材弹药驶来。济远号本有护舰责任，可是为了逃命，竟然丢下运输船不管，致使高升号和操江号两船失去保护，结果操江号被日舰俘去。日舰浪速号又强迫高升号投降，船上的中国士兵坚决不从，表示决不投降，宁愿死在这里，也不愿当俘虏。日舰的火炮、鱼雷齐放，高升号的中国士兵以步枪英勇还击，

直至舰沉壮烈牺牲。在此同时，日舰“吉野”号紧追济远号不放，方柏谦挂白旗投降，但日舰见后追得更急。舰上的士兵对方柏谦的可耻行为极为愤怒，水手王国战、李仁茂等，发尾炮射击，击毁了日舰吉野号的指挥中枢瞭楼，使它不敢再追。方柏谦吹嘘他的胜利战迹，返航后堵塞住了威海的东、西两处出海口。邓世昌见此惨状，悲愤交加，欲率舰与日作战，提督丁汝昌没有同意他的行动，不让他出击。邓世昌曾对部下将士说：“设有不测，誓与日舰同沉！”以表露为国家要与敌人决一死战的赤胆忠心。

高升号被击沉后，清政府又幻想英国出来干涉，不愿应战。直到这一希望完全落空之后，才于8月1日宣战。中日甲午战争正式开始。

9月17日，中国北洋舰队又在黄海突然遭到日本船队的袭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海战。在敌人的进攻面前，中国舰队的官兵临危不惧，沉着应战，以十艘大军舰对抗十二艘敌舰。丁汝昌乘坐定远号居中指挥，将其他舰船排列左右作为两翼。日军舰船首尾相接鱼贯而进，占据了上风，丁汝昌命令开炮轰击但距离太远没有击中。日军舰船体积小，调头灵活，一会儿分开，一会儿集中，弹雨聚集，丁汝昌乘坐的定远号被击得震动，舰上的大旗倒下了。邓世昌见指挥各舰作战的帅旗没有了，担心各舰见后军心动摇，就急忙取出致远号的大旗竖起来。

在这次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勇猛冲锋，开放舰首尾英厂十二吋的大炮，并施放机器格林炮，先后百余发炮弹打出，击中了很多日本军舰。此时，日本的吉野、浪速等四艘军舰驶至中国旗舰定远号前方，并向定远进逼。为保护定远号，邓世昌将致远开足马力，驶向定远之前迎战日舰，这样，致远号即陷

入了四艘日舰的包围之中，但他仍然镇静自若，毫不退缩。邓世昌沉着指挥，胆识非凡，极大地鼓舞了全舰将士的斗志。此次海战，日本旗舰“松岛”等三艘敌舰受到重创。

三、跳海自沉 气贯日月

在这次海战中，邓世昌驾驶的致远号最为勇猛。它和日方主力舰吉野号在海洋中的速度相当。致远号被日舰包围后，历经数小时的浴血苦战，中弹甚多，水线下受伤，船身倾斜，势将沉没。这时，弹药也快要用完了。在这危急关头，邓世昌视死如归，激励将士们说：“我们从军卫国，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现在情况已经十分危急，今天正是我们以死报效祖国的时候。但是即使我们战死，也不能让我们的海军的声威受到影响，我们要长我们国家的声威！现在是我们报效祖国的时候了！”邓世昌见全舰将士都能与他同心同德，即下令致远号开足马力，冲入敌阵。

致远号伤势虽重，但在邓世昌的指挥下，仍能于战火纷飞、阵云缭绕的海洋中勇猛向前。此时，恰与日舰吉野相遇，邓世昌即准备与它同归于尽，以保证海战胜利。邓世昌对大副陈金揆说：“日倭的军舰中吉野是主力，如果我们撞沉它，我军就可以胜利！”于是，他下令开足马力，在枪林弹雨中向日舰驶去。不幸被敌人的鱼雷击中，机器的锅炉炸裂了，船开始向左倾斜，不大一会儿就沉没了。邓世昌和大副陈金揆、二副周居阶等人同时落水。邓世昌壮志未遂，全舰二百五十人，除二十七人遇救获生外，其余的全部壮烈牺牲。

军舰沉坠后，他因身上有救生圈而没有沉下去。丁汝昌和其他将士看见了，急命舰船开过去救援，其随从刘相忠跃入海中救

他，可他说：“全船的将士都沉没了，我没有权力自己偷生。”说完双臂蜷缩让救生圈脱了出去，不肯上船，同时，他高呼：“为杀敌而死，不要偷生，不做俘虏！”此时，他平时所养的爱犬“太阳犬”也晃到他身边，衔住他手臂不放，被他推开，此犬又衔住他发辫，使他不致于沉下去。邓世昌毅然伸出手，掀下他的爱犬，和爱犬一同沉了海底。时年仅三十九岁。

在这次海战中，经远号管带总兵林永升、超勇号管带参将黄建寅、扬威号管带参将林殿中也一起战死在疆场。

事情奏报给皇帝，光绪帝赐邓世昌谥号为壮节，其余的人都给了优厚的抚恤。邓世昌在临战时以忠节义气与众将士互相激励、以身殉国的情景颇为壮烈，世人有把他和左宝贵并称为“双忠”的说法。缪钟渭在《纪大东沟战事吊邓总兵世昌》诗中赞道：

两军鏖战洪涛中，
雷霆铿锵天异色。
高密后裔真英雄，
气贯白日怀精忠。

深深地反映了人们对邓世昌英勇事迹的讴歌和赞扬。

徐 骧

徐骧（1858～1895 年）。台湾省苗栗县人，祖籍广东。清末台湾民军领袖。

一、为人勤俭 好济人危

美丽的宝岛台湾，自古就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为了维护祖国的完整统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台湾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徐骧，就是这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斗争中涌现出的杰出代表。

徐骧 1858 年出生在台湾苗栗县一户世代耕织的农家。他自幼参加农业劳动，曾考中秀才。他身材魁梧，膂力过人，平时喜欢练习棍棒拳术，练就一身好武艺。他为人勤俭，好济人危，常常把多余之物分给乡村中的贫苦之家，并喜欢为人打抱不平，所以在乡里很有威信。他非常爱读文史及兵书，深为许多古代仁人志士的爱国事迹所感动，决心以他们作为自己的榜样。

甲午战争清军失败后，清王朝将宝岛台湾割与日本。徐骧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统一，在台北失陷后，举起义旗，成立义民团抗日，被群众推选为团长，后为民军司令。徐骧的民军和新竹人姜绍祖、苗栗人吴汤兴等领导的义军，以及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是台湾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民军在新竹、彰化、嘉义等地坚持斗争达五个多月，大小百余战，抗击日军三个师团和一支海军舰队，打死打伤日军三万两千多人。日本近卫师团有一半被消灭，侵台日军头子北白川能久中将、山根信成少将先后毙命。这些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胜利，在我国近代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二、组建民团 兴师抗日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王朝派李鸿章以“钦差头等全权大臣”的头衔，赴日求和。在日本政府的压力下，1895 年（光绪

二十一年)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马关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条约中第二款规定:中国将辽东半岛割让日本;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永远让与日本。这一卖国条约的签订,当即引起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抗议。台湾人民更是“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愤怒的台湾人民“鸣锣罢市”,怒斥清廷及李鸿章的卖国行径,誓与台湾共存亡。清朝统治集团不顾人民的反对,于1895年5月20日令台湾巡抚唐景崧率文武官员陆续撤出台湾,派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为“割台大臣”,前往台湾办理割台手续。迫于台湾人民的强烈反对,李经方不敢上岛,只在基隆口外的日舰上会见日本“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将台湾全岛、澎湖列岛及台湾所有的兵工厂、公共财产等清单交给了日本。

日本侵略者深知台湾人民不会甘当亡国奴,便采取武装入侵的办法,迫使台湾人民屈服。以北白川能久中将为师团长的日军主力近卫师团,于5月27日从冲绳中城湾出发,分两路进攻台湾。5月29日,一路日军从三貂角强行登陆。6月1日,另一路日军攻占了基隆。台湾巡抚唐景崧和一些地主豪绅,丢下大批军火武器,内渡逃命,日军不战而得台北。台中的一些清军守将,也学着唐景崧的样子,弃地而逃。只有驻守台南的刘永福统率的黑旗军坚决主张抗战。

此时,徐骧积极组织抗日义民团,准备支援黑旗军,进行卫国保家的斗争。徐骧对乡亲父老们说:“我们台南人民把防守的重任交给了刘永福将军,大家袖手旁观,不予援助,这怎么行呢?刘将军孤立无援,兵力单薄,粮食缺乏,纵然忠于职守,也很难

取得胜利。刘将军不是台湾人，而台湾是我们世代居住的故乡，我们爱台湾，自然比刘将军更深，我们的田产在这里，我们的子子孙孙在这里，我们祖宗的坟墓在这里，如果台湾沦陷了，我们怎么能安居乐业呢！……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应该挺身而出，奋起抗战，援助刘将军！”他的话，使许多人感动得放声大哭，表示愿意跟随他举旗起事，并推举他为义民团团长。就在徐骧组织义民团的时候，台南其他各地的义民军也相继建立。各路民军与刘永福指挥的黑旗军协同作战，徐骧和各路民军首领又公推刘永福为军统，统一领导台湾军民的抗日斗争。军民同心抗日，使黑旗军的声威为之大振。

6月中旬，日船多艘进攻台南安平口，企图采用水陆两路、南北夹击的战术，一举歼灭台南军民的抗日武装。刘永福指挥黑旗军英勇作战，徐骧及时率领自己的义民团赶来助战，敌人多次强行登陆，皆被击退。安平口一仗，就使日本侵略者尝到了台湾人民正义“铁拳”的厉害。

三、迂回周旋 巧设伏兵

日本近卫师团进攻台南安平口失败后，即改变了进攻的地点，又兵分两路进犯通往台中的门户新竹。徐骧等率民军数千人赶往新竹，协助守将杨紫云据险阻击，迎战日军。徐骧发挥民军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与敌人迂回周旋，使日军像掉进泥潭一样，处处挨打，步步被动。

日军到达新竹之前，徐骧把民军部署在新竹以北二十里的湖口一带，准备阻止日军南下。当东路日军数百人途经大溪的角板山盆地时，十多名民军利用当地竹林为掩护，东一枪西一枪地

打击敌人，使敌人无法前进一步。徐骧乘机率军民赶来围歼，消灭敌六十多人，击毙日军指挥官樱花大佐；其余日军逃至山林之中，又被民军重重包围。日军增援部队不谙当地地形，只得用重金收买汉奸带路，抄小道从侧翼夹击义军。日军突围后，形势出现逆转，徐骧便率军且战且退，而日军则尾追不舍。徐骧镇定自若地对大家说：“这里的道路、地形，敌人没有我们熟，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有利条件转败为胜。”于是，他命令小部队在歧路上往返迂回，迷惑箝制敌人，自己率大部队抄小路绕到敌背，对敌人实施腹背夹击，打得日军措手不及，大败而逃。西路日军抵达湖口时，也遭到民军的伏击。后来，由于民军饷械不继，只好主动撤离，日军这才占领了新竹。民军筹得饷械，又准备反攻新竹。由于行动计划不秘，日军得知后倾全力死守新竹。双方在新竹城东十八尖山和虎头山展开激战，民军反复拚杀，终因寡不敌众，反攻失利。此后，徐骧继续运用游击战术，指挥民军不断袭扰新竹之敌。在新竹，徐骧牵制日军达两个月之久，打乱了敌人南侵的如意算盘。

后来，徐骧率民军退守大甲溪、台中一线。大甲溪是台中的屏障，日军要占领台中，必先攻占大甲溪。刘永福恐徐骧有失，即派部将吴彭年率黑旗军前来增援。当日军南犯进抵大甲溪时，其前军刚渡过河，吴彭年即率南岸伏兵从丛林中杀出拦腰截击。日军阵势顿时大乱，纷纷落水身亡，“逆尸累累，溪水不流。”徐骧在大甲溪一带与敌相持一个月之久。日军不得不故伎重演，又用重金收买奸细带路抄袭，攻下大甲溪。

新竹、大甲溪之役，进一步打击了敌人的侵略气焰。日本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对手非常顽强，丝毫不怕死，他

们一有机会就发动进攻”，“每个人甚至青年妇女都拿起武器，一面呼喊着，一面投入战斗”。

四、攻守结合 夜战顽敌

大甲溪失陷后，刘永福命令各军严守彰化。彰化是台湾中部的城市，它的得失对台湾抗日斗争的影响极大。徐骧和刘永福部将吴彭年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的态势，认为必须避其锐气，攻其疲时，凭借北边大肚溪、东门外八卦山两道天然屏障，采取攻防结合的战术，发挥民军熟悉地形、善于夜战的特点，消灭日军有生力量。在兵力部署上，徐骧率民军驻守城外，埋伏于草丛之中；吴彭年率黑旗军据守八卦山，待机歼敌。

不久，日军来犯。徐骧乘敌结筏渡河之机，在夜间发起攻击，将其截成数段，杀伤大量敌人，并击退数倍于己的日军。次日，徐骧又率兵追击，大败日军于李厝庄。正当他准备一举夺回大甲溪时，另一路日军已攻占台中府城，两路日军会师合击彰化，徐骧退至八卦山与吴彭年共同御敌。他俩白天分兵扼守山上险要地带，以守为攻，大量消耗敌人，使其不能前进一步；夜间徐骧亲率多股小分队，神出鬼没到处袭击日军军营，使其不得安宁。一连几天，两军对恃，不分高下。日军复又以重金收买奸细作向导，趁夜间由小路登山袭击吴彭年的阵地。徐骧与吴彭年率军冲入敌阵，在八卦山上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击毙日军精锐近卫师团一千多人，日军少将山根信成被民军杀死。在这次血战民军和黑旗军也伤亡很大，吴彭年与三百多名将士全部壮烈牺牲。徐骧为了保存实力，率少数民军杀出重围，退往台南。

彰化失守后，刘永福命部将王德标率军守卫嘉义，一面派杨

泗洪带兵会同民军多次反攻彰化。一次，民军配合黑旗军夜至大埔林，纵火袭击日军，日军大乱，逃至河边，大半落水溺死，残部退到一座神庙中，也被民军包围全歼。黑旗军和民军乘胜前进，收复云林、苗栗一带，然后进击彰化。在进攻彰化的战斗中，台中地区的八百多名日军几乎全军覆没，只有五十多人逃回城去，不敢再战。

此时，战争形势虽然对台湾抗日军民十分有利，但由于长期拒敌，军饷、军械已近枯竭，而腐朽的清王朝又深怕得罪洋人，对台湾军民的抗日斗争不仅不予支援，还严禁大陆人民支援台湾军民的抗日斗争。这样，本来唾手可得的彰化，不但没有攻取，反而使敌人得到喘息的机会，“死狼复活”。日军由台湾副总督高岛丙之中将率领，以二、四师团组成援军，会合海军，水陆进攻台南。9月上旬，彰化之敌得到增援后亦倾巢出动，向台南进犯。

五、宣传群众 抗战到底

徐骧在彰化率部分民军突出重围后，即在高山族同胞聚居的阿里山区进行休整，进一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决心与日军抗战到底。

在阿里山区，徐骧大力宣传汉族同胞与高山同胞团结战斗的意义，和当年郑成功如何收复台湾的故事，教育部属要注意民族团结，以郑成功为榜样，誓死保卫台湾。高山族同胞早就听说过徐骧领导民军打击日军的动人故事，对这位忠勇双全的民军领袖十分敬佩。在徐骧的号召下，高山族同胞纷纷参加民军。扩大了队伍之后，又立即奔赴杀敌的战场。

徐骧指挥民军在北斗镇、刺桐庄、云林等地阻击敌人，力挫

日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¹⁰日中旬，日军集中兵力进逼嘉义。黑旗军守将王德标与徐骧组织民军挖掘地道，把地雷埋在敌人的集结地域。一天夜里，地雷爆炸，炸死日军七百多人。日军仓皇撤退，半路又遭民军截击，死伤惨重。日军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中将，也在这次进犯中重伤毙命。第二天，日军疯狂地用重炮轰塌嘉义城墙，窜入城内。王德标和徐骧率军与日寇巷战，重挫敌人后，引军退往曾文溪。

曾文溪距台南府城仅二十公里，是防御台南的最后一道防线。侵台日军集中了全部兵力包围扼守曾文溪的黑旗军与民军。王德标、徐骧率军与日寇展开最后决战。徐骧手持大刀，激励兵士们说：“我们为台湾人民报雪恨的时刻到了！”然后带头冲入敌阵。徐骧、王德标相继阵亡。无数高山族和汉族的英雄儿女为了共同保卫台湾也洒尽了满腔热血。

台湾虽然落入日寇手中，但是，台湾人民武装反抗日军统治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台湾大部分地区，除了重要城镇，交通方便的地方为敌据有之外，那些崇山峻岭、僻壤村寨，依然处在宁死不屈的抗日民众控制之下。他们建立的根据地遍及台湾各地，伺机进攻日本军营、官署，使日本侵略者永无宁日。战后，台湾人民为了深切悼念徐骧这位抗日英雄，曾为他写下一首气壮山河的挽联：

临危不惧，方显中华儿女真本色；
为国捐躯，最是人民英雄一片心！

寿 山

寿山（1860～1900 年），字眉峰，汉军正白旗人，生于黑龙江瑗瑒城。

一、英雄壮举 可歌可泣

在齐齐哈尔市龙沙公园的劳动湖畔，有一座青砖灰瓦的二进式祠堂建筑“寿山祠”。祠内正殿前庭原有石碑两幢，记载着寿山将军在 1900 年（光绪二十六年）抗击沙俄侵略战争中，立下的卓著战功和英勇献身的事迹。

据《寿山将军家传》记载，他是明朝兵部尚书袁崇焕的后代。袁崇焕死后，其子孙在清初被编入宁古塔汉军正白旗，世代居瑗瑒城。寿山的父亲富明阿是袁崇焕六世孙，历任清朝荆州、江宁、吉林将军。1892 年（光绪十八年），他三十二岁时，父亲病故，袭骑都尉世职，以三品衔补用郎中候补员外郎。

1894 年（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清廷统治集团对日妥退让，平壤、黄海两战失利，日军直犯奉天。这时，寿山为一心救国，毅然申请从军。从军后，他即奉命招募士兵，“首举义旗，人乐应募，十余日间，且招且练，即成两营劲旅”，编入满族将军依克唐阿部队，他被任命为步军统领，其弟永山被任命为马队统领。寿山与其弟在奉天抗击日军，因熟悉兵法，英勇善战，连续攻克山关等地，屡立战功。在凤凰城战斗中，寿山协助其弟永山调度军务，兄弟二人率马队“转战而前，深入敌所，直扑凤凰城下，昼夜相持数日”，并会合步队“马步间行，旁抄

侧击”，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激战中，永山不幸中弹牺牲。次年3月寿山率马队二营在辽南汤岗子与日军交战，虽兵力悬殊，但他毫不畏惧，小腹中弹后，不仅坚持指挥战斗，而且越战越勇，杀敌多名，终于击退敌人。开始，依克唐阿将军认为寿山原是文职官员，担心他“调度有余，勇战不足”。但实战结果使他完全改变了看法，不但说寿山“谋勇兼优，询属不可多得”的将才，而且奏报朝廷对其“破格奖励，以当干城。”

二、抵御侵略 重整边防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黑龙江将军恩泽见边防日益吃紧，沙俄入侵步步进逼，即上书朝廷请求奏准寿山为镇边军左路统领，驻防瑗琿，恩泽因自己身体不好，主动把该城军事防务，一概交给寿山署理。

当时，中俄两国的疆界已不是1689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中规定的疆界了；边防也不像第一任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时那样坚实巩固了。自从1840年（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沙俄趁机向东方扩张，将侵略魔爪伸入我黑龙江流域，公然对我黑龙江上中游北岸和下游两岸的领土实行军事占领。1858年（咸丰八年）5月，又威逼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瑗琿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大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大领域都划为俄国领土。只隔了两年，在中俄《北京条约》中，又将《瑗琿条约》规定由中俄两国“共管之地”——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广大领域，划归俄国。沙俄政府还想要一口吞下我辽东半岛这块肥肉。他们不断地制造种种借口，在那里修筑铁路，租借港口，挑起事

端。

寿山驻防瑗珲后，深为祖国山河破碎、任人宰割而气愤、痛心。他曾说过：“权力为他人所据，如此尚能自振呼！”“且我愈退，而人愈进，我愈畏，人愈欺，”“此不得我不伐者一也。”因而积极主张抵御沙俄侵略，重整边防军务。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寿山得知沙俄派兵侵入我江东六十四屯，“调查人民户口、房屋、产业、六畜数目”的消息后，当即派兵过江保护中国旗屯村民。沙俄侵略军诬称清军越过了边界，勒令交出枪械，寿山气愤不已，准备兴兵反击。俄军见寿山针锋相对，不似四十年前签订《瑗珲条约》时的奕山那样软弱可欺，不得不归还清军的枪支弹药，撤出了江东六十四屯。这时，清廷中的投降派深怕寿山与沙俄对抗会闹出事端，即于1899年把寿山调离黑龙江，改任河南开封知府。恩泽将军上奏朝廷仗义力争，申明黑龙江边防非寿山莫属，清廷这才把寿山改任为瑗珲副都统，协助恩泽办理黑龙江边防和军务，并批准增募新军十五营。1900年（光绪十六年）初，恩泽病故，清廷任命寿山为黑龙江将军，署理全省军政事务。

寿山担负重任之后，更是尽心尽职地“澄清吏治，整顿武备”，防御俄患。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坚定有力的措施：认真刷新吏治，铲奸除弊，赏罚分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倾听下级意见，秉公处理重要民事诉讼案件；督促整军练武，亲自制定行阵操法，图绘要隘，严令军队执行。寿山在澄清吏治，整顿武备中“废寝忘食，终日无倦容”。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吏治和军务皆大有进展，为抗击沙俄的入侵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联“拳”抗敌 一致对外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春夏之交，义和团的组织在黑龙江各地得到迅速发展，从省城齐齐哈尔到边城重镇瑗珲，到处都有团民设坛练拳。义和团对沙俄在东北的特权，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几乎全部地捣毁了沙俄在东北开办的铁路、公司和矿山。东清铁路及其支线的“护路”队、公司职员，狼狈逃窜到旅顺、大连和哈尔滨等地躲避。

寿山看到义和团是抗击沙俄的一支重要力量，主张联“拳”抗俄，一致对外。这时，清慈禧太后下旨：“至此衅端，本由拳民而起，拳民首先拆毁铁路，我仍可弹压不及之势，以明其衅不自我开。齐省如有战事仍应令拳民作为前驱，我则不必明张旗帜，方于后来筹办机宜可无窒碍。”

由于寿山受着阶级和历史局限性的束缚，他对义和团既不充分信任和主动依靠，也不实行直接和间接的镇压，并对慈禧的懿旨采取了消极抵制态度。寿山经常告诫部下，大敌当前要一致对外。他在写给营务处总理程德金的信中说：“外侮方逼，未可更酿内乱，似不必与此项人（义和团）为仇也”。所以，当沙俄侵略军向我东北大举进攻时，黑龙江各地义和团和广大爱国官兵一起，奔向抗击沙俄侵略军的战场，形成了近代史上黑龙江人民反帝运动的新高潮。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7月，沙俄除参加八国联军攻掠天津、北京外，还以护路为借口，悍然发兵，妄图强占我整个东北地区。7月8日，沙俄侵略军照会寿山将军，无理要求允其数千名俄军，途经瑗珲、齐齐哈尔，开往哈尔滨。寿山当即严词拒绝，

并命璦琿副都统凤翔：如俄“兵过境，宜迎头痛击，勿令下驶。”7月9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亲任侵华俄军总司令，并由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任参谋长，调集十七万三千名侵略军，兵分六路，大举向我东北入侵。7月17日至21日，沙俄侵略军野蛮地强占了我江东六十四屯，疯狂地屠杀我海兰泡村居民六千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大惨案。列宁对此曾严正指出：“沙俄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列宁全集》第四卷第338页）

面对沙俄侵略军的猖狂进攻，寿山立即对黑龙江全省进行了具体的战斗部署。把辖境分为北、西、东三路，令璦琿副都统凤翔兼北路翼长，驻守璦琿；呼伦贝尔副都统依兴阿兼西路翼长，驻守海拉尔；通肯副都统庆祺兼东路翼长，驻守呼兰。各路清军、义和团团民及当地的各族人民群众，满怀着民族的深仇大恨，相互配合，一致行动，掀起了抗击沙俄侵略军的热潮。

北路翼长凤翔按照寿山的部署，率领爱国官兵和义和团团民英勇战斗，屡创敌人。在保卫璦琿城的战斗中，义和团高举“大拳民”和“灭洋”的大旗，手持长刀大矛，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陷阵同敌人血战。鄂伦春族人民出动五百多人组成马队，配合清军“死力拒敌”。但因武器落后，寡不敌众，璦琿城于8月5日失守，凤翔同全体将士奋战到底，直至壮烈牺牲。

西路翼长、呼伦贝尔副都统依兴阿昏庸无能，丢失呼伦贝尔城后，决定放弃西路要隘牙克石山口。统领保全在强敌面前镇定自若，拒绝依兴阿的命令，挥戈西进。在义和团团民的帮助下，保全趁敌立足未稳，一直把沙俄侵略军赶回牙克石山口。接着，保全亲率一支骑兵涉过免渡河浅滩，绕过敌军哨所，直插敌背。

正当敌人举棋不定的时候，保全发动了勇猛的冲锋，沙俄先头部队指挥官莫梁尼科夫中弹后率残兵败退三十余里，毙命。在牙克石山口，保全与俄军激战数日，终因部队伤亡越来越多，又得不到后方的任何支援而失败，保全战死疆场。

东路清军在抗击沙俄的战斗中，得到义和团团民的紧密配合。在三姓，义和团团民在松花江中横放拦江锁，沉巨石于江底，阻击敌舰，7月25日，军民共同击沉俄舰一艘。俄军闯进城后军民即与敌进行巷战，激战十多个小时，杀敌近百人。在珲春，民军首领刘永和（即刘单子）的队伍与清军一起奋力抗敌，击毙沙俄侵略军二百余人。珲春失守后，刘永和把他的队伍改称为“忠义军”，继续同沙俄侵略军进行战斗。义和团余部、破产农民、路矿工人及一部分清军士兵纷纷参加“忠义军”，他们转战东北各地，英勇地打击侵略者。

四、誓不降俄 以身殉国

当俄军大举进犯，义和团英勇抵抗，群众力量空前壮大的时候，寿山为了集中兵力抗击沙俄的正面进攻，曾约请吉林将军长顺会攻哈尔滨，以解后顾之忧。长顺表面答应，暗中破坏，致使这一作战计划未能实现。随后，以长顺和盛京将军为首的反动官员，不仅不抗俄，反而血腥镇压义和团，从而给沙俄武装侵占东北铺平了道路。这样，驻守在黑龙江的清军即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十七万如狼似虎的沙俄侵略军，从四面八方步步紧逼省城齐齐哈尔。

此时，寿山曾想把将军印交给齐齐哈尔的副都统萨保，自己亲赴前线指挥作战。但萨保坚决不同意，并派营务处总理程德全

向寿山报告，说他已与俄将商定，如我方停战，则“俄兵入境，不杀一人，不烧一房”，其余条款待面见寿山将军后商订。寿山得此消息，悲愤欲绝，沉痛地对部下说：“予为将军，今江省糜烂如是，璩瑋予故土，坐令江东六十四屯罹此奇惨”，“复何面目见黑龙江父老乎？”说罢，立即派人把将印交给副都统萨保接管，挥笔写下遗疏，谆谆叮嘱继任将军要修内政，御外侮，设民官，开荒务。

8月27日，俄军攻占省城齐齐哈尔，要求面晤寿山。寿山恪守不能“改隶夷籍，反颜事虏”的誓言，誓死不降。他说：“不能战，又不能守，亦并欲俄人见面。”他写了一封信给俄将，坚决要求不要杀害无辜百姓。随后，呼唤部属抬来一付灵柩，他穿好朝衣，戴好朝冠，从容不迫地仰卧于灵柩之中，然后开枪，以身殉国，终年仅四十岁。

聂士成

聂士成（？～1900年），字功亭，安徽合肥人，清代爱国将领。

一、捍卫祖国 名闻天下

1862年，聂士成以武童投效湘军袁甲三军营。不久，改隶淮军刘铭传部。参加镇压太平军、捻军，累迁至总兵。1868年升提督。中国近代史上，继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又有中法战争、

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之战，在后来的
一次比一次残酷的战争中，聂士成誓
死捍卫祖国，直至洒尽一腔热血。他
的威名使穷凶极恶的侵略者为之胆
慑心寒。

1884 年，法军占领基隆，台湾势
处危急。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兵
单粮匱，屡次电请李鸿章派兵增援。
北洋将领大多畏敌，不敢前往。聂士
成自告奋勇，将一千勇士渡海登陆，直抵台北。他与刘铭传军通力合作，连战克捷，扭转了台湾垂危局势。

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聂士成在考察祖国东北边境而写成的《东游纪程》一书中指出：朝鲜若有疏失，非独伊一国之危，亦我省之大患也”。日俄觊觎朝鲜及中国东北，而日本尤为“心腹之忧”。他呼呈清政府及时备战，以防不虞。几个月后日本就发动了侵略朝、中的甲午战争，证实了聂士成的预见。

1894 年 5 月，朝鲜发生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军援助。6 月 6 日，北洋大臣李鸿章派遣直隶提督叶志超与太原总督聂士成率兵二千，扬帆渡海，进驻牙山。日本认为发动侵略战争的时机已到，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派出数倍于清军的清军部队侵入朝鲜，寻衅开战。清政府及李鸿章幻想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出面干涉调停，令驻朝清军静守勿动。软弱妥协只能助长敌人的威风。7 月 25 日，日军不宣而战，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

距牙山东北五十里的成欢驿地势险要，聂士成率五营驻扎在这里。此时，日军已占领汉城、仁川，切断了北部清军增援道

路，从海上运送清军的英轮高升号亦被日舰击沉，聂士成成孤军之势。7月29日，日军四千余人进攻成欢，聂士成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冒着枪林弹雨，沉着指挥，往来策应，将士们也“决命争首，抢占山头，轰击不辍。”敌人付出很大代价，“死伤积野，血流成渠”，伤亡千余。但是敌人援军相继，士成部下则弹药垂尽，不得已率众突围而出。聂士成在前敌血战，而清军主帅叶志超却不战而逃。8月28日，聂士成退至平壤。叶志超在平壤饮酒高会，不营设备，聂士成屡谏不听。9月15日，聂士成正在回天津募兵的途中，叶志超弃平壤城，逃过鸭绿江。聂士成闻讯，立即回任督战。

10月下旬，日军分两路向中国进犯。各路清军望风而逃，只有聂士成部在虎山阻击东路日军。10月26日，受命移守摩天岭，旋即授直隶提督，被褫职的叶志超部下均归士成统领。摩天岭为辽、沈门户，对东北战局举足轻重。苦于兵力不足，聂士成令士兵在丛林之间张旗击鼓，作疑兵之计。不久，聂士成主动出击，夺回连山关、分水岭。他认为，清军一味撤退，使得敌人长驱直入而无所顾忌。请求李鸿章和统帅宋庆允许他亲率一支轻骑，直插敌后，截断日军饷道，焚毁其积蓄，使敌人首尾不顾，防不胜防，然后以大军攻之，可一举获胜。这种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可以克服被动挨打的消极防御的弱点，但李鸿章等拒不采纳。

除夕之夜，聂士成料敌必来偷袭，于是设下伏兵，等待敌人落网。日军潜至分水岭伏击圈内，遭到清军迎头痛击。在其它战场屡战屡败的情况下，聂士成却在摩天岭坚守了四个月，东路日军被扼制在这一要塞以南。

聂士成能够艰苦奋斗，与士兵们同甘共苦，常常是盔甲不

脱，枕戈待旦。他在所著《东征日记》中讲，1895年2月10日听调入卫东畿，到芦台后，“脱换征衣，已生虱。”

甲午战争以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而结束。老大清帝国竟败在一个小小的岛国脚下，谁当负这历史的罪责？

甲午战后，聂士成驻守芦台，参考德军规制，训练新军三十营，志在振兴祖国。1898年，清政府改聂士成部为武卫前军。

二、血染沙场 壮烈殉国

190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凄风苦雨的一年。八国联军用侵略的炮火写下了帝国主义侵华史上罪恶的一页。“聂将军，名高天下闻。”这是黄遵宪的长诗《聂将军》歌篇首一句。聂士成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中，血染沙场，壮烈殉国。

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运动，由于没有先进阶级领导，其本身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和盲目排外意识，在清政府“招抚”利用之后，其积极的作用更难发挥了。

聂士成的阶级立场决定了他必然与人民为敌。他曾参与了镇压捻军，围剿太平军，1891年又平定了朝阳金丹教起义。这些是抹不掉的历史污迹。阶级的偏见，也妨碍了他与义和团的协同作战。

6月初他奉命率队保护津芦铁路，曾多次与义和团发生冲突。但是，在内忧外患纷杂交织之际，他感到：“目下情形，外侮尤亟。”最凶恶的敌人是帝国主义。

6月10日，英军司令西摩尔率联军三千乘火车过杨村，欲进京“保护”使馆。聂士成电请直隶总督裕禄下令阻止，裕禄不允。他出于激愤率部队赶来牵制，加上义和团在廊坊等地截击，

西摩尔不得已撤回天津。

6月13日，清廷电旨聂士成调集所部进驻天津。16日，聂士成在津塘铁路线上的军粮城布置防守。是夜，八国联军袭击大沽炮台。聂士成闻警，急驰增援。途中得知大沽已经失守，乃飞奔北塘，策化战守。然后又返回军粮城，18日在这里重创敌军。

21日，清廷发布“宣战上谕”，并令聂军攻击天津租界。他率部围攻甚力，恶战十数次。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自与中国交战以来，从未遇此勇悍之兵。”

这时，聂士成的处境极难。朝廷内部的顽固派对他痛恨已久，借大沽炮台失守，友章弹劾，陷聂士成通敌，以八十万金将炮台卖给了联军。朝廷命裕禄密查，而义和团又在北京抄了他的家，年逾八旬的老母及妻室儿女被劫持。同时，增援天津的八国联军源源不断，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聂军乃久战之师，又无继援，势渐不支。此时，“聂公内外被敌，进退失据”，怎不会“将军仰天泣数行”！聂士成忍辱负重，振作精神，誓与敌人血战到底。

“天苍苍，野茫茫，八里台，作战场。”7月9日，战火硝烟笼罩着八里台。聂士成率部与数倍的联军隔桥对击，战斗至白热化。面对蜂拥而至的凶恶敌人，他面无惧色，屹立在桥上，向官兵疾呼：“此致命遂志之日也，虽及死不得逾此一步！”未几，聂士成遍体鳞伤，戎装焦烂，犹奋臂指挥督战。营官宋占标含泪请求他暂退，由自己拼死守住此桥。聂士成不听，继续指挥战斗。最后飞炮洞胸，壮烈殉国。宋占标等同时阵亡。五日后，天津失陷了。

可悲的是，聂士成捐身报国之日，也正是蜚语满天、朝廷下

诏革职之日。当聂士成死事上闻，仍被斥为“误国”伤身，“实堪痛恨”。龙顾山人有诗慨叹：

破阵龙骧霸气横，忠骸收得凛如生。

堂堂战死犹蒙诟，潮咽芦台有恨声。

聂士成的爱国精神和压倒民族敌人的英雄气概是不朽的，他的名字永远彪炳于中华民族英勇反抗外敌的史册。